

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

(初稿)

上册

复旦大学党史教材编写组编

一九七三年七月

说 明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应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以毛主席的著作作为基本教材。这份讲义,是作为本校党史课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辅助资料而编写的。现印出初稿,供内部讨论,以便听取意见,继续修改。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一九二一——一九二七).....	(1)
第一节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及其经验教训...	(1)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中国共产党 的成立.....	(7)
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五四运动.....	(7)
毛泽东同志的早期革命活动.....	(10)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2)
第三节 党的纲领和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	(17)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	(17)
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初期农民运动.....	(20)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统一战线 策略的确定.....	(25)
第四节 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中国社会各 阶级的分析》的发表.....	(28)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28)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五卅运动和 省港大罢工。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	(30)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 斗争·····	(34)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发表·····	(37)
第五节 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湖南农民运动 考察报告》的发表·····	(39)
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	(39)
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革命运动的高涨。 工人运动的继续发展·····	(43)
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罪恶活动·····	(46)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	(48)
第六节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 统治。资产阶级的叛变。第一次国内 革命战争的失败·····	(51)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51)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55)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 战争的失败·····	(56)
本章小结·····	(61)
第二章 土地革命战争	
(一九二七——一九三七)·····	(67)

第一节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 政治形势·····	(67)
第二节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反对瞿秋白 “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国的 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著作的 发表·····	(72)
	南昌起义。“八七”会议。秋收起义·····	(72)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76)
	反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斗争·····	(81)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84)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著作 的发表·····	(86)
	反对陈独秀取消主义的斗争·····	(88)
第三节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著作的 发表。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 路线和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斗 争。工农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 的胜利·····	(90)
	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 发展·····	(90)
	古田会议的召开。《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 想》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发表·····	(93)
	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斗 争·····	(98)
	反对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斗争·····	(101)

工农红军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原则……(103)

第四节 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遵义会议。毛主席在全党领导地位的
确立……(107)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107)

“九·一八”事变和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

“左”倾关门主义使有利形势的丧失……(109)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农村根据地问题
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等著作的发表……(112)

王明“左”倾路线对红军战争的危害。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16)

工农红军开始长征。遵义会议的召开。伟大
领袖毛主席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119)

第五节 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路线
的斗争。工农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122)

反对张国焘逃跑主义的斗争。中央红军胜利
到达陕北……(122)

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路线的破产……(128)

第六节 党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实
践论》、《矛盾论》等著作的发表……(131)

瓦窑堡会议。《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的发表……(131)

红军的东征与回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36)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	(140)
《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哲学著作的发表·····	(144)
第七节 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深入。在文化战线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149)
本章小结·····	(156)
第三章 抗日战争(一九三七——一九四五)···	(162)
第一节 全国抗战的开始。国共两党两条抗战路线的斗争·····	(162)
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162)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国共两党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	(165)
国民党军队的溃退。解放区战场的开辟·····	(168)
第二节 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	(175)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发表。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斗争的展开·····	(175)
《论持久战》等著作的发表·····	(179)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被克服……………(182)

第三节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发表。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184)

相持阶段初期的形势。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斗争……………(184)

《〈共产党人〉发刊词》的发表……………(189)

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发表……………(192)

第四节 《论政策》等著作的发表。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被粉碎。人民抗日力量的猛烈发展……………(195)

坚持民族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195)

打退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200)

人民抗日力量的猛烈发展……………(204)

第五节 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208)

整风运动的开始。《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著作的发表……………(208)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215)

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学习和时局》的发表……………(219)

**第六节 党领导解放区军民粉碎日寇残酷进攻
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222)**

解放区的严重困难局面……………(222)

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各项政策……………(223)

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开展……………(227)

解放区战场反“扫荡”斗争的胜利……………(229)

**第七节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日战争
的最后胜利……………(231)**

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

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231)

国民党战场的继续溃退。解放区战场的局
部反攻……………(233)

两种中国之命运的斗争……………(235)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238)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240)

本章小结……………(242)

**第四章 人民解放战争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245)**

**第一节 党为反对美蒋反动派篡夺抗战胜利果
实而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
和我们的方针》的发表……………(245)**

美蒋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矛盾上升成为中
国社会的主要矛盾……………(245)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的发表·····	(248)
反对美蒋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	(250)
第二节 党以革命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的斗争 的巨大胜利。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 段”投降主义路线的破产·····	(253)
重庆谈判的胜利。《关于重庆谈判》的发 表·····	(253)
围绕着政治协商会议的斗争·····	(257)
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投降主义路线 的破产·····	(262)
减租、生产和练兵运动的开展。解放区的 巩固和发展·····	(266)
第三节 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的被粉碎。解 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普遍开展。人民 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进攻·····	(270)
全面内战的爆发。《和美国记者安娜·路 易斯·斯特朗的谈话》的发表·····	(270)
粉碎蒋军全面进攻的斗争。中国革命新高 潮的出现·····	(273)
粉碎蒋军重点进攻的斗争。国民党统治区 第二条战线的出现·····	(277)
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普遍开展·····	(281)
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进攻。“打倒 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的提出·····	(283)

第四节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发表。

人民解放军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285)

党中央十二月会议。《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发表……………(285)

粉碎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路线的斗争……………(288)

人民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对国民党军全线大规模进攻的开始……………(293)

伟大的战略决战的胜利……………(295)

第五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伟大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302)

粉碎美蒋新的“和平攻势”的斗争……………(302)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的发表。人民解放军

向全国进军……………(304)

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308)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311)

本章小结……………(314)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一九二一——一九二七)

第一节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 及其经验教训

一八四〇年，英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从十八世纪末期起的几十年中，英国向中国日益加多地输入鸦片。鸦片的输入，严重地毒害了中国人民，并大量地掠夺了中国的白银。鸦片贸易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一八四〇年英国政府借口保护通商，派兵侵略中国。中国军队在林则徐领导之下进行了抵抗。广州人民自发地组织“平英团”，使英国侵略军受到很大的打击。一八四二年，腐朽的清朝政府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南京条约》，除规定赔款及割让香港外，并开放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广州为通商口岸，输入中国的英国货物的税率由中英双方共同议定。

从此以后，美国、俄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也接踵而来，对中国进行掠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陷入了更加痛苦的深渊，除原有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之外，又增加了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封建统治阶级则成了帝国主义

奴役中国人民的走狗。帝国主义的侵略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一步一步地使封建主义的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进行了七十多年，有时曾发展到很大的规模。

太平天国革命，就是一次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农民革命，比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是一个跃进。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洪秀全，把西方基督教义的某些成分和农民的平均主义幻想结合起来，创立“拜上帝会”，在农民中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工作。一八五一年一月，洪秀全、杨秀清等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宣布成立“太平天国”。一八五二年出广西，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于一八五三年攻克南京，并在那里定都，同清王朝南北对峙。太平天国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反映了农民渴望取得土地的强烈要求。这个革命政权曾坚持斗争了十几年，它的力量达到过十多个省区，部分军队一直打到天津附近，震撼了清封建王朝的统治，并直接打击了外国侵略军。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统治者，极端仇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帝国主义者一面打着“中立”的幌子，麻痹太平天国的革命警惕性，一面通过英法联军的进攻，迫使清政府甘愿充当它们的走狗，然后联合起来镇压革命。而太平天国的领

袖们则对外国侵略者缺乏警惕，加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犯了不少错误，一八六四年，在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反革命军队联合镇压下，这次空前的农民大革命归于失败。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逐步形成了帝国主义和封建王朝的联合统治。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十九世纪下半期，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一八九四年，爆发了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新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一八九五年，中日签订了《马关条约》，清王朝承认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允许日本在中国开设工厂。其他帝国主义也援引“最惠国条款”，取得开设工厂等权利，从而打开了帝国主义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闸门。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一四年，英、美、俄、日、德、法等国，在中国工矿、交通等方面的直接投资，达到十亿七千万美元。这个时期在中国修筑的九千七百公里铁路，帝国主义直接控制的有三千九百公里，其余的则通过借款关系进行控制。机器开采的铁矿和煤矿，几乎全部操在帝国主义手中。帝国主义在中国办工厂、开矿山，残酷地剥削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直接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它们还疯狂地霸占中国领土，占领中国的重要港口，建立和扩大租界，并且把它们势力所达到的和企图侵占的地区，都划成势力范围，妄图瓜分中国。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一步加深了。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中，中国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一八九八年，中国发生了戊戌变法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实行君主立宪政治，依靠某些帝国主义，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这当然只能是君子们的幻

想。这次变法运动，只进行了一百零三天就被镇压了。戊戌变法的血的教训证明，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一八九九年，中国爆发了农民自发的反帝反封建的义和团运动。革命烈火燃遍中国北方，震撼了全国。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英勇地抗击了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的侵略，在保卫天津和北京的战斗中，给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是，因为缺乏正确的政治领导，义和团运动也最后失败了。

到了二十世纪初，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逐渐形成了一个革命派。一九〇五年，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组织了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以后并进行了几次英勇的起义。一九一一年十月，同盟会发动了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成功。接着，湖南、江西、安徽等许多省区也纷纷举行起义或宣布独立。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这是一次具有全国规模的、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统治中国达两千多年之久的封建帝制。

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完全决裂，因此不可能有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他们以为只要保障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实行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就可以使中国走向富强。在这种幻想的支配下，他们急于和反动势力谈判，向北洋军阀袁世凯妥协，追求廉价的胜利。他们向袁世凯保证，只要清帝退位，废除帝制，实行责任内阁制，就情愿让他来当大总统。一九一二年二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参议院按照议和条件选袁世凯为临

时大总统。三月，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就这样，资产阶级革命派把到手未温的政权让给了袁世凯，只剩下了一块“中华民国”的招牌。八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一九一三年，孙中山企图发动“二次革命”推翻袁世凯，然而没有成功，连原来掌握的几省地方政权也被夺去，只得出亡日本。辛亥革命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也在实际上瓦解了。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了。欧洲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妄图独霸中国。八月二十三日，日本对德宣战，并借此出兵山东，把德国从中国霸占去的租借地青岛、胶州铁路及其沿线权益据为己有。美帝国主义也打着“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旗号，力求扩大它在中国的势力。从此，开始了日、美两个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局面。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给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造成了某些有利的因素。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资本在中国的发展速度，却超过中国的民族资本。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依然在继续着。

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①。一心想当皇帝的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的支持，承认了“二十一条”。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登上了皇位，称“中华帝国皇帝”，决定次年改元“洪宪”。这种倒行逆施，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各地相继出现讨袁起义。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凯只好下令取消帝制。这场“皇帝梦”，只做了八十三天。树倒猢狲散，袁的一些爪牙也赶紧自谋出路，先后宣告独立。袁世凯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六月六日，在全国一片讨袁声中病毙。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接任大总统，实权则掌握在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手中，统治中国的依然是北洋军阀集

团。由于日、美等帝国主义的操纵，北洋军阀分裂成了若干派系。以段祺瑞为头子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头子的直系是最大的两个实力派。稍后，以张作霖为头子的奉系军阀也发展成为一大派。他们之间互相争夺中央政权。广东、广西、云南等省的地方军阀，为了维护自己的割据地位，联合起来，和北方军阀相对峙。此外，在各地还有一些小的地方军阀。各派军阀在各自的帝国主义主子的支持下，彼此交争不已。

一九一七年夏，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助下，企图赶走黎元洪。六月，黎下令解除段的总理职务，并调封建余孽“辫帅”张勋带兵入京。张勋乘机与保皇党头目康有为合谋，解散国会，赶走黎元洪，于七月一日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复辟。张勋复辟，引起了全国的反对，不过十三天就垮台了。十四日，段祺瑞乘机取得了在北京的统治地位。他向日本借债扩军，妄想用武力统一全国。南方军阀则打起“护法”的旗帜，成立军政府，推孙中山为大元帅，和段祺瑞相对抗。孙中山站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上，抱着恢复约法和国会的目的进行“护法”斗争，但是象潮湿了的鞭炮一样发不出声响来，挣扎了一年，徒为军阀政客所挟持，落得个孑然无助，颓丧而去。中国陷入了实际上的四分五裂的局面。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一九一五年九月，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一九一七年初，资产阶级自由派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邀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任图书馆长。以北大文科和《新青年》为中心，在北京开始发起了一个文化运动。陈独秀等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是因为没有进行一次思想革命，所以“国民愚

弱”。他们要求进行国民性改造的工作，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主义的旧道德、旧文学，实现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这个文化运动，开始了对两千年来统制人民思想的孔家店的冲击，表现了一定的锐气，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它的基本观点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他们的理论武器是从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学说到二十世纪帝国主义思想的混合物，因此，决不可能给中国革命指出新的出路。

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七十多年，它证明了一条真理：“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人民要求得解放，必须有新的领导阶级，由新的思想理论来指导。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 一九一七年，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始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

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新青年》发表了两篇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作者李大钊，是一个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在一片歌颂“公理战胜强权”，称赞欧战胜利的舆论声中，这两篇文章首先宣传了十月革命，曾经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它是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上来欢迎十月革命的，因而不能正确地认识与宣传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一九一九年一月，中国作为参战国，派代表出席了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平会议”。巴黎和会实际上是帝国主义战胜国的分赃会议。在会上，日本帝国主义坚持要由它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美、英、法等帝国主义狼狈为奸，支持日本的无理要求。而中国代表提出的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取消日本“二十一条”等要求，却被和会无理拒绝。这使中国人民又一次认识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但北洋军阀政府竟准备在宰割中国的“和约”上签字。与此同时，在巴黎和会上还暴露了一件外交秘密：原来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夺取山东特权的要求，早在一九一八年九月《山东问题秘密换文》中，段祺瑞政府已表示了“欣然同意”。

四月底，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全国人民群情激愤。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取消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一致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签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这时任交通总长）、陆宗輿（签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这时任币制局总裁）、章宗祥（这时的驻日公使）。游行队伍

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被阻之后，又到赵家楼，冲进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正在曹家的章宗祥，并放火焚烧曹宅。从这一天开始，运动迅速由北京向全国发展，天津、上海、长沙、济南、武汉、广州等地的学生也纷纷举行示威，表示声援。

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时，是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共同进行的。军阀政府妄图用暴力扑灭群众运动。到六月三日，在北京已逮捕了近千名学生。其他城市也随着进行逮捕和镇压。在这严重时刻，中国工人阶级挺身而出，站到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第一线。六月五日，上海工人发动了大罢工，参加的有纺织、机械、电力、市政、海运、印刷等各业工人六、七万人，加上搬运工人、码头工人、手工业工人、店员等达十多万人。六月十日，罢工达到高潮。沪宁、沪杭、淞沪等铁路工人举行总罢工。上海水陆交通全部断绝。罢工工人不顾反动军警的镇压，不管饥饿，以大无畏的精神坚持斗争。接着，唐山、长辛店、天津、长沙、济南、南京、武汉、杭州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示威游行和罢工。在工人、学生的推动下，上海等地的商人也举行了罢市。六三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显示了它的强大威力，成为五四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主力军。在工人阶级和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坚决斗争下，段祺瑞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三个卖国贼。六月二十八日，宣布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

动。它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两大旗帜，揭开了文化思想战线上空前的大革命。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对孔家店的迷信。这个口号变成了群众的革命口号，是中国思想界在历史上的新飞跃。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就是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主将。他的《狂人日记》，是五四反封建文化革命的第一声春雷。在五四运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革命知识分子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并逐渐发展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

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促使一批赞成十月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认识到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开始在广大群众中传播马列主义，走上和工农结合的道路。五四运动标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开始。它带着辛亥革命所不曾有过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姿态，表明中国的民主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同志的早期革命活动】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诞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从青年时期起，毛泽东同志就积极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他刚到长沙读书，还是一个十八岁的中学生，便参加了新军^②，积极进行革命活动。不久，因革命失败而退伍复学。一九一五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时，他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又参加了反对帝制的

斗争。从那时起，毛泽东同志就着手进行团结进步青年，准备革命力量的工作。一九一七年冬，他在长沙创办工人夜校，亲自讲课，在产业工人中做文化宣传工作。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筹备，一九一八年四月，成立了革命的青年团体“新民学会”，主要任务是研究新思想，寻找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诗词，充分表达了他青年时代意气风发和革命的凌云壮志。同年九月，为了组织和促进留法勤工俭学的活动，他带领一批湖南青年第一次到北京，并在那里工作到第二年二月。这时，正是十月革命在中国开始造成广泛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传播的时候。他利用北京的有利条件，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深入到长辛店铁路工人中进行调查研究。

一九一九年三月，毛泽东同志回到长沙。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立即在湖南组织响应。五月七日，以新民学会会员为核心的爱国学生，在长沙举行示威游行大会，声援北京学生。六月三日，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长沙各校实行总罢课。学生走向社会，斗争的浪潮迅速向全省扩展。七月九日，在学生联合会的推动下，又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长沙的工人、学生、教员纷纷组织起来，广泛开展查禁日货等反帝爱国斗争。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也参加了斗争的行列。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同志创办了著名的《湘江评论》，宣传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猛烈抨击旧文化。它不仅给湖南的群众运动以有力的思想领导，而且引起了全国进步思想界的重视。《湘江评论》的大部分文章都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写的，代表了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正确方向。它深刻地阐明了十月革命之后的世界形势，把五四运动

看成是整个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宣传了民众大联合的思想。

一九一九年七、八月间，当群众斗争正在胜利发展时，湖南督军张敬尧^④加强了对革命的镇压，下令解散学生联合会，查禁《湘江评论》。压迫愈大，反抗愈烈。九月起，毛泽东同志发动群众，开展驱逐张敬尧的斗争。十二月，张敬尧野蛮地镇压长沙各界人民焚毁日货示威大会，更激起驱张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一九二〇年初，毛泽东同志亲自带领驱张代表团第二次到北京，四月又由北京到上海。在这期间，《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的中译本开始出版，他抓紧时机刻苦学习了这些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

五四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斗争中成长，是五四运动从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的具体体现。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五四时期，中国产业工人的队伍已有二百万人左右。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的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要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等以外，还有它的许多突出的优点。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三种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同时，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

广大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于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从六三运动开始，中国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显示了无产阶级队伍的成长和壮大，这就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随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初步结合，在湖南、上海、北京等地，开始了党的筹建工作。一九二〇年五月，上海首先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七月，毛泽东同志在驱张运动胜利后，从上海回到湖南，积极进行建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发起成立文化书社，传播革命书报，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机关。八月，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并提出留俄勤工俭学的问题。九月，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九月间，北京、济南、广州也先后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十月，武汉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各地还相继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〇年八月，由张太雷同志等发起，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长沙、北京、武昌、广州等地也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各地创办了工人学校、工人俱乐部或新的工会，出版了通俗的工人刊物，如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广州的《劳动者》。在湖南，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工人运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他指出工人要达到解放，只有提高自己的觉悟，组织坚固的团体。他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积极分子，并经过他们去联系广大工人。到一九二一年上半年，长沙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已逐步组织起来。一九二一年“五一”劳动节，长沙工人举行了游行示威大会，提出了“加强团结”的战斗口号。

为了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必须划清两种思想界

限，批判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五四新文化运动打破了封建文化的统治之后，又出现了各种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进攻。一种是以胡适为代表的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一九一九年五月，美帝国主义御用学者杜威来华“讲学”。七月，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倡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革命。另一种是以研究系^④政客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从一九二〇年初起，他们请来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罗素到处“讲学”，大肆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⑤，口头上主张“温和的共产主义”，实际上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同时，无政府主义者鼓吹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宣扬绝对自由，提倡以互助主义代替阶级斗争。他们还组织了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和马克思主义争夺工人群众，具有很大的危害性。

在批判这些反动思潮时，出现了对立的两种方向。

陈独秀等人对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批判，是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出发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一九二〇年九月把《新青年》改为小组的机关刊物，十一月七日又创办了秘密的《共产党》月刊。他们以这两种刊物为主要阵地，进行了一些理论上的斗争，在翻译介绍一些马、列著作和国际共运经验等方面，曾起过作用。但是，陈独秀等人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他们在这些刊物上写的批判文章，不仅脱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而且继续宣扬了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观点。

对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真正有力的批判，是在群众斗争中进行的。为了批判这些反动思潮，毛泽东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和蔡和森同志的通信等文章中，批判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改良绝无希望，主张举起

马列主义的旗帜，改造中国与世界。他还针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指出一切反动统治阶级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只有马克思式的革命，俄国式的暴力革命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经过这些批判，划清了两种思想的界限，帮助了一批革命者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并使湖南无政府主义者黄爱、庞人铨转变过来，清除了无政府主义在工人中的影响。

就在对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批判中，毛泽东同志阐明了建党原则，坚决主张建立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密切联系群众的共产党。

毛泽东同志关于建党理论的阐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以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运动的广泛开展，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根据列宁“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号召，一九二〇年春，共产国际派代表来到了中国。到了这时，中国人民才突破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封锁，看到了苏俄政府一九一九年七月发表的对华宣言，直接了解到十月革命，进一步增强了中国人民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决心。就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推动下，上海出现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六月，共产国际再次派代表来中国，帮助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结合的基础上，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基本上成熟了。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派代表，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王烬美、邓恩铭、李汉俊等十二位代表，代表七十名党员。大会进行到第四天，遭到帝国主义密探的干扰，最后一天迁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继续举行。

大会讨论了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组织原则和机构等问题。在讨论中出现了两种错误思想，一种是合法主义的思想，认为无需建立有纪律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只要建立知识分子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公开组织。一种是关门主义的思想，反对任何公开形式的工作，认为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应一概拒绝他们入党。大会否定了这两种错误思想。大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章，规定了实行武装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最后消灭阶级的基本政治纲领。大会选举了中央领导机关。陈独秀没有出席会议。但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声名和党初创时期的幼稚，被选为总书记。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的光荣产物。中国人民经过了八十年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的反复过程，至此才有了能够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的革命政党。“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唯物史观的破产》）中国革命有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这是夺取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虽然只有几十个成员，几个共产主义小组，但是，这是新生力量，而新生力量本质上从来是不可战胜的。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培育下，中国共产党迎着革命的风暴，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了。

第三节 党的纲领和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美、英与日本之间争夺中国的斗争加剧了。美帝国主义为了同日本争夺中国的霸权，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参加的有美、英、日、法、意、中、荷、葡、比等九国。会议达成了瓜分中国的协议，签订了“九国公约”。它接受了美帝国主义提出的在中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打着“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的幌子，肯定了以美国为首的各帝国主义强盗共同宰割中国的局面。华盛顿会议以后，中国又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地位。

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造成了连年的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皖系军阀段祺瑞操纵了中央政权后，美、英帝国主义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支持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于一九二〇年七月，发动了直皖战争。直系打败了皖系的主力，取得了北洋政府的中央政权，控制着华北和长江流域一带的地盘。皖系失败后，日本帝国主义又竭力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在一九二二年四月，发动了第一次直奉战争。五月，奉军失败，撤回关外。此后，日本继续扶植奉系及皖系在浙江上海的残余卢永祥，同直系对抗。直系在美、英帝国主义策动下，力图“武力统一”全国，各地方军阀则标榜“联省自治”来对抗。

帝国主义同时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外国商品控制了中国的市场。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增设了许多银行，借款给军阀政府，进一步控制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帝国主义国家又在中国加速开办企业，进行铁路、矿山的投资，还通过“中外合办”的形式，兼并中国民族资本。这样，帝国主义不仅在政治上控制了军阀政府，而且完全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帝国主义的加紧掠夺，封建军阀的连年混战，地主豪绅的剥削有加无已，使中国民族工业陷于停滞，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遭受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日益加深，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军阀与人民群众的矛盾日益激化了。

在新的形势下，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进一步高涨起来，迫切要求党制定自己的革命纲领。这个任务，由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担负起来了。

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对于我们党制定民主革命的纲领，有着伟大的指导意义。一九二二年一月，在列宁的直接指导下，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了王烬美、邓恩铭、柯庆施等同志出席大会。大会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当前中国和远东各被压迫民族的主要敌人。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国产业工人的代表，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勉励中国工人团结其他革命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前进。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中国“这种半独立的封建国

家，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要实现中国的民主、和平与统一，“只有加入民主战争打倒军阀”。

七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十二名，代表党员一百二十三人。大会讨论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和当前的革命任务，通过了《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民主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等决议案和党的章程。

大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宣言首先分析了中国处于“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中国革命是反对“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就是党的最高纲领。宣言又提出，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奋斗目标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⑧这就是党的最低纲领。

党的“二大”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集中反映了亿万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进行了八十多年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但是，没有任何别的政党能够提出这样一个彻底的革命纲领。这个纲领的提出，证明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负起来。

但是，由于党还刚刚成立，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

法的认识，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在“二大”的决议中曾经提出了无产阶级“有加入民主革命运动之必要”，但是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这是“二大”的缺点。

【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初期农民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首先集中力量组织工人队伍。一九二一年七月，党在上海设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领导工人运动的工作机关，并发行了机关刊物《劳动周刊》。在党的领导下，从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一九二三年二月，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这次工人运动高潮是从香港海员罢工开始的。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香港海员工会第三次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要求，未得到答复，一千五百名工人开始罢工。第二天，罢工海员搭火车回到广州。至一月底，香港运输工人举行同情罢工，罢工人数增至三万人以上。英帝国主义大为恐慌，进行武力威胁，封闭工会，更激起了香港全市工人的同情总罢工。十余万工人步行回广州，行经沙田时，英国军警开枪扫射，打死工人六人，伤数百人。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纷纷声援，各地组织了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斗争坚持了八个星期，香港英帝国主义当局被迫承认增加工资，恢复原工会，释放被捕工人，抚恤死难工人。

接着，又发生了长江船员罢工，上海邮政工人罢工和上海日华纱厂罢工。

为了统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邀请各地工会代表，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一百六十二人，代表十二个城市一百多个工会、二十万会员。大会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大会通过了《罢工援助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决议案》、《铲除工界虎伥案》等决议案，确定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八月十六日，书记部由上海迁至北京，改为总部，由邓中夏同志任总主任，并且在上海、武汉、湖南、广东、济南设立了分部。《劳动周刊》改名为《工人周刊》。

党的“二大”后，工人运动走向新的高涨。一九二二年八月，爆发了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汉阳兵工厂罢工，上海丝厂女工罢工。十月，开滦煤矿工人罢工。在湖南，一九二二年十月到十二月间，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铅印工人大罢工和长沙手工业工人大罢工，并派人组织了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大罢工。同年十一月，成立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同志任总干事。到一九二三年二月，全国大小罢工共一百多次，参加人数达三十万以上。

在这些罢工斗争中，安源路矿的大罢工具有重大的意义。

安源路矿属于当时中国最大的企业汉冶萍公司，是帝国主义直接控制的官僚资本企业。路矿工人遭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政治上毫无民主权利，生活十分痛苦。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从上海回到湖南，担任了湖南党和工会的领导工作，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二一年秋，毛泽东同志跋山涉水，徒步从湖南来到安源。他一到安源，就串茅棚，下矿井，向工人进行调查访问，考察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情况。毛泽东同志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宣传革命的真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他号召工人组织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战斗，争取解放。毛泽东同志在安源亲自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安源工人怀着对

毛泽东同志无限热爱的深厚感情，从心底里唱出了一首动人的歌谣：

直到一九二一年，忽然雾散见青天，
有个能人毛润芝，打从湖南来安源，
他和工友把话谈，解除苦难不为难，
提议要给办工会，劳动工界结团体，
工人听了是真情，个个难舍又难分。

毛泽东同志回到长沙后，马上派人到安源，同工人一起开展革命斗争，并制定了工人运动的斗争策略。安源的工人群众，在毛泽东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迅速地觉醒起来。

一九二二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组织和领导下，办起了安源第一所工人夜校，发展了第一批共产党员，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安源支部。五月一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光荣地诞生了。毛泽东同志严厉批判了“联络感情，涵养德性”的机会主义口号，提出了“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的革命口号，作为俱乐部的宗旨。参加这个俱乐部的工人由原来的三百人，迅速发展到了七千多人，团结了大多数工人群众，为发动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一九二二年九月初，安源的一场革命的大风暴即将来临。在这紧要时刻，毛泽东同志又一次亲自来到安源。他参加了工人俱乐部的党支部会议，倾听工人的意见，并在会上分析了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明确指出安源工人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在罢工前夕和罢工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又多次指示安源工人，罢工的胜利，全靠工人自己的坚固团结和坚强斗志，要胆大心细，有勇有谋，要坚持到底，取得最后胜利。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部署下，九月十四日，安源路矿

一万七千多工人，举行了震撼全国的大罢工。工人们向路矿当局提出了十七条要求，高呼战斗口号，紧握岩尖、斧头，冲出矿井，同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资本家勾结北洋军阀政府，调来了大批军警，企图镇压工人。这时，工贼刘少奇也跳出来帮腔，替资本家出谋划策，搞什么“文明罢工”，出卖工人阶级的利益。觉悟了的安源工人，根本不理他那一套。他们把资本家和反动军警包围起来，占领了矿井和锅炉房，搬来了炸药，齐声对资本家喊道：如果不答应我们的要求，就打它个片瓦不存。斗争坚持了五天，终于粉碎了资本家和反动政府的破坏，迫使路矿当局同意工人提出的条件，取得了罢工的胜利。安源路矿大罢工的胜利，进一步推动了全国的工人运动。此后，毛泽东同志还几次到安源去指导工人革命运动。

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次罢工高潮，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极端仇恨。一九二三年二月，他们挥舞屠刀，对京汉铁路的罢工工人进行血腥镇压了。

京汉铁路各站工人，自一九二一年以来，陆续组织了工人俱乐部。到一九二二年底，全路十六个单位，都已有了自己的组织。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各站工人代表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军阀吴佩孚闻讯后，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会场，硬是不让工人开会。工人代表列队冲开军警的阻拦，进入会场，在反动派的武装包围下坚持开会，宣布总工会成立。吴佩孚接着又下令捣毁并封闭总工会。总工会即从郑州移至汉口江岸继续办公，号召工人向黑暗的军阀统治进行坚决的斗争。二月四日，总工会一声号令，在三个小时之内，全线工人都罢工了，所有客货车一律停驶，江岸一万多工人，上大街游行，高呼“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啊！”“打倒军阀！”等口号，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高度的觉悟和坚强的斗志。

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后，帝国主义驻北京公使团立即怂恿军阀政府用武力解决，汉口英领事还直接和军阀策划屠杀工人。二月七日，两营反动军队包围总工会，开枪打死工人三十二人，伤二百余人。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数十名工人被捕。反动派把林祥谦绑在电线杆上，向他连砍数刀，强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鲜血溅地，巍然不动，坚决回答说：“我的头可断，工是不上的！”^①最后宁死不屈，从容就义，表现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英雄气概。先烈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人们前进！同日，反动派在长辛店也进行了屠杀。二月二十五日，又在武昌杀害了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

惨案发生以后，党立即号召全国工人支持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抗议吴佩孚残杀工人的暴行。道清、正太、津浦、粤汉等铁路工人和汉阳钢铁厂、汉冶萍轮驳、扬子江机器厂等厂矿工人，纷纷举行了同情罢工。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举行了两万多人的大示威游行，并捐款救济“二七”遇难工人。京奉、京绥铁路工人，香港海员，以及上海、北京、广州等地革命群众，也都纷纷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

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在各地都对工人运动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工人组织遭到了很大的摧残。“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了低潮。只有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有坚实的基础，力量强大，工人组织才保存了下来。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也开始发

动农民运动。在湖南，毛泽东同志很早就进行了农民运动。一九二二年在湖南自修大学补习班的讲课中，他就指出，农民的出路只有起来斗争，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一九二三年初，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湖南党组织在衡山岳北白果开辟农民工作。九月，召开了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岳北农工会成立大会，发表了宣言，号召农民联合起来，为解除自己的困苦而斗争。农会成立后，会员迅速增至十万人以上。在农会的组织下，农民开展了平粜和阻禁地主外运谷米、棉花的斗争，同时酝酿减租减息。这些斗争，虽然受到反动武装的多次镇压，但是革命的烈火已经点燃起来了。

在广东，一九二二年彭湃同志组织海丰农民，成立了农会。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海丰县总农会成立，会员发展到十万人。这一年，天灾严重。农会领导农民进行减租斗争，但受到了反动派的镇压。海丰县农会的斗争，很快地影响了广东各地，陆丰、惠阳、紫金、惠来、普宁等县，也相继成立了农会，会员共有二十余万人。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统一战线策略的确定】 第一次罢工高潮，显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但是，斗争的实践说明，无产阶级不能孤军作战，如果不联合广大的同盟军，就无法战胜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之初，就初步提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党的“二大”正式发出了建立民主统一战线的号召。接着，我党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的国民党。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二十七人，代表党员四百三十二人。毛泽东同志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大会的中心任务，是讨论和确定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辛亥革命后，找不到出路，屡遭失败，一筹莫展。孙中山想整顿已经涣散了的国民党，也丝毫没有成效。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他在广东依靠军阀陈炯明重建军政府。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勾结北洋军阀叛变，炮轰总统府。八月，孙中山不得不再次退避到上海。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了孙中山以希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更给予孙中山以深刻的影响。“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论人民民主专政》）党的“三大”正确地分析了孙中山国民党，估计到把国民党改造成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的可能性，作出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了和孙中山国民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在讨论建立统一战线问题时，曾经出现了两种机会主义观点：

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陈独秀不懂得十月革命后世界形势发生的根本变化，否认当代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时代，坚持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认为中国革命仍然是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为目的的革命。他主张统一战线中“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把共产党完全合并到国民党中去，取消党的独立性。陈独秀在“三大”前后抛出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

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以及在“三大”的发言，宣称资产阶级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污蔑中国无产阶级“幼稚”，“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污蔑中国农民“散漫”、“保守”、“难以加入革命”，鼓吹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他提出了由国民党“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投降主义纲领。宣扬“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无产阶级只是从胜利中“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陈独秀妄图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认为无产阶级只能等待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之后，再来“领导”第二次革命。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及其政策在党内的反映。

另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观点。他们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农民、资产阶级是不能参加民主革命的。他们不赞成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员和工人、农民加入国民党。这是从“左”的方面否定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张国焘的“左”倾机会主义。大会决定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改组国民党为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三大”正确制定了党的革命统一战线策略，使党能够团结各革命阶级，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从而大大地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作了必要的准备。但是，大会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没

有作出明确的决定，对农民问题和革命军队问题也没有加以应有的重视。

第四节 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发表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党的“三大”以后，全党加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早在一九二二年八月，孙中山表示接受我党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建议。九月，孙中山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会议，研究了国民党改组计划，并成立了起草宣言、党章及党纲的机构。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我党帮助孙中山在广州组织了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共产党人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孙中山发表了国民党改组宣言、党纲草案，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一九二四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由共产党人起草的宣言。宣言接受了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有了反帝反封建的新内容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当时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阶级合作的政治基础。大会通过了接受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毛泽东同志、林伯渠同志等共产党人出席了大会，参加了领导工作，并被选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国民党中央有好几个部长都由共产党员担任，有的部则由共产党员担任秘书。许多国民党的省党部也由共产党员主持。所有的群众组织都

是共产党员领导的。通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改组成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实现了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我们党以广州作为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大力进行建立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当时，广东全省处在大小军阀各据一方的局面之下。军阀陈炯明占据了东江流域一带，陈炯明的党羽邓本殷占据了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等地，他们都得到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一些打着拥护孙中山旗号的滇桂军阀，也都在省内拥兵自重。广东全省军政、财政不能统一，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只有空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党联合孙中山，积极地将广东改造成为革命的基地。

一九二四年五月，在我党的倡议和推动下，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建立了军事学校，即黄埔军校。共产党人周恩来、叶剑英、恽代英、肖楚女等同志，先后在这个学校里担任各种负责工作，很多学生也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黄埔军校的创设，为建立革命军队打下了基础。

广州的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也有了新的发展。一九二四年七月，爆发了广州沙面罢工。沙面是当时英帝国主义的租借地。英帝国主义者颁布了一条新警律，规定中国人出入租界，必须带有执照，而外国人却可自由出入。十五日，沙面工人举行了反对英帝国主义侮辱中国人的大罢工。罢工坚持了一月余，取得了胜利。这次罢工，打击了帝国主义，震动了广州与香港。接着，广州工人成立了工团军。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也从东江一带向全省发展，并成立了农民自卫军。

英帝国主义把广东的革命势力看作它的死敌，指使反动

武装广州商团^⑥，于一九二四年十月间，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我党发动群众，制止了孙中山的动摇，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十月十四日夜到十五日晨，以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广州工团军、广州市郊农民自卫军等为主体的革命武装，消灭了这个反革命武装组织。经过这次斗争，广东革命政权初步稳定下来了。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 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二十人，代表九百五十名党员。大会通过了关于民族革命运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决议案，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建立党的组织。这次大会为加强党的领导，迎接革命高潮作了准备。党的“四大”，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大会没有注意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对武装斗争也缺乏应有的讨论，这说明，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仍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贯彻，推动了全国革命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加速了革命的步伐。继沙面罢工以后，上海、汉口等城市也发生了上万人的罢工斗争。到了一九二五年的上半年，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青岛、杭州、唐山等大城市和重要矿山的罢工斗争，便呈现出风起云涌的形势。

在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出席代表二百八十一人，代表了五十四万有组织的工人。大会通过了政治斗争、工农联合、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决议案。这样，中国

工人就有了全国性的统一组织，有力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大会闭幕不久，便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五卅”运动。

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海二十二个日资纱厂四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日本资本家被迫答应工人的部分要求，但事后却拒绝履行。五月中旬，上海日资纱厂的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的压迫，又举行了罢工。五月十五日，日本厂主开枪屠杀罢工工人，打死了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并打伤十多个工人。这一事件，引起了上海群众的极大愤怒。上海学生在党的号召下，纷纷起来支援工人。五月二十八日，党中央举行会议，决定在上海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示威运动。五月三十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二千多人，分头在租界内演讲，散发传单，揭露和控诉帝国主义压迫和屠杀中国人民滔天罪行，号召全体人民奋起反抗。他们的演讲，得到了广大市民的热烈响应，许多群众自动参加反帝示威的行列。在南京路上，群众和演讲队一起振臂高呼：“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长期蕴藏在人民心底的反帝怒火，炽烈地燃烧起来了。帝国主义派出大批武装巡捕，在南京路一带逮捕了一百多名工人和学生，关进捕房。愤怒万分的群众，一齐涌向英租界老闸捕房门口，高呼口号，要求释放被捕者。英帝国主义巡捕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十三人，打伤数十人，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后，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公愤，形成了大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当日深夜，党中央作出决定，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实现全市人民总联合的反帝大运动，并成立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次斗

争。三十一日晚，产生了上海总工会，统一了上海的工人运动。六月一日，在党的领导下，上海二十多万工人举行了罢工，五万多学生罢课，大部分商人罢市。六月七日，成立了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工商学联合会”。十一日，上海工商学各界二十万人集会，通过了向帝国主义交涉的十七项条件，包括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军队，惩凶，赔偿，道歉等内容。会后举行游行示威，情绪十分激昂。革命大风暴迅速席卷全国。北京、天津、汉口、长沙、南京、重庆等许多地方，广大群众纷纷起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五卅”运动成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序幕。

在全国反帝斗争的高潮中，影响最大的是广州和香港工人大罢工(简称省港大罢工)。六月十九日，在共产党人苏兆征等的组织下，香港十余万工人举行罢工，返回广州。二十三日，在广州的罢工工人举行示威游行，经过沙基时，英帝国主义开枪扫射，当场打死五十余人，重伤百余人，造成了“沙基惨案”。这一件事，又一次激怒了中国人民。香港罢工人数，一下子发展到了二十五万人。为了进一步开展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工人武装纠察队，对香港实行了严密的封锁。香港的轮船、火车、电车、汽车和工厂的机器，绝大部分都停止开动，商店歇业，银行挤兑，物价大涨，满街都是垃圾，香港一时变成了“臭港”，“死港”。这次大罢工坚持了十六个月，严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有力地支持了广东革命政府。

在这个时期，我党还进一步发动了农民运动。一九二五年春，毛泽东同志在韶山一带，亲自组织了二十多个农民协会，在斗争中培育了中共韶山支部。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

六年五月，广东农民协会发展到六十一个县，入会农民有六十二万人。海陆丰地区各县农民，热烈地开展了减租和反抗地主武装——民团的斗争，县农民协会实际上代替了当时的县政府，起了政权机构的作用。到一九二六年六月，全国农民协会会员达九十八万多人，形成了一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队伍。

农民运动的发展，需要培养大批干部。一九二四年七月，在广州成立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二五年从湖南到达广州以后，亲自主持第六届讲习所的工作。学员来自全国二十一个省区（包括内蒙古），人数增至三百余人，超出历届讲习所的人数。毛泽东同志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课程。周恩来同志、肖楚女同志、恽代英同志等，也在讲习所任课。讲习所特别注重阶级教育和调查研究，组织全体学员到广东海丰进行实地考察，为领导全国农民运动培育了大批骨干。

党依靠工农群众和革命军队，为统一和巩固广东根据地进行了多次革命战争。一九二五年初，广东的革命军队，从广州出发东征，得到东江农民的援助，打败了军阀陈炯明的军队。随后，又回师广州，消灭了盘踞广州的滇桂军阀。七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广东政府正式改组为委员制的国民政府。接着，便以黄埔学生军为骨干，将所有参加革命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共六个军。在这些军队中，普遍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政治工作由共产党员负责。从军部到连部的国民党党代表，实际上是共产党人。十月，国民革命军举行了第二次东征，消灭了军阀陈炯明的军队。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在这些战役中站在战斗的最前面。通过这些战役，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北伐战

争的基础。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惧怕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阴谋篡夺革命领导权，破坏革命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

从国民党开始改组起，国民党里的一些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就起来反对共产党，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后，他们进一步开展了反革命活动。十一月二十三日，以谢持、邹鲁为首的一些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非法的国民党第四次中央全会，公开反对三大政策。这个反革命小集团，被称为“西山会议派”。接着，隐藏在革命阵营中的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蒋介石，也伺机活动起来。辛亥革命时，蒋介石曾投靠上海政治流氓集团头子陈其美的门下。此后，在上海交易所充当经纪人，和买办资产阶级进一步勾结。一九二二年，跑到广东去投机革命，骗取了孙中山的信任。一九二四年，蒋介石以反革命的两面手法，先后窃取了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职位。他以黄埔军校中的一些反动军人和国民党反共分子为中心，在广州组成反动组织“孙文主义学会”^⑤，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他们鼓吹“戴季陶主义”^⑥，叫嚷马克思列宁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要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退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当时，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周报》上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政治论文，针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斗争。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东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坚决主张通过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

会的召开，开除一批公开反对共产党、反对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右派，争取在改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时，使我党和国民党左派占绝对优势。一九二六年一月，经过我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共同斗争，在国民党“二大”中，左派的力量占据了优势。大会重申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开除了谢持、邹鲁等人的国民党党籍。

但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熟视无睹，幻想用退让的办法来维持革命统一战线。陈独秀拒绝执行一九二五年九月党中央扩大会议提出的要坚决和戴季陶主义进行斗争的决定，而认为右派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非把他们挽留统一战线内部不可。陈独秀在上海同国民党右派分子进行了妥协谈判，把戴季陶、孙科等一些右派送回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并坚持把蒋介石、张静江等人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监察委员，这就为资产阶级篡夺革命领导权造成了有利的条件。

国民党“二大”后，蒋介石加紧阴谋篡夺革命领导权。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他指使爪牙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命令广东革命政府代理海军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派中山舰到黄埔给蒋介石使用。当中山舰抵达黄埔时，蒋介石又指使他的党羽散布谣言，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共产党要赶走蒋介石，推翻国民政府。三月二十日，蒋介石派兵占领了中山舰和其他军舰，扣捕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随后，蒋介石即强迫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完全篡夺了第一军的领导权。

“三·二〇”事变发生前，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要警

惕蒋介石发动突然事变。事变发生以后，毛泽东同志主张加以坚决的揭露和有利的反击，并抓紧时机建立共产党自己的武装。但陈独秀生怕得罪蒋介石，破裂统一战线，而顽固地拒绝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继续主张退让。他不仅不敢揭露事实的真相，反而荒谬地认为中山舰事变的发生，是因为共产党员“包办”了国民党的工作和蒋介石误信了“谣言”，竟然一再向蒋介石进行解释和道歉。六月九日，陈独秀还在《响导》上发表了《给蒋介石的一封信》，胡说什么：“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行动”，“复在广州阴谋倒蒋，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助长了蒋介石的反动气焰。

一九二六年五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进一步抛出了“整理党务案”，提出限制共产党的四条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各级委员会中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全部交给国民党中央保存，共产党给在国民党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指示要先经两党联席会议的讨论。对此，陈独秀竟以共产党中央名义，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四日写信给国民党中央，表示这是“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他竟然完全接受了这个反动提案，迫使在国民党中央担任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就这样，蒋介石顺利地窃踞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主席，国民党中央的组织部长、军人部长等职务，并安插他的党羽替代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部门的重要职务。蒋介石还在各省发展右派势力，排挤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发表】 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篡夺领导权的活动，批判党内的机会主义错误倾向，阐明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基本路线，一九二六年三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一光辉文献。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阶级斗争的现状和历史作了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及时总结了我党成立以来的革命实践经验，总结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了科学分析，正确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领导力量和同盟军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从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

无产阶级要不要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历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列宁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不关心资产阶级革命，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当时，在我们党内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自愿放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不要农民，竭力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应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成了当时党内的主要错误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不要农民，这是从“左”的方面取消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毛泽东同志对党内的两种错误倾向，指出只有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的正确领导，才能使革命有成功的把握。

“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怎样才能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呢？这

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清敌友，以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

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而国民党右派就是它们的政治代表。

毛泽东同志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需要革命和怀疑革命的两面性，指出资产阶级决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达到胜利。在国际上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下，民族资产阶级必定要很快地分化，没有“独立”的余地，在中国“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明确指出：“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联合的同时，必须保持阶级警惕，同民族资产阶级动摇妥协的反动倾向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资产阶级既然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那末应由那个阶级来领导呢？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揭示了我党成立四年多来工人运动所表现的伟大力量和重要作用，明确地宣告：“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国工人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他们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取得彻底胜利。

毛泽东同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与政治态度。中国半无产阶级和

小资产阶级的主要群众，就是农民，而其中“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正是这些贫苦农民，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迫切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因此，“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毛泽东同志的这篇光辉著作，解决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奠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

第五节 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

【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工农群众运动的兴起，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用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革命任务，已提到我们党的面前。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向国民党中央提出的反奉战争宣传大纲，指出广东革命根据地已获得了巩固，革命政府应致力于加强革命军队的训练和扩充，扩大工农及其他人民的革命运动，改革民政财政司法与教育，以便在最短的时间中发兵北进，举行北伐革命战争。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明确提出了“广州国民政府出兵北伐”，“不犹豫的、不妥协的对付吴佩孚并肃清吴系在长江的势力”的政治主张。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直接推动了北伐战争的发动。一九二六年四月初，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广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都提出了发动北伐战争的要求和主张。同年五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号召全国工人同农民一致奋斗，拥护和参加北伐战争。同月，党直接领导的以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的第四军独立团，作为北伐战争的先锋部队，首先由广东向湖南挺进。七月一日，广东革命政府发出《北伐宣言》。九日，国民革命军共八个军约十万人，正式誓师北伐。

北伐战争的主要对象，是直系军阀吴佩孚、原直系军阀而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吴佩孚有军队约二十万人，盘踞在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和陕西的东部、河北的一部，控制着京汉铁路。孙传芳也有军队约二十万人，盘踞在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等省。张作霖的军队约有三十五万人，控制着东北各省和北京、天津以及津浦铁路北段。一九二六年三月，在英、美、日帝国主义的唆使下，为了共同反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吴佩孚与张作霖互相勾结，并纠合山西军阀阎锡山，在河北、京津一带，进攻同情革命的国民军冯玉祥部^①。与此同时，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制造了“三一八”惨案^②，疯狂镇压北方的革命群众运动。六月间，吴佩孚、张作霖在北京密谋划分势力范围，策划反革命战争。他们议定：在南方，由吴佩孚出兵湖南，作为进攻广东的准备；在北方，由吴、张合力加紧攻击冯军。孙传芳也准备伺机进攻广东革命政府，同时挂起“保境安民”的招牌，对抗吴、张势力的扩展。

北伐军根据敌强我弱和军阀内部充满矛盾的情况，决定把主力指向湖南、湖北战场，首先消灭吴佩孚军队。同时，

分出两支钳制部队，分别警戒江西、福建的敌军。然后集中力量，进军东南各省，消灭孙传芳的部队。最后，进入长江以北地区作战，消灭张作霖的部队。

在湖南、湖北战场上，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锋，以第四军为主力，加上第七军第八军，共约五万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战斗力较强。叶挺独立团在人民群众的直接参战下，连克泗汾、醴陵。七月十二日，北伐军进入长沙。十九日，四、七两军在农民协会帮助下，由小路包抄敌军，一举攻克平江。二十二日，占领岳阳。接着，北伐军进入湖北作战。八月二十五日，吴佩孚急忙率部分主力，昼夜赶到武汉，决定死守汀泗桥，等待援兵，并策动孙传芳夹攻北伐军。汀泗桥一役，成了北伐胜利进军的重要关键。汀泗桥是粤汉路上的军事要隘，三面环水，一面高山矗立，易守难攻。吴佩孚在贺胜桥设下总司令部，亲自指挥二万多主力部队凭险顽抗，并以大刀队督战，下令“退却者，杀无赦”。二十六日，北伐军第四军猛攻汀泗桥，激战一天，进展不大。二十七日拂晓，叶挺独立团投入战斗。在农民的引导下，由右翼迂回，出敌不意，从高山上猛冲下去，突破阵地，敌人仓皇溃退。独立团在攻占汀泗桥后，不避艰险，乘胜追击，午前又攻占了咸宁县城。二十九日，独立团会同四军一部，穷追猛打，直趋贺胜桥，击溃敌主力数万人，夺取了吴佩孚的指挥阵地。吴佩孚狼狽退守武汉。九月一日，北伐军总攻武汉三镇。六日，克汉阳。七日，占汉口。吴佩孚逃往孝感，留下二万多人盘踞在武昌孤城，进行顽抗。北伐军围攻一月，未克。十月十日，第二次发起总攻，独立团首先攻占蛇山，突入城内。在这些决定性的战役中，叶挺独立团表现了勇猛机智，果断顽强的战斗精神，屡

建战功，光荣地被人民称颂为“铁军”。至此，北伐军取得了湖南、湖北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

在江西、福建战场上，由林伯渠、李富春等共产党人参加领导的第二军第六军为主力。九月间，两湖战局胜利在望，北伐军乘势占领了江西南部 and 西部，直逼南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一军教导师，为了抢占南昌，也急忙赶来。但由于蒋介石在该军排挤了共产党人，部队丧失了战斗力，与孙传芳一交锋，几乎全军覆没。后来，其他各军协力猛攻，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于十一月初占领了南昌和九江。在福建方面，由于孙传芳主力在江西战场，敌军内部又发生分化，第一军何应钦部未经战斗，在十二月十八日占领了福州。

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相继被歼以后，一九二七年初，北伐军分三路继续进军：西路由两湖北上攻河南，东路由福建攻取浙江，中路由江西向安徽、江苏进军，主要目标是夺取南京、上海。二月十七日，占领杭州。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解放了上海。北伐军随即进入上海。二十四日，攻克南京。

从一九二六年七月到一九二七年四月，不到十个月的时间，北伐军打垮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部队，从广州打到武汉和上海、南京，把革命从珠江流域一直推进到长江流域，席卷了半个中国。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

北伐战争能迅速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援。在北伐战争中，我党提出了正确的战略计划，在北伐军中进行了有效的政治工作，并组织了北伐军后方和北洋军阀统治区的群众斗争，直接或间接地配合了北伐战争。北伐出师时，广东工农

群众立即掀起了一个支援前线的运动。单是省港罢工工人，就组织了三千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和卫生队，冒暑随军出征。特别是我党领导下的湖南农民运动，给了北伐战争以有力的支持和推动。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各县纷纷成立人民反吴战争委员会，开展了大规模的支前参战活动。农民组织了交通队、暗探队、向导队、运输队、宣传队、慰劳队、疑兵队、破坏队、武装队等等，与北伐军并肩战斗。他们满山遍野布置松树炮和鸟枪爆竹，树起革命军旗帜，鸣号擂鼓，使敌军丧魂落魄，晕头转向。他们深入虎穴，侦察敌情，引导北伐军飞兵奇袭，使敌人措手不及，束手受擒。他们拿起各种梭镖鸟枪以至锄头扁担，直接参战，勇猛杀敌。正是有了千百万劳动群众的积极支援，北伐军方能有巨大的力量，迅速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工人运动的继续发展】 北伐战争开始以后，毛泽东同志从广州到了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随后又到武汉，担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集中全力领导农民运动。毛泽东同志在武昌主持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有十七个省的八百余名学员，又为全国农民运动培育了大批骨干。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一个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革命运动高潮，象急风暴雨一样，猛烈地开展起来。

湖南的农民运动，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站在全国农村大革命的最前列。北伐出师前夕，湖南全省已有农民协会会员三、四十万人。北伐军进入湖南，打垮了吴佩孚，进一步推动了农村革命的深入发展。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参加大会的有

五十二个县、两个特别区的农民协会代表一百七十人。开幕的那一天，工农群众二十多万人参加了典礼。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两次重要的讲话，强调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斥责了那种诬蔑农民运动为“惰农运动”的谬论。大会通过了减租减息，反对苛捐杂税，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政权，组织农民自卫武装等决议。一九二七年初，湖南全省已有五十多个县组织了农民协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人，能直接带领的群众达一千万人。组织起来的农民，开展了翻天覆地的农村大革命，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基础。在农民协会主持下，实行了许多打倒封建势力、扫除农村封建秩序的革命措施。农民推翻了封建政权，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政权，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乱说乱动。农民瓦解了地主武装，建立了自己的梭镖队，一切土豪劣绅，看到梭镖队就要打颤。在经济上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取缔了高利贷。农民协会还打击了封建宗法制度，并开始进行整顿乡村道路和兴修农田水利。这场农村大革命，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湖北的农民运动也迅速地向前发展。一九二六年七月底，湖北农民协会会员仅七万二千人，到一九二七年五月，猛增到二百五十万人。江西农民运动的发展也很快。一九二六年十月，农民协会会员不过六千人，到一九二七年六月，达到了三十八万二千人。广东的农民运动，在北伐战争期间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此外，福建、浙江、陕西、四川、安徽、河南、广西等地的农民运动，也都迅速地发展起来。到一九二七年六月，全国农会会员约达九

百十五万多人。全国农村大革命形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工人运动也猛烈地发展起来。北伐前夕，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已有七十六个工会，十余万会员。北伐军进占湖南后，改名为湖南全省总工会。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初，湖南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长沙举行，代表二十二万六千多会员。大会期间，毛泽东同志作了重要报告。湖北全省总工会和江西南昌市总工会，也分别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和次年一月宣告成立。此外，安徽、浙江、江苏、上海等地工人组织也很快地发展起来。工会组织的统一和扩大，使工人群众更有组织地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去。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工人，积极参加和支援了北伐战争。北洋军阀统治地区的工人，也以英勇的战斗来打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一九二七年二月和三月，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都因为准备不足或起义过程中客观形势发生变化而失败了。在准备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时，党委派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同志负责领导和指挥，组织了五千名工人武装纠察队，对上海市民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三月二十一日，上海总工会发布了全市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的决定。中午，有八十万工人参加的总同盟罢工实现了。接着，就转入了武装起义。英勇的上海工人阶

级，经过三十六小时的浴血奋战，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三月二十二日解放了上海，取得了起义的胜利。

中国工人阶级还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武汉二十万群众举行庆祝北伐战争胜利大会。我宣传员在英租界附近讲演，英帝国主义的大批武装水兵，横加干涉，当场刺死我海员一人，刺伤群众数十人。五日，汉口的工人和市民群众几十万人，举行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示威大会。会后，革命群众英勇地冲入租界，驱逐了英帝国主义的巡捕，收回了英租界。一月六日，在九江发生了英国军队枪杀工人的挑衅事件，工人及其他劳动群众英勇地占领了九江英租界。二月十九日，英国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签订协定，被迫承认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

【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罪恶活动】 当北伐军向长江中、下游进军，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的统治的时候，帝国主义就增调了大批军队到上海和长江流域一带，直接对中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和施加军事压力。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军到达武汉时，英帝国主义军舰公然援助军阀吴佩孚炮击北伐军。一九二七年一月，美帝调集驻檀香山和苏伊士的舰队以及驻菲律宾的陆军，赶赴上海。英国从本国和印度调集远征队一万二千名来上海，并把原驻我威海卫的第二舰队兵舰和鱼雷艇二十七艘移驻上海。日本帝国主义也在一月间派遣驱逐舰四艘和巡洋舰一艘来华，与英、美、法合力“保护上海”。三月二十四日，在北伐军占领南京的当天晚上，美、英、日、法、意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和领事馆，下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对南京的北伐军和居民进行猛烈的轰击，打死打伤中国军民二千多人，制造了“南京惨案”。

帝国主义还通过分化革命阵线，引诱中国资产阶级脱离革命阵营，从内部来破坏革命。一九二六年底，英帝国主义宣布所谓对华新政策，虚伪地声明毫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承认中国应有“关税自主之权”，企图以此麻痹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一九二六年初，美帝国主义派间谍分子到广州试探蒋介石的态度。次年一月二十六日，美国国务卿开洛发表了一项对华政策声明，宣布美国准备“以最宽大的精神”，与中国谈判关税和领事裁判权问题。二月，美国又派代表去南昌与蒋介石会谈。日本帝国主义则希望蒋介石和张作霖勾结，以便于它独霸中国。一九二七年一月，张作霖的代表与日本顾问曾到南昌和蒋介石密谈，蒋介石也派代表到北方同张作霖秘密协商。

在帝国主义的分化下，蒋介石开始了一系列叛变革命的活动。北伐战争开始时，他窃取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并擅自规定国民政府所属的陆、海、空军都归总司令统率，国民政府所属各省的民政、财政都归总司令管辖，各省各军的长官都归总司令任免。在北伐战争中，他沿途招降纳叛，收编了大批原北洋军阀“倒戈”的部队和土匪，大大地扩展了他的军事实力。一九二六年底，当革命发展到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时，蒋介石就在南昌安下了反革命的总司令部。他提出要把广东国民政府迁到南昌，以便加强控制。这一企图，在我党和广大群众的反击下，遭到了失败。一九二六年冬，蒋介石派戴季陶秘密去日本，谋求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并公开要求美、英帝国主义的援助。一批买办政客，纷纷麇集南昌，进行所谓“政治南伐”。原依附于北洋军阀的政学系反动政客黄郛、张群之流，出入于蒋介石的幕府，秘密策划反革命阴谋活动。江浙财阀虞洽卿也窜到南昌，以

反共灭共为条件，资助蒋介石六千万元反革命经费。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支持下，积极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 革命与反革命阶级大搏斗发展到了紧要关头。党能否正确领导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这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右派极端仇视农民运动。他们制造种种谣言和借口，恶毒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糟得很”。他们组织地主武装，同混在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勾结一起，拘捕、残杀农民领袖和革命群众。资产阶级也害怕群众的充分发动，叫嚷“工农运动过火”，污蔑农民运动“过分”，以此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分裂统一战线。

激烈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逐步发展起来了。一九二六年九月在党的四届三中全会上，陈独秀抛出了由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决案》，大肆鼓吹阶级投降主义，不许农民革命。在农民运动问题上，他指责“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或提出口号过高，或行动过左”，宣扬所谓“乡村统一战线”的口号，胡说农民协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规定“不可简单的提出打倒地主的口号”，主张农村土地问题应由农会和“正绅”来“仲裁”解决。在武装斗争问题上，他规定农民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在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上，他自愿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认为“自‘五卅’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已渐渐成了民族运动中之重要成份，且有领导此运动之趋向”，鼓吹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只能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到一九二七年初，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

党的领导机关占了统治地位。

为了粉碎地主资产阶级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分子对于农民运动的攻击和责难，紧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继续推向前进，一九二七年一月，毛泽东同志亲自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个县，对农民运动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总结了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三月，发表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革命的光辉文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同志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热情歌颂和高度评价伟大的农民运动，痛斥了阶级敌人和陈独秀之流诽谤农民运动的种种澜言，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如果连这一点子变动都没有，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几个月内做到了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所谓“糟得很”的谬论，完全是站在地主方面打击农民的反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针对陈独秀维护地主权力的反动主张，坚决地提出：“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踢上。”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为了打碎地主政权，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伟大号召。指出必须把地主手里的旧武装拿过来，一律改为“挨户团常备队”，放在农民

政权机关的管理之下。同时，还必须发展农会的梭镖队，建立“挨户团非常备队”，“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它，以为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东西。若被这种梭镖队吓翻了，那真是胆小鬼！”

无产阶级要真正实现对农民的领导，必须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这是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的唯一正确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大众，是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主力军，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而对着伟大的农民运动，“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这是检验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试金石。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光辉著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了农民革命运动的实践经验，公开揭露了蒋介石镇压农民运动的反革命面目，彻底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从根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农民建立革命武装和革命政权的伟大思想，从而指明了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前进的航向。

第六节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叛变。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挽救他们的反动统治，指使蒋介石明目张胆地向革命发动了进攻。三月十一日，蒋介石唆使爪牙杀害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十六日，以武力解散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十七日，在九江组织流氓匪徒，袭击国民党市党部和总工会。二十三日，在安庆收买流氓打手，捣毁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蒋介石从南昌、九江、安庆一路杀奔上海、南京，准备发动大规模的反革命政变。

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到达上海，立即表示“保证与租界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⑧，以进一步取得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帝国主义答应通过租界提供一切便利，并以驻扎在上海的三万多名侵略军，帮助蒋介石镇压革命。上海的大资产阶级表示愿意资助军饷，给蒋介石以经济上的支持。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则组织流氓打手，供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用。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大资产阶级，倒向蒋介石一边。

为了孤立上海的革命力量，蒋介石派何应钦去南京，把倾向武汉政府的北伐军三个团缴械，解散了南京共产党支部，并在杭州组织流氓匪徒，袭击总工会。蒋介石为了取得

国民党内各派反动势力，特别是与他同时进入上海的桂系军阀的支持，从四月一日起，与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以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汪精卫、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举行了一系列的秘密反共会议，制定了反革命政变计划。在蒋介石指使下，一小撮国民党政客，盗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开会，由吴稚晖提出所谓检举共产党的呈文，为反革命政变制造舆论。蒋介石还利用流氓、地痞、恶棍、工贼，组织了“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总会”，进行造谣破坏活动。他又将同情工农的一部分北伐军调离上海，另调新收编的旧军阀周凤岐部进驻市区，充当镇压革命的刽子手。并成立戒严司令部，发布戒严令，禁止罢工、集会和游行，限制人民的革命活动。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施展政治欺骗来麻痹群众。当工人代表要蒋介石澄清关于军队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枝的消息时，他满口表示：“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④四月六日，蒋介石假惺惺地派军乐队，给工人纠察队“赠送”写有“共同奋斗”字样的锦旗，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

在蒋介石积极策划反革命政变的形势下，陈独秀表现了可耻的机会主义的叛卖。陈独秀一贯忽视掌握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否认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自愿放弃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在北伐开始时，他就主张“防御”，反对出师北上。在北伐战争中，完全忽视了对军队的争取，不去扩大党直接指挥的军队。北伐军的指挥权大部落在同地主资产阶级有密切联系的旧军官手里，特别危险的是操在反革命头子蒋介石手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缴获了步枪四千支、机枪二十多挺。但陈独秀不仅没有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加强工人武装，而且对已经组织起来的二千七百人的工

人纠察队，也采取消极态度，不予支持。因此，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极少。蒋介石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外报纸早有披露，工人群众也多次反映反动派将对工人进行袭击，陈独秀却毫不在意，不作任何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直到四月五日，陈独秀还竟然伙同汪精卫炮制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这个宣言，不仅没有一字揭露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反而竭力为蒋介石涂脂抹粉，硬说蒋介石“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鼓吹同这个独夫民贼“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要群众“不听信任何谣言”。这就帮助蒋介石解除了群众的思想武装，使党和人民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

四月十一日，蒋介石在完成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之后，密令各省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行镇压。当日下午，大批反革命军队就布防上海街市。深夜，帝国主义侵略军首先越过租界，在南市、沪西、吴淞、虹口、闸北等区，拘捕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一千多人，送到蒋介石军队在龙华的司令部，进行毒刑拷打和屠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配合下，反革命的大屠杀开始了。

四月十二日凌晨，停泊在高昌庙的军舰上发出了信号。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打手，冒充工人从租界出动，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地的工人纠察队驻地进攻。工人纠察队奋起进行自卫反击。大批反动军队就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和青红帮流氓一起，疯狂屠杀工人。工人纠察队因事前没有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终于措手不及，一千七百支枪全部被缴，队员死伤三百多人，上海总工会也被反动军队占领。

上海人民看到打着“革命”旗号的军队，突然掉转枪

口屠杀工人，无不愤怒异常。当天，各区举行了几万以至几十万人的抗议集会，要求交还工人纠察队的枪枝，惩办流氓，肃清反动分子。南市区五十万群众在集会后，向龙华司令部进发。闸北五万多工人、学生和居民举行示威游行，从反动军队手里夺回了总工会会所。总工会宣布继续办公，并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决定全市总罢工，抗议反动派的血腥暴行。

十三日，上海丝厂、烟厂、电车、海员和店员工人等二十多万人，不顾白色恐怖，实行罢工。同日上午十时，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召开群众大会，虽然反动派沿途堵截，使沪东、沪西、南市的工人不能前来，但到会者仍有六万余人。大会一致决议要收回工人武装。下午一时，群众冒雨列队游行，高呼“还我武装”，“打倒新军阀”等口号。当队伍走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早已埋伏在那里的蒋介石反动军队，从四面八方向游行群众射击，同时用机枪扫射。顿时，宝山路上烈士的鲜血流成了河。在这次绝灭人性的大屠杀中，牺牲的有一百多人，受伤的不可数计。

接着，蒋介石公然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据不完全统计，反革命政变后的三天中，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的三百多人，被捕的五百多人，流亡失踪的五千多人。从这时起，上海到处是戒严、搜查、殴打、逮捕、公开的和秘密的屠杀。全上海陷入了血海之中。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等同志都在这一时期先后牺牲。这是刽子手蒋介石对上海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东南各省也陷于白色恐怖之中。四月十五日，广东反动派在广州发动“四·一五”反

革命政变，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封闭革命组织，屠杀革命者。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达二千一百多人，被驱逐的铁路工人有二千多人。肖楚女等同志也在这时牺牲了。国民党反动派还在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省，相继实行反共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在蒋介石的屠刀下牺牲了。烈士鲜血，染红了祖国大地。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血的日子，永远不会忘记这笔血债！

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树起“驱逐共产党员”，实行“反共”的黑旗，勾结广西军阀，笼络一部分国民党右派分子，在南京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权。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使大革命遭到严重的挫折。广大干部和党员群众纷纷要求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挽救革命的危机。陈独秀企图拖延大会的召开，但受到普遍的反反对，未能成功。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党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八十人，代表党员五万七千九百多人。大会的中心问题是总结过去的工作经验，讨论革命发展的前途，确定党在最近时期的任务。

会上，陈独秀作了长达五小时的政治报告。他对自己的投降主义，不仅没有作认真的检查，而且还多方辩解，坚持错误。他坚持认为，“中山舰事件”中的无原则让步是“正确的”策略，无产阶级只能进行经济斗争而不应该进行政治斗争。他还认为目前不是进行土地革命的时候，农民土地问题等待以后再说，不然就会影响北伐战争的进行。他被帝国主义、蒋介石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吓昏了头脑，认为在广州、

上海、武汉、天津及其他工业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不能发展革命力量，应当退出东南各省，到帝国主义力量比较薄弱的西北部去。这种逃跑主义的谬论，是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的继续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出席了这次大会，提出了挽救革命的重要提案，主张大力开展农民土地斗争，大力武装工农。但大会在陈独秀的把持下，拒绝讨论这些正确意见。由毛泽东同志提出并由各省农民协会联席会议通过的普遍实行土地改革的建议，在提交“五大”批准时，也遭到否决。陈独秀一伙还竟然把毛泽东同志排斥于大会领导之外，剥夺了他在大会上的表决权。

大会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但陈独秀的家长制领导，阻碍了批评的深入开展。同时，由于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对陈独秀错误路线的实质及其危害，缺乏深刻的认识，对武装斗争等许多迫切问题也没有解决。陈独秀表面上承认了错误，仍然被选为党中央的总书记。会后，陈独秀继续把持党中央，推行并发展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既然未能纠正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实际上就没有解决中国革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作出了正确的论断。他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国共产党人应当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加强军队中的工作。但是，陈独秀投降主义者拒绝接受斯大林的正确意见。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各种革命

力量随着集中武汉，武汉成了当时革命的中心。“四·一二”政变后，武汉政府处于反革命势力包围之中。蒋介石、广东军阀、四川军阀、奉系军阀从东南西北四面包围武汉，切断长江和京汉铁路的交通运输，对武汉实行封锁。帝国主义出动大批军舰停泊在汉口，并关闭在武汉的工厂、银行、企业。武汉地区的地主豪绅、反动军官和反革命分子乘机捣乱，攻击工农运动。民族资产阶级也以关厂罢业、抽逃资金，来对抗革命。武汉面临着严重的困难。

但是，武汉政府管辖的还有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广大地区，拥有七千万人口，有相当大的工农革命力量可以依靠。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消息传来，激起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无比愤怒，到处贴满了“打倒蒋介石”的标语。武汉举行了三十万人的群众集会，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讨蒋介石反革命罪行的群众运动。在人民革命力量的推动下，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继续进行国民革命，开除蒋介石的党籍，罢免其一切职务，下令讨伐。工人运动在继续发展。武汉工人接管了反动资本家非法关闭的工厂，并建立了一支拥有五千人、三千支枪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运动已从减租减息，发展到摧毁地主政权，进行土地革命。农民自卫军普遍地建立了起来，不仅有了梭镖，而且不少地方还夺取了地主团防的枪枝，在自卫军中成立了常备队。两湖地区的农民协会，惩办了不法地主豪绅，控制着粮食和食盐的运销，筹集了大批军粮供应前线。因此，只要我们党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大力组织人民武装，仍然可以有力地反击反革命势力的进攻，使革命继续前进。

然而，当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

造成了在革命紧急关头党内的极端混乱，使党无法领导革命前进。混在革命阵营的大资产阶级代表汪精卫，利用陈独秀的投降主义错误，迅速地走向公开叛变革命的道路。

汪精卫在上海参加蒋介石召开的一连串反共会议后，来到了武汉。在武汉地区革命高潮的形势下，汪精卫暂时隐藏起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继续打扮成国民党左派，大骂蒋介石是革命叛徒，表示要与共产党合作，因而仍然把持着国民政府主席的职务，窃取了武汉政府的党政军大权。随着武汉地区阶级斗争的激化，汪精卫也就暴露出其反革命的真面目。

一九二七年四月底，武汉国民党中央在汪精卫的要求下，组织了查办湘、鄂、赣各省“过激”言论行为的特别委员会。五月十九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了保护资产阶级、反对工人的宣言，声称要“充分保护工商业者之利益”，限制工人的“过火要求”，禁止工人纠察队的活动。次日，又发出保护“善绅”的命令，攻击农民运动“破坏公共秩序”。五月底，武汉政府下令解散湖北黄冈和黄陂两县农民协会。

与此同时，反动军官的军事叛变也接踵而来。一九二七年四月底，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在武汉纠集一小撮反动将领、官僚政客、国民党右派分子，策划在湖南、湖北发动军事叛变。五月十七日，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乘武汉北伐军大部分开往河南前线，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在宜昌发动反共叛变，率部进攻武汉，一直打到武汉郊区。叶挺部队从河南前线赶回武汉，进行英勇反击，将夏斗寅部击退。五月二十一日，在武汉国民党军事首领唐生智的支持下，何键部许克祥团在长沙叛变，发动了“马日事变”。许克祥查封了湖南省总工会、农民自卫军总部、特别法庭等革命机关，并夺去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枝，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群众领袖。六月

六日，反动军官、江西省长朱培德在江西叛变，宣布“共产党人限期出境”、“停止全省的工农运动”。

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活动已日趋明显，武汉已为反共逆流所淹没。但是，陈独秀还是极力拉拢汪精卫国民党，继续顽固地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六月三十日，陈独秀主持中央扩大会议，起草了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作出十一条规定，宣称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等等。总之，一切听从汪精卫国民党的摆布。汪精卫国民党反对工农革命运动，陈独秀不但不敢进行斗争，而且也跟着攻击工农革命运动是“无组织的自由行动”、“过火行为”，命令记者在报纸上写文章批评，并由党中央宣传部发宣传提纲“纠正”，扬言违者“严罚”。汪精卫国民党要共产党员退出武汉国民政府，陈独秀就借口“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⑧指示在武汉国民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可以“请假”，命令共产党员退出湖北省政府，要求各处地方政权必须尊重武汉政府之最高领导权。

特别是在武装斗争问题上，陈独秀更是采取了取消主义的可耻立场。夏斗寅叛变时，武汉地区的工人、农民、纠察队和童子团，都起来保卫武汉。武汉政府也被迫答应拨二千支枪给工人纠察队。但是陈独秀竟拒绝接受武器，以表示自己没有“阴谋”和对武汉政府的“忠诚”。许克祥在长沙叛变时，湖南十万农军拿起武器，高喊着“梭镖亮堂堂，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的口号，从四面八方围攻长沙。许克祥只有一千人枪，龟缩在长沙城内，农民武装是完全有可能把这些叛军消灭的。可是陈独秀却害怕会遭到唐生智的反对，竟然下命令停止进攻。结果，农民武装不战

而退，许克祥的反革命气焰更为嚣张，杀出城来，在各县屠杀工农一万多人，湖南农民武装几乎被摧残殆尽。六月底，陈独秀又借口“为避免挑拨离间的冲突起见”，^⑩下令解除武汉工人纠察队武装。这时，叛徒刘少奇，利用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职权，也积极加以配合。他们把武汉工人纠察队的全部三千余支枪枝和弹药，连同童子团的木棍，一起捆扎整齐，拱手交给汪精卫武汉卫戍司令部。

在革命的最危急时刻，毛泽东同志对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继续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许克祥叛变、湖南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时，毛泽东同志主动向党中央提出要求去湖南工作，组织革命群众反击反革命势力。可是只有十天，陈独秀就把毛泽东同志调回武汉，并且指责对反革命的反击妨碍了国共合作。蔡和森同志也写信给中央常委，反对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建议党中央及军委立即作一军事计划，坚决反击敌人，不作鱼游釜底，静待反革命处置。但同样遭到陈独秀的拒绝。一九二七年五月，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曾作出两次紧急指示，要求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工农，惩办反革命等。陈独秀一伙擅自扣留了文件，不让党内干部知道，却先送给汪精卫看。六月二十三日，在党中央的一次扩大会议上，当时担任团中央书记的任弼时同志，要求陈独秀向党员公开共产国际的指示，陈独秀竟以“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为借口，拒绝了任弼时同志的要求，并当场撕毁了青年团作出的关于拥护共产国际指示的决议。由于陈独秀凭借其总书记的权力，实行政治专制统治，压制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主张，顽固地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终于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汪精卫等在郑州和冯玉祥举行秘

密会议，决定公开反共。会后，唐生智率领武汉政府北伐军由河南返回武汉，镇压工农运动。冯玉祥派出代表去南京，和蒋介石密商武汉与南京的合作问题。十九日，蒋介石、李宗仁和冯玉祥在徐州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清党反共”，“宁汉合作”。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召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公开叛变革命。接着，汪精卫反动派在武汉地区举行反革命大屠杀，在“宁可枉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下，大批手无寸铁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样被断送了。

本 章 小 结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代。从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七十多年的英勇斗争。但是，这些斗争，包括洪秀全、孙中山领导的大规模的革命运动，都失败了。感谢伟大的列宁，他领导的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轰轰烈烈的人民解放斗争，并且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代表了党的正确路线。

但是，在这个阶段的末期，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他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这次革命遭到了失败。毛主席在总结第一次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在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的党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在这一阶段中，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经验也不少，但是不能够很好地总结起来。党内混入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没有清洗出去。党处于敌人和同盟者的阴谋诡计的包围中，但是没有警觉性。党内涌出了很多的活动分子，但是没有来得及造成党的中坚骨干。党的手里有了一批革命武装，但是不能掌握住。所有这些情形，都是由于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第一次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运动中英勇奋斗，流血牺牲，在中国人民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响，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没有这次革命的大演习，就不会有以后革命的胜利。我们党经过第一次大革命锻炼，经过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锻炼，在战斗中逐步成长起来了。

【注 释】

- ①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五月七日，发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该要求全文共五号，前四号包括德国在山东所掠夺的权利的移让，并要求增加日本在山东的新权利，日本在南满洲和东蒙的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居住权、工商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予第三国等条款，第五号所列款项则要求攫取统治中国的政治、财政、警察、军事大权，并欲攫取湖北、江西和广东之间的重要铁路建筑权。袁世凯除对第五号声明“容日后协商”外，都加以承认。但因中国人民一致反对，日本的要求未能实现。
- ② 新军是清朝末年编练的新式陆军。由于革命党人的秘密工作，不少地方的新军是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力量。武昌和长沙等地的起义，都是由新军发难的。
- ③ 张敬尧属皖系军阀。一九一八年，直皖联军战胜湘桂联军后，张敬尧进入湖南，任督军，驻长沙。在湖南无恶不作，为当地人民深恶痛绝。一九二〇年，直皖矛盾转剧，湘军乘机进逼。六月，张敬尧

不战而溃，退出湖南。

- ④ 研究系是以地主买办阶级代表梁启超为首的一个反动政治团体。一九一六年，梁启超任北洋军阀政府财政总长。他和汤化龙等封建官僚、反动政客组织了宪法研究会，简称研究系，依附于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革命统治的工具。
- ⑤ 基尔特是行会一词的英语译音。基尔特社会主义，是二十世纪初流行于英国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它主张通过“和平”的途径，用所谓基尔特社会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
- ⑥ 《中国问题指南》第二册。
- ⑦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 ⑧ 广州商团，是广东地区豪绅买办阶级的一支反动武装，以英国汇丰银行广州支行的买办陈廉伯和佛山大地主陈恭受为头子，以英帝国主义为后台。商团叛乱被镇压后，首恶分子逃往香港，大部分则缴械投降。
- ⑨ 孙文主义学会，是国民党右派的反共组织。它在蒋介石的指使下，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在广州建立。主要人物有王柏龄、贺衷寒、缪斌等。他们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破坏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一九二六年三月的“中山舰事件”，就是这个组织在蒋介石策划下进行的。
- ⑩ 戴季陶主义，是由蒋介石的忠实走狗戴季陶创立的。一九二五年孙中山逝世以后，戴季陶先后发表

《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大肆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反对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妄想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专政。

- ⑪ 冯玉祥所部原属直系北洋军阀。一九二四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直系军阀内部发生重大分化。冯玉祥率领所部起兵反直，从前线返回北京，占领了北京各要地，囚禁了直系头子曹锟，改组了内阁，使直系军阀在北京的统治迅速瓦解。北京政变后，冯玉祥把自己的部队改称为国民军，驻扎在北京、天津、河北一带。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八日，冯玉祥率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宣布拥护国共合作，参加北伐战争，随即带领部队进入甘肃和陕西地区，并进军河南郑州一带。
-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随着反革命逆流的高涨，冯玉祥改变了他的政治态度，参与了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但和蒋介石始终存在着利害冲突。“九·一八”事变后，他赞成抗日，一九三三年五月间，与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在晚年继续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
- ⑫ “三·一八”惨案，是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互相勾结屠杀中国人民的一次反革命罪行。一九二六年三月，在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张作霖部作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公然出动军舰，炮击国民党，掩护奉系进攻。事后又联合美、英、法等八国，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国民军在津沽间的

军事行动和撤除防务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京各界人民于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会后赴段祺瑞政府国务院请愿。段祺瑞竟令卫队开枪，并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群众死四十七人，伤一百五十余人。

- ⑬ 见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北华捷报》。
- ⑭ 见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申报》。
- ⑮ 均转引自《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 ⑯ 转引自《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第二章 土地革命战争

(一九二七——一九三七)

第一节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 政治形势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支持下，马上开始进行反革命的“统一”工作。当时的中国，除南京蒋介石集团和武汉汪精卫集团互相对立外，在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东北和河北、山东，阎锡山控制着山西，冯玉祥驻军洛阳；在南方，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在南京和蒋介石合作，桂系的另一部分李济深、黄绍竑则盘踞在广州，粤系军阀也保持着相当的势力。帝国主义操纵着各派军阀，造成连年不断的混战。日本希望促成蒋介石、阎锡山、张作霖的合作，以进攻汪精卫和冯玉祥；美英则企图实现宁汉合作，以进攻张作霖。一九二七年八月，汪精卫等人到南京和蒋介石进行政治分赃。九月，改组了“国民政府”。但是，因为分赃不均，十月就爆发了蒋介石、李宗仁和汪精卫、唐生智之间的战争。十一月到十二月，又发生了争夺广东的粤桂战争。一九二八年二月，蒋介石操纵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再一次改组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当上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独霸了党政军大权。接着，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

白崇禧四派新军阀，取得了暂时的妥协。四月，它们联合发动了所谓“统一”中国的“北伐”，进攻北方的旧军阀张作霖。六月，张作霖放弃北京逃往关外，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车站，被他的主子日本帝国主义炸死。国民党宣告“北伐胜利”。十二月，在美帝国主义的居间调停下，以张学良为头子的东北军阀宣布放弃“独立”，归从“国民政府”。至此，蒋介石反革命政权暂时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

蒋介石反动派利用他们掌握的国家政权，迅速地形成了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他们通过发行公债，贩卖军火，征收苛捐杂税，举借外债，投机买卖，兼并民族资本以及其他各种办法，横征暴敛，残酷地掠夺中国人民，集中了大量的财富。他们还通过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大银行，滥发纸币，控制了全国的金融。一九三六年，四大银行的资产总额和各项存款，均占全国银行的百分之五十九，发行兑换券占百分之七十八。加上他们所控制的其他银行，全国金融业绝大部分都为四大家族所霸占。同时，四大家族又逐步在商业、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确立了垄断地位。抗日战争前夕，四大家族已经独占了进出口贸易，控制了国家资本的全部工矿，统制了大部分私营工商业，掌握了大量的房地产，把持了全国的新闻出版事业。这样，四大家族就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形成为中国近代最大的垄断资本，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又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

蒋介石反动政权同北洋军阀政府一样，是国际帝国主义

统治中国的工具。它彻底地投靠外国帝国主义，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政府。蒋介石在实现“统一”以前，就积极寻求帝国主义的进一步支持。一九二七年九月，蒋介石带了亲日派政客张群访问日本，同日本帝国主义头子田中义一秘密商谈，达成默契。蒋介石以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和权益”为条件，换取了日本对他的支持。十一月，蒋介石又与美国签订了美蒋关系密约，并通过美帝走狗、大买办宋子文，同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更紧密地勾结起来。一九二八年三月，蒋介石竟向炮击南京、镇压中国革命的英美等帝国主义表示道歉和赔款。同年五月，蒋介石在美英帝国主义支持下进攻奉系军阀。日本为了阻止美英势力向北发展，派兵侵占济南，屠杀中国军民五千多人。全中国人民对此无不愤怒异常，而蒋介石却无耻地下令不准抵抗。说什么“日本要求枪枝，即以枪枝与之；要求捕作俘虏时，即听其捕作俘虏”，甚至提出“为救一日人，虽杀十人亦可”。^①拿着中国人民的头颅向日本侵略者乞降，彻底地暴露了这个卖国政权的反动本质。

由于蒋介石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迅速扩大了。帝国主义的对华投资，一九一四年为十六亿一千零三十万美元，一九三一年便增加至三十二亿四千二百五十万美元。帝国主义加速对华商品输出，使中国入超猛增，一九二七年为九千四百三十一万海关两，一九三一年增加到五亿二千四百零一万海关两。帝国主义还派遣了大批顾问，直接控制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大权，成为蒋介石政府的太上皇。

蒋介石政权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则实行法西斯专政。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是蒋介石维持其反动统治的反革命两手

政策。其中，军事镇压是主要的一手。蒋介石视军队如生命，在帝国主义的援助下，逐步建立了一支以黄埔系反动军官为骨干的反革命军队。这支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也超过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仅陆军，就有近二百个师。军费的支出，约占全部军政费用支出的百分之九十左右。蒋介石还建立了庞大的特务机构，渗透在国民党的党、政、军、文化教育机关直至经济部门里。其中最大的有两个，一个属于“C.C”系，一个属于蓝衣社。^②这些特务组织既采用了德、意、日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手段，又承袭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野蛮统治方法。蒋介石靠着这些反革命军队和特务组织，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向全国人民展开了进攻。中国人民处在旷古未有的暴政之下。

据极不完全的统计，在蒋介石上台后的五年中，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达一百万人以上。广大工人在大革命时期争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都被剥夺得一千二净。革命工会被封闭解散，积极分子被开除出厂，罢工成了“犯罪”的行为。工人大批失业。工资日益下降，仅武汉一地即有百分之八十的工人降低了工资。而工时却普遍增加了，一般由十小时延长至十二小时甚至十四小时。地主阶级疯狂地对农民进行反攻倒算。广大农民在大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革命权力被豪绅地主所摧毁，农民协会被解散，农民领袖遭迫害。农民负担的赋税，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代。例如，江苏许多地方的田赋附加税，到一九三三年已超过正税的十倍至二十六倍，湖南则超过十倍至三十倍。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大批失学失业。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也遭到各种苛捐杂税的压榨，濒临破产。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抛弃

了自己的同盟者工人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做朋友，得到的只不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上海民族资本的工厂被迫倒闭、改组的约有五百家，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八。

在国内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革命暂时进入了低潮。我们党被迫转入地下，同群众的联系受到很大的限制。党员大批被捕被害。一些在革命高潮时混进党内的不坚定分子，这时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有的叛变，有的脱党。党员人数从五万七千多人下降到一万人左右。工人运动暂时被镇压下去了。工会会员从二百九十万人减少到三万多人。农民运动受到了残酷镇压。一九二七年革命高潮时期，有组织的农民曾经发展到九百四十多万，这时则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民族资产阶级站到了蒋介石反动派一边来反对工农，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则由动摇而离开了革命。革命的力量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中国革命的头一个高潮过去了，新的高潮还没有到来，革命的形势正处于两个高潮之间。

但是，革命发展的基础是雄厚的。这是因为，引起中国革命的社会矛盾，不但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一天一天在激化。蒋介石政权的建立，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毛主席当时深刻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仍然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的内容，“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

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任务，就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正确分析中国的社会矛盾，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形势，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将革命逐步引向胜利。

第二节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反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著作的发表

【南昌起义。“八七”会议。秋收起义】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面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论联合政府》）蒋介石、汪精卫以及陈独秀这些反面教员，使我们党认识到领导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

一九二七年七月，党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并组成了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八月一日清晨一时，周恩来、朱德、叶挺等同志领导的南昌武装起义爆发了。参加这次起义的有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原北伐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南昌军官教育团和第二十军，共三万多人。经过三、四小时的战斗，敌军全部被歼，南昌城飘起了革命的红旗。起义胜利后，立即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召开了数万人的群众大会，颁布了革命政纲。南昌起义的消

息传遍四方，江西、湖南和湖北的农民纷起响应。可是起义部队没有和附近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以农村为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而是企图重新占领广州，打开海口取得外援，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然后再举行北伐。八月五日，起义部队离开南昌向南进发，经江西的临川、广昌、瑞金、会昌转入福建的长汀、上杭，再经广东的大埔进而占领潮州、汕头，沿途打败了大批堵截的敌军，但部队也受到很大的损失。十月初，这支冒暑远征的孤军，在汤坑、三河坝、潮州等地，受到优势敌军的围攻，激战数日，终于遭到严重的失败。留下的一部分部队退出广东，经过江西，缩编为一个团，由朱德同志任团长，陈毅同志任团指导员，进入湖南南部坚持斗争。

南昌起义的正确方面是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在全国人民中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错误的方面是没有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群众，建立根据地，而是城市中心，依赖外援。

八月七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清算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在领导权、武装斗争、土地问题上的错误，撤消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方针，指出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⑤会议还决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指出土地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党必须自下而上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八七”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战争和战略问题》）但会议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没有注意掩盖着的另一

种倾向，以致在着重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出现了“左”的倾向的抬头。

毛泽东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提出了实行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的正确主张，并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会后，毛泽东同志回到湖南，代表党中央领导改组湖南省委，并积极准备发动秋收起义。八月十八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秋收起义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指出：秋收起义的目的是要彻底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党应当以主要力量来领导武装斗争，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用枪杆子推动土地革命。湖南省委并决定成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来领导这次起义。

为了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同志亲自来到了安源矿工和平江、浏阳、醴陵一带的农民自卫军中，组织革命的武装。九月八日，震撼全国的秋收起义在湖南、江西边界各县首先爆发了。参加这次起义的，有未赶上南昌起义的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④，安源工人武装和平江、浏阳、醴陵、萍乡等地农民自卫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共约八千人。原计划分三路进攻，右路自修水进攻平江，中路自铜鼓进攻浏阳，左路自安源进攻萍乡、醴陵，向浏阳挺进，三路取得胜利后，在长沙工人的配合下，会攻长沙。起义发动时，毛泽东同志正在从省委到起义部队的路上。而起义部队在攻打浏阳等地的战斗中，遭到了严重的挫折，被迫退到浏阳文家市。毛泽东同志赶到文家市后，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认为要占领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是不可能的，于是说服了其他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沿湘赣边界南下，向井

冈山地区进发。部队在进军途中，打退了敌人多次的截击，于二十九日到达江西永新县境的三湾村。

在三湾，毛泽东同志以敢于革命、敢于斗争的精神，鼓舞指战员的革命斗志，扭转了部队由于战斗失利而产生的悲观失望情绪。接着，领导部队进行了改编，将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在改编中，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并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班排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置党代表。全军成立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同志亲自担任书记。“三湾改编”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建立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奠定了基础。

十月上旬，毛泽东同志率领这支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的大龙、茅坪，开始了创建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革命实践，把革命的红旗插到了巍巍的井冈山上。

紧接着秋收起义之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又爆发了广州起义。党的广东省委利用广东军阀张发奎、黄琪翔与广西军阀黄绍竑为争夺广东地盘而混战的时机，以广州工人赤卫队和叶剑英同志率领的第四军教导团为主力，发动了武装起义，并成立了工农兵政权——广州公社。但广州起义也没有认识到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必要性，队伍没有及时转移到附近海陆丰农村，同农民起义力量相结合。当国民党反革命军队五万多人，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围攻广州时，虽经三天三夜的血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告失败。起义的领导者张太雷同志也在战斗中牺牲。

此外，还有方志敏领导的江西横峰、弋阳等县起义，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彭湃领导的广东海丰、陆丰起义，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陕西渭华起义，张鼎丞、邓子恢

领导的闽西起义，滕代远、黄公略领导的湖南平江起义，以及湖北、河南、江苏、河北、山东、四川等地的起义。特别是方志敏同志领导的横峰、弋阳起义，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将起义队伍迅速转入山区，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不断扩大革命武装，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

以上这些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进攻的回击。它推动了武装斗争的发展，为创造工农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准备了必要的基础。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战争和战略问题》）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湖南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适时地把革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井冈山在罗霄山脉的中段，位于湖南、江西两省交界的边区，周围有遂川、宁冈、永新、酃县以及茶陵、莲花等县，方圆五百多里。这里离中心城市较远，敌人统治力量薄弱，而革命的发展却可以影响江西、湖南、湖北三省。井冈山人民深受豪绅地主的压迫剥削，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曾开展对土豪劣绅的斗争，经受过革命的洗礼。井冈山峭壁耸立，地形险要，作战时进可攻，退可守，周围又盛产稻谷南瓜，可供军队食用。因此，毛泽东同志选定在这里首先建立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经历了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红军初到井冈山时，附近各县的党组织已被敌人破坏

了，只剩下若干避难藏匿的党员。农民自卫军原有九百七十枝枪，仅保存下来一百二十七枝，其余一概被土豪缴去。经过革命失败的打击，群众的革命情绪受到严重的挫伤。一九二七年十月初，毛泽东同志到达宁冈的大龙、茅坪后，决定分兵到宁冈、遂川、永新、茶陵、莲花各县，开展游击战争。下旬，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建立了中心根据地。十一月中，毛泽东同志乘蒋介石、唐生智之间爆发内战的有利时机，派兵向茶陵游击，建立了茶陵工农兵政府。次年一月初，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打败地主武装肖家壁部，攻占遂川城，成立了遂川工农兵政府。二月中，毛泽东同志又亲自率领工农革命军攻打宁冈新城，缴枪四百多枝，活捉伪县长张开阳，并建立了宁冈工农兵政府。工农革命军打到那里，就在那里向群众作革命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群众建立农民协会等革命组织。各县党的组织也先后恢复起来。到一九二八年二月，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都已经有了党的县委，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工农红军还帮助地方建立群众武装，并把原在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起来了。一九二八年三月，成立了井冈山红色政权——湘赣边界工农民主政府。

一九二八年四月底，南昌起义余下的一部分部队，在朱德、陈毅同志的带领下，从湘南来到井冈山，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队伍会师。五月四日，两支革命军队在宁冈县砬市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共约一万多人，二千多支枪。毛泽东同志任党代表，朱德同志任军长。同时，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作为军队和地方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由毛泽东

同志任书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革命从城市向农村的退却，但又是向反革命力量较弱的农村的进攻。它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道路，这就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农村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在党领导下依靠枪杆子发展起来的。一九二八年四至七月，正是南方反动统治暂时稳定的时期，江西、湖南两省敌人，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多次“会剿”，妄图扑灭这个革命的火焰。敌军少者八、九个团，多者达十八个团，超过红军数倍。然而，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地方赤卫队的配合，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粉碎了敌人的“会剿”。毛泽东同志总结了红军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十六字诀的作战原则。在这个正确原则的指导下，红军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五月初，敌人进攻遂川的五斗江，红军避实就虚，从侧面打击敌人，在黄坳、五斗江等地，消灭了来犯之敌，还攻占了永新县城。不久，敌人又来进犯，红军先在茶陵的高陇打退了湖南敌军，接着又在永新的澧田打退了江西敌军，乘胜第二次攻克永新。六月中，号称江西劲旅的杨如轩、杨池生两个师敌军，由永新进犯宁冈。红军在龙源口、七溪岭一带，从腹背两面猛击敌军，打得敌人降的降，逃的逃，丢枪乱窜。我军乘胜追击，第三次攻克永新城。当时红军中流行着这样两句歌谣：“不费红军三分力，打垮江西两只羊（杨）。”生动地反映了这次战斗的胜利。红军反“会剿”战争的胜利，使井冈山根据

地的固定区域，扩大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和吉安、安福、遂川、酃县各一部的广大地区。

红军战争的胜利，推动了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开展。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但在根据地初创时期，主要的任务是开展打土豪的斗争，分配土地只在少数地区试行。一九二八年五月，毛泽东同志主持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着重讨论了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问题。这次大会成立了湘赣边界特委，作为地方党组织的统一领导机关，由毛泽东同志任书记。大会以后，各县在特委的领导下，加强了对土地革命的领导，县、区、乡都普遍设立了土地革命委员会。于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分田以乡为单位，一律按人口平均分配。极少数山多地少的地方，也有三、四个乡为一个分配单位的。同时，还开展了废债运动。通过分配土地的实际斗争，取得了初步经验，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土地革命的法令——井冈山土地法。

由于土地革命的开展，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深耕细作，修塘、筑陂，使农业生产获得了丰收。如宁冈粮食总产量，一九二八年比一九二七年增产了百分之二十。油、茶的丰收，更是十几年来所没有的。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红军游击战争，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根据地的建设，对于支持红军的革命战争，巩固土地革命的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同志指出，必须在革命斗争中，建立一种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红军每到一地，就帮助群众建立各级工农兵民主政权——工农兵代表会议和工农兵政府。随着根据地

的发展，革命政权日益扩大，不仅各县有工农兵代表会议和工农兵政府，区、乡的基层政权也建立起来了。在红军的积极帮助下，还普遍成立了地方群众武装。村、乡有工农暴动队，区、县两级有赤卫队。这些地方革命武装，在镇压反革命，保卫红色政权，粉碎豪绅地主的进攻，配合红军作战等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革命政府又采取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政策，领导农民搞好农副业生产，开办为战争服务和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小工业和手工业，保护私营工商业，实行自由贸易，使井冈山区的经济逐渐繁荣起来，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此外，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较之过去有所发展。根据地建设的成就，使红军战争有了可靠的后方，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进行。

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井冈山的斗争》）在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出现了“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的大好形势。一九二八年十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案，总结了一年来井冈山斗争的经验，选举了新特委，确定了新的任务，进一步发展了大好形

势。

毛泽东同志亲自开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象黑夜中燃烧着的一把火炬，照亮了亿万人民的心，指明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

【反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斗争】 当我们党同国民党分裂，反对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之后，瞿秋白却借口“排除”右倾机会主义的“遗毒”，推行他的盲动主义错误路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瞿秋白主持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一次在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主要表现在革命形势、革命性质和革命道路问题上。

在革命形势问题上，瞿秋白不承认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潮流暂时低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所谓中国革命“不断高涨”的主观主义估计。他看不到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而是幻想速胜，武断地认为全国已经具备了“直接革命的形势”，各地人民的革命斗争“有汇合起来成为工农民众的暴动推翻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之趋势”。

在革命性质问题上，瞿秋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鼓吹中国革命是所谓“无间断的性质”。他认为“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速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梦想在完成民主革命的同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盲目地鼓吹“‘一次革命’直达社会主义”^⑤。

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瞿秋白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

鼓吹违背中国革命实践的“城市中心论”。他宣扬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胜利的关键，胡说党的责任是“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竭力贬低农村根据地和农民武装斗争，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从上述“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出发，瞿秋白提出了一系列极“左”的政策。他反对组织有秩序的退却，主张冒险进攻。他醉心于中心城市的工人暴动，制定了在上海、武汉、天津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大暴动的计划，幻想革命在一个早上取得胜利。他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左翼，主张“征发有产阶级的财产”。他反对区别对待地主与富农，主张一律没收他们的土地，要求在根据地土地革命运动中多杀多烧。他还提出损害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种种政策，强令各地党组织贯彻执行。

为了推行“左”倾盲动主义的政治路线，瞿秋白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的政策，滥用组织纪律，错误地处罚了党的许多领导干部和地方党委。他十分恼火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诬蔑组织革命武装是所谓“单纯的军事投机”，甚至利用职权打击毛泽东同志，在组织上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处分决定。

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严重地干扰了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一九二八年三月，执行瞿秋白“左”倾路线的湘南特委派代表到井冈山，指责井冈山根据地“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就撤消了井冈山前委，夺了毛泽东同志的权。同时，又强令工农革命军冒进湘南，使井冈山根据

地被敌人占领了一个多月。

毛泽东同志坚决抵制和批判了瞿秋白的错误路线与“左”的政策，正确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和道路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左”倾分子否认革命处于低潮是犯了“革命急性病”，“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同志驳斥了“左”倾机会主义者混淆两个革命阶段的谬论，指出“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实践中，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井冈山根据地推行的错误政策，在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对待中间阶级和中小工商业者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正确政策，使井冈山根据地重新得到巩固和发展。

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由于在实践中给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由于受到毛泽东同志的反对与抵制，许多地方先后停止执行。到一九二八年四月，就在全党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了。

但是，这时湖南省委仍然受瞿秋白错误路线的影响。七月，省委派出代表来到井冈山根据地，乘毛泽东同志在永新指挥作战的时机，把红军两个团从酃县拉去湘南，攻打郴州，结果又造成“八月失败”，使井冈山根据地大部分为敌人所占，红军损失了近一半。在这危急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率领在永新的一个团，用四面游击的方式打击敌人，并亲自到湘南迎回红军主力，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恢复了井冈山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恢复和发展，正是毛泽东

同志的正确路线战胜瞿秋白的错误路线的伟大成果。

一九三四年，在红军长征开始后，瞿秋白曾留在中央根据地。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经福建武平去白区的途中，被国民党军队逮捕。不久，瞿秋白变节自首，向敌人出卖了我党我军的机密，还写了臭名昭著的自白书《多余的话》，背叛了党和革命，成了可耻的叛徒。同年六月，被国民党枪杀于长汀。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了总结第一次大革命的经验，正确估计革命的形势，确定新形势下的任务和方针，一九二八年七月，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正式代表八十四人，候补代表三十四人，代表党员四万多人。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底决议案》等文件。

“六大”分析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指出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并没有被推翻，国民党政权仍然代表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根据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分析，大会指出：“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废除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民主专政。大会并提出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①

“六大”指出中国革命正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但引起革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形势下，党的策略任务不是实行进攻，不是普遍地组织起义，而是争取

群众，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大会认为：“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底群众，使他们围绕着党底主要口号。做极巨大的组织工作，以巩固革命工会、农民协会，尽可能地领导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以发展工农群众组织。”

“六大”进行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方面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出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无产阶级底先锋队——共产党指导机关底机会主义政策”，断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另一方面，批判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指出盲动主义者在敌人力量占着绝对优势的大城市举行武装暴动，是一种强迫命令的军事冒险，是“不要群众不顾群众的盲乱的瞎干”，其结果是降低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丧失了革命的力量。这种“左”倾盲动是与党的争取群众这个主要任务相违背的，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

党的“六大”提出的上述问题，都是当时中国革命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经过讨论，使我们党在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上了明确的方针，进一步克服了由于大革命失败所引起的党内思想混乱。因此，在“六大”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毛主席指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在我党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学习和时局》）但是大会也有缺点和错误，例如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极大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极大的重要性，没有正确估计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等。

毛泽东同志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但被大会选为中央委员。毛泽东同志贯彻执行和发展了大会的正确方面，又在实践中解决了大会所没有解决的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著作的发表】毛泽东同志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在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形成起来的。为了坚持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驳斥“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种种责难，正确回答工农武装割据能否发展和胜利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总结了经验，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重要著作，从理论上阐明了在中国武装夺取政权不能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农村，而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我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指出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五个条件：

第一，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中国的社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地方的农业经济，农村可以不完全依赖城市而相对独立。农民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有最深厚的群众基础。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中国统治阶级内部长期的分裂和不断的战争，削弱了反动政权的统治力量，而农村则是这个反动统治锁链中最薄弱的环节。“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

第二，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如湖南、江西、广东、

湖北等省，曾经有过工农群众运动的高潮，有过工会和农会的组织，群众经受过革命斗争的锻炼。这些，都为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政权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存在着深刻的社会矛盾，这是革命的基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但不可能解决中国的社会矛盾，而且必然加深矛盾的发展。“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没有革命武装，就没有革命根据地。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这是保证红色政权得以坚持和发展的最要紧的条件。建立红军，土地革命，建设根据地，都必须有党的坚强领导。有了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就能使革命根据地获得巩固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开创的这条“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包括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设根据地这三位一体的内容。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没有革命武装，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也不能建立和发展根据地。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没有土地革命就不能充分发

动农民群众，红军战争就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阵地，不建设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而将陷于失败，土地革命的成果就无法保持。

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正确地分析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毛泽东同志创造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反对陈独秀取消主义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撮右倾投降主义者，对革命完全丧失信心，变成了可耻的取消主义者。陈独秀反对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诬蔑党所领导的农民土地革命、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为“流寇运动”，主张开展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从一九二九年七月开始，陈独秀连续给党中央写了三封信，鼓吹托洛茨基主义，提出了一整套取消主义的政治主张。陈独秀认为蒋介石反革命政权的建立，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封建势力“受了最后打击”，“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①。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结，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并将得到和平的发展。无产阶级要等到将来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再来搞“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央还没有决定答复之前，陈独秀擅自将自己给中央的信发给地方党组织，同时还在中国托洛茨基派的机关报上发表。陈独秀并在党内组织秘密小集团，进行宗派活动，煽动党员起来反党，妄图分裂我们的党。

我们党对陈独秀的反党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

二九年十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严肃地批判了陈独秀的托洛茨基主义观点和反党分裂活动，指出陈独秀必须服从中央的决议，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停止一切反党活动。但是，陈独秀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不接受党的警告，拒绝中央指派他的工作，继续进行反党阴谋活动。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党中央决定将陈独秀及其同伙彭述之等人开除出党。

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出党后，就公开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他们和托派分子刘仁静等勾结在一起，组成了托陈取消派，即所谓“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奉托洛茨基为首领，在上海设立中央机关，由陈独秀充当“总书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陈独秀、刘仁静、彭述之等八十一人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即托陈取消派的纲领。这个反革命纲领打着托洛茨基主义的黑旗，提出了六项“奋斗目标”，公然为托洛茨基翻案，叫嚷要“重新审查中国革命过去的教训，并决定新的政治路线。”实质上就是反对我们党领导的各种革命斗争，特别是反对毛泽东同志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以维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我们党坚决地批判了陈独秀一伙的取消主义，彻底地揭露了他们的反革命叛徒嘴脸。以后，托陈取消派分子公开加入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等接受托洛茨基匪贼的“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进一步堕落为汉奸、卖国贼。

第三节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著作的发表。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和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斗争。工农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由湘东北平江起义部队组成的红五军到达井冈山，在宁冈与红四军会师，进一步壮大了革命的声势。这时，蒋介石又指使湖南军阀何键，调动湘、粤、赣三省十八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新的“会剿”。为了打破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进攻和进一步扩大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九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井冈山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以及边界各县县委，在宁冈白露村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在更广大的地区内开展游击战争。

一月中旬，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了红四军进军宣言和布告，通俗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与政策，号召工人、农民、士兵群众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而斗争。二月，红四军经会昌、瑞金县境，在大柏地打垮了跟踪之敌，乘胜进占宁都。接着，三次进军闽西，“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第一次，在长汀附近，

消灭了地方军阀郭凤鸣旅。三月底，回师赣南，占领兴国、瑞金、雩都、广昌等县，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五月，再次入闽，二十三日攻入龙岩城。七月，又消灭了地方军阀陈国辉旅。十月，第三次入闽，在上杭消灭了地方军阀卢新铭旅。至此，完全铲除了闽西的敌军，并先后攻克了长汀、上杭、连城、永定、龙岩、武平、宁洋、漳平等地。一九三〇年初，红四军经过宁化、清流、归化，回师赣南。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红军新开辟的赣南、闽西各县根据地，都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一九三〇年二月，赣南工农民主政府在东固成立。当地发展起来的武装编为红三军。三月，闽西工农民主政府在龙岩成立。当地发展起来的武装编为红十二军。六月，以红四军为骨干，同红三军、红十二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为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党还在其它地区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九年六月，红五军奉命转回井冈山，使得湘赣边区逐步恢复起来。次年，湘赣区与湘鄂赣区联成一片。原湘鄂赣区发展起来的红八军与红五军合编为红三军团。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赣东北工农民主政府成立。第二年夏，赣东北红军与闽北独立团合编为红军第十军。根据地扩大到闽北、浙西、皖南，形成了闽浙赣根据地。一九三〇年，洪湖根据地的游击队编为红六军，湘鄂西根据地的红军编为红二军。六月，红六军与红二军组成红二军团。一九三〇年春，鄂东北、豫东南、皖西三个区联成一片，形成鄂豫皖根据地，一并建立了鄂豫皖特区工农民主政府。三个区的革命武装合编为红一军，以后又和鄂中的红十五军组成红四军团。一九二九年十

二月，广西右江成立了红七军，并建立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一九三〇年二月，左江成立了红八军，并建立了左江革命委员会。广东的东江和海南岛也发动了游击战争。一九三〇年，成立了海南岛工农兵政府，建立了红军琼崖独立师和娘子军连。一九三一年，陕甘边境开展了游击战争，第二年创立了陕甘根据地，同时在陕北也开始了游击队的活动。

红军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土地革命的开展。红四军进入赣南、闽西后，土地革命就在这里蓬勃地开展起来了。红四军所到之处，传遍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一九二九年三月，红四军到兴国时，兴国县革命委员会的政纲中已提出“没收豪绅地主土地、山林，并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烧毁田契借约”等主张。八月，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红四军要协助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并亲自在农村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对闽西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作了具体的指示。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闽西根据地的龙岩、永定、上杭、连城、武平、长汀等县纵横三百多里的地区内，近八十万人员起来，投入了土地革命斗争。先是发动烧田契、分谷子、派款、抗租，接着又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出现了一派分田分地真忙的革命景象。一九三〇年二月七日，毛泽东同志在富田召开的赣西赣南特委联席会议上，总结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了一条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保护中小工商业的土地革命路线。根据地党、政、军代表都出席了这次会议，详细地讨论了土地政策，排除了机会主义思潮的干扰，进一步推动了以平分土地为中心的土地革命运动。与此同时，党在湘赣、闽浙赣、洪湖、湘鄂西和鄂豫皖等根据地，也领导农民进行了

土地革命斗争。

【古田会议的召开。《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发表】 随着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战争的迅速发展，工农红军的队伍也日益扩大。这时，加强党和红军的建设，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同志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向赣南闽西进军的战斗中，进一步强调了要在党和红军内进行路线教育，并建立了军队中的民主制度，确定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一九二八年春，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第一次为红军规定了三大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同年夏，又提出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一九二九年以后，将三大纪律中的第二条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第三条改为“筹款归公”，后来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并补充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注意，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同志同时还规定了红军要执行打仗、做群众工作、筹款等三大任务。

但是，在红四军内部始终存在着两种建党建军思想的激烈斗争。红四军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主要表现在：否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出什么“司令部对外”的口号，否认军事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认为红军的任务只是单纯地打仗，轻视军队的政治工作，对士兵或打骂，或放任自流，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片面主张军官的权威高于一切，不要军队的民主制度，不注意群众纪律，轻视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提倡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

点、绝对平均主义。一九二九年七月和十月，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和上杭，先后召开了第七、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在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控制下，夺了毛泽东同志的权，迫使毛泽东同志离开了前委的领导岗位。在资产阶级军事思想指导下，战事不断失利，部队遭到很大的损失。实践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才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十一月底，毛泽东同志重新回到了前委书记的领导岗位。毛泽东同志在经过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以后，十二月底在福建上杭古田村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建党建军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深刻地批判了红军党内各种错误思想，为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和新型的人民革命军队，规定了基本路线。

古田会议提出，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中的根本原则。“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否定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主张军事领导政治，把军队凌驾于党之上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象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红军必须担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三位一体的任务，这是人民军队建设中的又一根本原则。“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认为红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农村根据地，

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这是一种流寇主义的思想，它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因此，“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

在红军内部必须实行官兵一致、全军一致的原则。在提倡民主的同时，要坚持严格的纪律，并从组织制度上加以保证。决议提出，“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

古田会议决议规定了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路线。决议指出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指出党的思想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使党员的思想 and 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为此，必须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在强调思想上和政治上进行建党的同时，决议还十分重视党在组织上的建设。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批判了党内存在着的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小团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强调“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制定了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正确路线。

古田会议决议，使红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将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都肃清了。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实践

证明，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党我军建设的伟大纲领，它永远照耀着我们胜利前进的航向。

在红四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过程中，林彪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并且以“流动游击”的错误路线，同毛泽东同志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路线相对抗。

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前委在给中央的信中，从闽、浙、赣三省敌人较弱，群众基础较好的情况出发，提出了利用国民党蒋、桂两派的矛盾，争取江西，兼及闽西、浙西的计划。但工农红军中的林彪等却反对这一正确的决策。他们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观察形势，而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只看现象，不看本质。一遇到暂时的局部的挫折，就认为革命形势未可乐观，革命前途渺茫得很，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他们没有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没有由这种红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他们胡说距离革命高潮尚远，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是“徒劳”的，主张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待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再举行全国武装起义，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可以形成所谓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了。他们甚至公开对抗前委的决策，主张到福建、广东、江西边界进行流寇式的流动游击活动。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八日红四军瑞金会议上，他们的这种观点表现得最为明显。

针对林彪的右倾悲观主义错误，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毛泽东同志写了党内通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深刻的批判。

毛泽东同志分析了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指出了民

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日益加深，各被压迫阶级迫切要求起来斗争的事实，断定中国革命高潮是会很快到来的。从这一科学分析出发，毛泽东同志得出了“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这个著名的结论。

毛泽东同志指出，只要认清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就会明白统治阶级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全国规模的发展，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口号的正确，就会明白红军和游击队以及红色区域能够存在和发展。“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只要认清了这一点，“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

毛泽东同志还驳斥了用“流动游击”代替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谬论，指出只有集中兵力，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建立了红色政权，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因此，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毛泽东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高瞻远瞩地预见到中国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光辉著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分析了中国社

会的特点，提出了党必须集中主要力量去领导土地革命，开展红军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促进革命高潮的思想，进一步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的理论。

【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斗争】 在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到一九三〇年春，全国革命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先后建立了湘赣、赣南、闽西、闽浙赣、湘鄂赣、鄂豫皖、湘鄂西、右江、海南岛等大块革命根据地。红军扩大到十四个军近十万人，战斗在十余个省二百多个县，并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有利时机，打了一些胜仗。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得到了相当的恢复。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党内有一些犯革命急性病的人，过高地估计了有利条件和革命力量的增长，“左”倾情绪有了新的滋长。当时在中央负实际领导责任的李立三就神气起来了。一九三〇年六月，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把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提出了一系列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

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主要表现在革命形势、革命性质、革命道路和军事问题上。

在革命形势问题上，李立三作出了完全主观主义的估量。他片面地夸大政治形势有利于革命的方面，看不到敌强我弱的形势还没有根本改变。他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胡说“群众只要暴动，不要罢工，只要大干，不要小干”^⑥，全国已经具备了“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他根本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武断地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危机在任何地方都一样，“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他主张必须马上起义，而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发动，

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他进而否认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幻想中国革命引起“世界革命的高潮”，并同时取得胜利。

在革命性质问题上，李立三继瞿秋白之后，又鼓吹“一次革命论”，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宣扬一省数省革命首先胜利的时候，就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他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民主革命不只是一要没收土地，“而且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以铲除反革命的武器”。胡说若不坚决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就是革命的自杀政策。”

在革命道路与军事问题上，李立三继续鼓吹违背中国革命实际的“城市中心论”，反对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污蔑它是“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是“农民意识的反映”。李立三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发动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他命令上海、南京、广州、天津等中心城市的党组织，立即组织总同盟罢工和举行武装起义。他主张幼小的红军“要坚决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企图一举夺取全国政权。他污蔑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路线，是所谓“旧的军事观念”，“是严重的右倾错误”，荒谬地要求根据地党组织放弃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把所有武器甚至连“一枝枪也集中到红军中去”。

为了贯彻这个冒险计划，李立三决定将党、共青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这些组织的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变相地取消了党作为无产阶级最高组织形式的领导作用。李立三提出了“猛烈的扩大，猛烈的扩大，再来一个猛烈的扩大”、“进攻，进攻，勇敢地

向中心城市进攻”的极“左”口号，命令各地红军主力攻打南昌、九江、长沙、桂林、宜昌等城市，以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幻想造成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胜利局面。李立三为了推行其错误路线，还大搞一言堂，不但拒绝党内的正确批评与建议，反而利用反“右倾”的口号，对不同同意他的路线的同志任意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错误地打击了不少党员干部，因而又发展了宗派主义。

由于立三路线的贯彻，使得经过艰苦斗争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又遭受到严重的损失。一九三〇年七月，彭德怀带领红三军团，乘蒋介石调湖南军阀何键部参加军阀混战，长沙空虚的时机，一度打进了长沙。李立三被这偶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立即下令全面进攻大城市。结果，红七军远离广西右江根据地北上攻打柳州、桂林，全军由六千人缩减到二千多人，丢了右江根据地，不得不转移到江西根据地。红二军团离开洪湖和湘鄂西根据地去攻打武汉，全军三万多人缩减到一万多人。红十军离开闽浙赣根据地去攻打九江，全军二万人缩减到三千人，不得不退回老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党组织，因执行立三路线，也受到重大损失，有的几乎全部被敌人破坏。

毛泽东同志始终不赞成立三路线，并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红军中当时只有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的红一军团没有受到损失。毛泽东同志并以极大的耐心纠正了这条路线在红一方面军中的影响。一九三〇年七月攻入长沙的红三军团，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不过十来天，就退出长沙。之后，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在浏阳会师，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毛泽东同志任总政治委员，朱德同志任总司令。这时，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央又命令红一方面军进攻长沙。毛泽东同

志正确地分析了客观形势，抵制了立三路线，耐心地说服中央代表和红军中的一些干部，放弃再次攻打长沙的计划，而率领红一方面军南下攻取茶陵、攸县、醴陵、萍乡、吉安等县城，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这样，不仅避免了损失，而且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发展了革命力量，使红一方面军增加到四万人。

立三路线统治全党的时间很短，但是损失很大。一九三〇年九月，党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组织及其经常工作。以后，李立三即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一个时期的中央，对停止立三路线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是斗争的方法有缺点，对于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也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

【反对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斗争】 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以后，罗章龙右派以为有机可乘，向党发起了猖狂进攻。当时，罗章龙是党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负责人。他早在大革命时期就追随陈独秀，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党的“六大”批判机会主义时，罗章龙根本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对“六大”路线，一直抱消极抵制的态度。当立三路线被纠正后，罗章龙却对中国革命前途完全丧失信心，认为党和中国革命已经被立三路线破坏完了，革命高潮已经完结，革命已经彻底失败，中国无产阶级无论如何也不能胜利。他公开拥护托陈取消派的反革命主张，甚至狂妄地叫嚣要把陈独秀、彭述之等托匪分子“请回”到党和党的领导机关中来。他恶毒咒骂工农红军，反对“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胡说当时党的头等任务，不是

领导武装斗争，不是建立农村根据地，而是作细小的经济斗争。罗章龙鼓吹的完全是一条取消主义路线，其实质就是要葬送中国革命，让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得到巩固。

这条路线刚在党内出现的时候，就遭到广大党员和干部的坚决反对。在这种情况下，罗章龙右派就进一步采取分裂党的阴谋手段，企图以组织上的分裂主义来实现它在政治上的取消主义。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罗章龙背着党中央，煽动党的某些地方组织，策划召集所谓“紧急会议”，妄想篡夺党中央的领导权。他们非法把持全总党团、海总党团、铁路工会党团和江苏等地的一些地方党组织，进行反对党中央的分裂活动。他们作出右倾分裂的决议，散布反党反革命的言论，为另立中央作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一九三一年一月，罗章龙右派抛出了反党纲领，并成立了所谓“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等组织，公开揭出了分裂党的黑旗。

我们党对于罗章龙右派的反党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严肃地指出，他们的反党纲领完全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另立“第二党”的行为是党的纪律所绝对不能允许的。罗章龙右派的反党行动遭到党的揭发和批判以后，他们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和改悔之意，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活动，甚至用散布传单的方式，将党的干部名单向蒋介石匪帮告密，帮助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我党组织。

罗章龙的一系列反党分裂活动，进一步暴露了他的真面目。在非法的所谓“第二党”出现后，广大党员和干部，包括曾经受过罗章龙的欺骗和蒙蔽的一些同志，都纷纷起来为保卫党的团结，维护党的统一，向罗章龙进行坚决的斗争。罗章龙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完全陷于孤立。一九三一年

一月底，中央政治局决定将罗章龙永远开除出党。此后，罗章龙一伙与托陈取消派合流，堕落为反革命。

【工农红军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原则】 红军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农村土地革命的深入，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一九三〇年十月，蒋介石结束了对冯玉祥、阎锡山的混战之后，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十一月，蒋介石调动了十万军队，以国民党反动政府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发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敌军兵分八路，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一线，形成半圆的包围圈，妄图把红军消灭在东固地区。红军约四万人，集中在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指出在强敌进攻面前，兵力不是要分散，而是要集中，不是先向敌进攻，而是先退却，把敌人引诱到对我有利的作战地区，然后集中红军主力各个歼灭敌人。这次“围剿”的敌军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是主力，张又是前线总指挥。红军如能消灭这两个师，“围剿”就基本上被打破了。这两个师各约一万四千人，张师又分置两处。两师主力所在的龙冈、源头一带，接近我之集中地，当地群众条件好，龙冈又有优良阵地。于是红军决定一次打一个师，第一仗先打张辉瓒师。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指挥下，红军在龙冈布下了天罗地网，主动引诱敌张辉瓒师进入我军伏击阵地。三十日下午四点，红军集中全部主力，以优势兵力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

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太阳还未下山，战斗就胜利结束，全歼敌军九千人。一战胜利，吓得谭道源师向东韶逃跑，许克祥师向头陂逃跑。我军又乘胜追击谭师，于一九三一年元旦消灭了它一半。红军在五天内打了两仗，共歼敌一万多人，缴枪一万三千枝。这次胜利，威震四方，富田、东固、头陂诸敌纷纷撤退，第一次“围剿”就被粉碎了。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遵照毛泽东同志“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方针，红军迅速分散在广昌、宁都一带发动群众。仅仅三个月，红军就在这一带广大地区发动了数十万群众，组织了地方武装，建立了红色政权。

一九三一年四月，蒋介石经过四个月的准备，又调动二十万军队，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发动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敌军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方针，从赣江一直延伸到建宁，构成一条八百里长的弧形阵线，分四路向红军合围而来。这时，红军只有三万多人。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的情况，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决定先打敌军较弱的两个师。五月间，红军在富田地区向敌王金钰、公秉藩两师发起猛烈的进攻，将其大部歼灭。接着，乘胜从富田向东出击。“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闾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从五月十六日至三十日的半个月中，红军从富田一直打到七百里外的建宁，横扫敌军的弧形战线，打了五个胜仗，歼敌三万多人，缴枪两万多枝，痛快淋漓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一个月以后，一九三一年七月，蒋介石又调集三十万军队，发动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这次，蒋贼自任总司令，带了德、英、日等国军事顾问，跑到南昌，亲自

押阵。敌军采用“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分三路气势汹汹地闯入根据地，妄图一举把红军消灭在赣江东岸。当时，三万红军还远在建宁发动群众。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率领红军主力从建宁绕道千里，急行军转到敌人的后侧兴国集中。然后，突然从兴国向东出击，一连攻克良村、黄陂等地。五天之内，三战三捷，将敌军中较弱的三个师一一击破。敌军发现红军主力在其背后，急忙掉头东进，猛扑黄陂。红军以一部分兵力把敌军引向东北方向，主力则从敌之空隙插回兴国休整。当敌人发觉后调头西进时，红军主力已经从容地休整了半个月。敌军被红军牵着鼻子跑，被动挨打，饥疲沮丧，到处扑空，无能为力，不得不在九月退却。红军乘敌人退却的时机，再歼敌一个师又一个旅。前后三个月，红军共歼敌三万多人，缴枪两万多枝，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成为拥有二十一个县、二百五十万人口的红色区域。其他各根据地也有发展。全国红军扩大到十万人，赤卫队也发展到十几万人。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

从一九二七年的秋收起义，到一九三一年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在领导工农红军进行武装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的战略战术思想。“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

“然而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

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

“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是在正确地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掌握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的基础上产生的。当时，中国革命战争有四个特点：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又经过了第一次大革命；二、敌人的强大；三、红军的弱小；四、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的开展。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红军的可能发展和胜利。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红军不可能很快地发展和胜利。可能胜利和不可能速胜这两方面同时存在，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这些特点同时规定了中国国内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是反革命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红军的战争首先必须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这就是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赤卫队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红军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必须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基本形式，必须实行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战略上的内线作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战略上的以少胜多和战役战斗上的以多胜少。红军的作战原则，是“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等。

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处处闪耀着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光辉，有力地反对了战争问题上的唯心

论和形而上学，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的伟大发展。

第四节 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遵义会议。毛主席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 在中国革命逐渐走向高潮的形势下，党内的“左”倾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一九三一年初，出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王明，原名陈绍禹，于一九二五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莫斯科学习时，他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小集团。一九三〇年前后，王明及其同伙相继回国。当罗章龙从右的方面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时候，王明却从极“左”方面来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他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却又说什么中央“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认为“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⑥。他自称“代表国际路线”，“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全部真理”，到处哇喇哇喇，招摇撞骗，吓唬工农干部和天真烂漫的青年。他从各方面对党施加压力，迫使党中央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篡夺了中央的领导权。“六届四中全会，在名义上反对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实际上重新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战争和战略问题》）从此，开始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统治。

同年二月，王明在党内发表了他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

陆续写就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大毒草，提出了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左”倾机会主义政治纲领。在这个小册子里及其以后所泡制的许多决议案中，王明对于中国革命提出了一系列的错误主张，推行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更有“理论”、气焰更嚣张、形态更完备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在中国革命性质和阶级关系问题上，王明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荒谬地提出“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他对中国的阶级关系根本不调查，不研究，把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提，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他不承认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因而，推行了一系列“左”的政策。

在革命形势和策略问题上，王明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认为“直接革命形势，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个或者几个主要的省分”^⑩，盲目地鼓吹所谓“进攻路线”，推行冒险主义。在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后，王明认为“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的尖锐，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要求“红军用全力于决战方面，到白色统治区域去开展胜利的进攻，连续的战胜敌人，消灭敌人武力”，^⑪冒冒失失地去进行战略决战。

在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上，王明轻视红军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极端重要作用，顽固地推行“城市中心”论。王明根本不懂得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闭着眼睛瞎说我国“始终未能建立起真正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府”和“真正的”红军，竭力反对毛泽东同志开辟的

“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他要求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战争配合城市工作，攻占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⑩，梦想以此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

在组织路线上，王明实行宗派主义、惩办主义和党内斗争中的过火政策，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王明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他首先对党的中央机关进行“改造”，并把这种所谓“改造”推广于各个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地方党组织。他以太上皇自居，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向全国各地派出他的代理人，打着“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的旗号，篡夺党政军各级领导权，以贯彻其错误的政治路线。对于反对他的错误路线的同志，动辄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调和主义”、“两面派”等等大帽子，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怕是极微小的和刚萌芽的倾向，都要给以残酷的无情的斗争。”^⑪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瑞金的中央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八月党中央的宁都会议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被污蔑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两次会议还夺了毛泽东同志的权，改变了根据地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九·一八”事变和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左”倾关门主义使有利形势的丧失】一九二九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席卷了美、英、法、德、日、意等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实现其蓄谋已久的独占中国的野心，加紧了我国的武装侵略。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盘踞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驻沈阳附近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占领了沈阳，同时进攻东北其它重要

城镇。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面前，蒋介石政府实行投降卖国政策，下令东北军队不得抵抗。“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④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自动撤至山海关以内，使日寇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侵占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进攻上海的战争。上海工人和各阶层人民奋起抵抗。驻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同上海人民一起进行了抗战。上海抗战坚持了一个多月。但国民党反动政府却从中进行破坏，和日寇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⑤，出卖了上海抗战。

“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我党的号召下，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在东北，广大群众和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协助之下，组织了抗日武装，走上了抗日前线。抗日游击队和抗日义勇军，遍布于白山黑水之间。据估计，到一九三二年春，东北抗日武装总人数在三十万人以上。一九三四年，我党将东北各种抗日武装统一组成“抗日联军”，共编为六个军。在国民党统治区，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杭州、太原、长沙、西安、广州、福州、武汉、南昌、青岛等各大中城市，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日反蒋的群众运动，工人学生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猛烈地冲击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动。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是要求反抗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要求国民党政府对外抗日，对内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连国民党营垒也发生了分裂。一

九三一年十月，国民党东北军马占山部违反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日寇由辽宁向黑龙江进犯时，进行了武装抗击。十二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的领导 下，响应共产党的抗日号召，于江西宁都起义，加入了红军。一九三三年五月，冯玉祥在察哈尔与共产党合作，建立抗日同盟军，宣布对日作战。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在抗日民主运动的冲击下，国民党反动派总头目蒋介石，也被迫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度宣告“下野”。

在这种情况下，党应当组织广泛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使形势朝着更加有利的方向发展。但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却对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实行了许多错误的政策。

他们不承认“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霸中国的一个严重步骤，而错误地认为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因而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⑩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⑪的错误口号，使党脱离了当时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他们看不到“九·一八”事变后国内中间阶层的抗日要求和反革命营垒的分化，强调国民党反动派和中间派别的反革命一致性，鼓吹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主张“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⑫。他们否认南方和北方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反对北方落后论”的口号下，要求在北方农村普遍建立红色政权，在北方白军中普遍地组织哗变。他们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中心城市，采取进攻形式，组织庞大的没有掩护的党的机关和各种脱离群众的赤色团体，经常无条件地号召举行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课、罢市、罢

操、罢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至武装暴动。

由于王明的错误路线的贯彻，使党在白区的工作遭到了几乎百分之百的损失，丧失了“九·一八”以后的有利形势，给蒋介石有机可乘，得以重新组织反革命力量向革命进攻。一九三二年一月，蒋介石勾结亲日派汪精卫以及西山会议派，结成反革命联盟，重新上台，更加疯狂地进攻红色根据地和镇压人民抗日民主运动。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农村根据地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著作的发表】 一九三二年夏，蒋介石经过短期的策划，自任总司令，发动了对工农红军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敌人先集中力量向鄂豫皖区和洪湖区发动进攻。鄂豫皖根据地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由红军第四军^⑧、第二十五军等部组成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开始时曾给进犯的敌军以重大的打击。但当时窃据红四方面军领导职位的张国焘，错误地认为国民党已经是“偏师”了，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因而不作继续反“围剿”的准备。当敌人再次进攻时，又惊惶失措，没有得到党的允许，便率主力于一九三二年十月退出鄂豫皖区，转到了川陕边界。红二军团也退出了洪湖区，转移到湘鄂川黔边境。

一九三三年二月，蒋介石以陈诚、罗卓英等部为主力，用五十万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敌人分三路向广昌推进，企图一举歼灭中央红军的主力。由于毛主席的正确战略战术原则在中央红军中有深刻的影响，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没有来得及完全贯彻，红军仍按照毛主席的军事原则，采取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作战方针，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一日，在宣

黄南部之黄陂、大龙坪、登仙桥，红军用大兵团伏击，歼敌两个师。三月二十一日，又在霹雳山、雷公嶂，围歼敌人一个师，基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中央根据地在这次反“围剿”胜利后，向浙赣边界发展，与闽浙赣根据地联成了一片。红一方面军发展到十万人，其他根据地的红军也有了发展。至此，全国红军扩大到三十万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出现了新局面。

从一九三三年上半年开始，各根据地先后开展了查田运动。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环境，敌我争夺十分激烈，根据地的情形极为复杂。不少地区的封建势力还没有来得及肃清，有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混入了乡村党政机关和民众团体，土地革命的果实没有完全落到广大贫雇农和中农的手里。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工农民主政府首先在瑞金等地发动了查田运动。一九三三年六月，毛主席召开了石城、宁化、长汀、汀州、瑞金、于都、宁都、胜利等八县查田运动大会，批判了包庇地主富农的右的错误，反对了侵犯中农利益、打击中小工商业、消灭富农的极“左”政策。会后，广大农民和干部纷纷动员起来，查阶级，查田地，重新没收地主隐匿的土地财产，重行分配。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查田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一九三三年七、八、九三个月的统计，中央根据地闽、粤、赣三省共查出了隐瞒成份的地主、富农一万三千六百多户，收回土地三十一万七千余担。查田运动的开展，进一步解决了农村土地问题，打击了反革命，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例如瑞金县壬田区，不到两个月就扩大红军七百余，卖给红军谷子一千九百余担。一九三三年，中央根据地的农业收成，比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

但是，正在这个时候，根据地建设却受到了错误路线的

严重干扰。一九三三年初，王明路线统治下的临时中央，在白区工作遭到破坏被迫迁入中央根据地后，进一步排斥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变本加厉地推行“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他们放弃根据地的经济建设，采取“竭泽而渔”的方法，片面地强动员全部财力、物力，同强大的敌人拼消耗，致使根据地社会经济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他们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改政策，和消灭富农经济、打击中小工商业的经济政策，干扰了土地改革和查田运动，影响了根据地的生产。他们把注意力集中于扩大主力红军，不注意地方武装的建设。他们否定正确的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和官兵关系，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为单纯打仗一项，取消了红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重要任务。

为了抵制和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毛主席在被夺了权的情况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和党的利益，自一九三三年下半年到一九三四年初，在根据地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先后发表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重要著作，总结了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关于人民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伟大思想。

毛主席明确地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因为，只有开展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才能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从物质上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才能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才能

从经济基础上巩固工农联盟，巩固革命根据地。因此，动员根据地人民群众进行经济建设，就成了当时党和工农民主政府的一个重大任务。毛主席还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规定了基本原则：“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我们的经济政策》）并规定了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和奖励发展私人经济同时并进的方针，指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

毛主席强调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为此，党和红军必须关心群众生活，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紧密地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才能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根据地建设，全力支持革命战争。

建设和巩固根据地的中心问题，是实行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毛主席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村各阶级、阶层的状况，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制定了正确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标准，把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严格地区别开来，在这些区

别上建立我们党的政策。这样，就从农村阶级关系上进一步解决了土地革命的路线和策略问题，纠正了土地改革工作中发生的某些偏向，批判了王明错误路线的各项“左”的政策。

毛主席的这四篇光辉著作，代表了我们党关于建设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路线，为制定党对农村各阶层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正是由于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根据地的实际工作中起着指导作用，才使根据地的军事、政权、经济等方面的建设获得了很大的成绩，长期支持了红军的反围攻战争。

【王明“左”倾路线对红军战争的危害。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下，进行了半年多时间的准备，一九三三年十月又调集了一百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向我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并以五十万兵力集中进攻我中央根据地。在这次反革命“围剿”中，蒋介石改变了过去的战略战术，采取了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垒主义”作战方法，仅在中央根据地周围就修筑了近三千座碉堡，企图从四面包围、压缩、蚕食我根据地，逐渐消耗我有生力量与物质资材，最后迫使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目的。蒋介石的这一次进攻虽然比过去严重，但这时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红军有了很大的发展，又有几次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条件是有利的。根据地广大军民斗志昂扬，决心消灭来犯之敌。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继续执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那末，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却导致了这次反“围剿”的失败。一九三四年一月，临时中央召集了六届五中全

会。这次全会是王明路线发展的顶点。会议不顾“九·一八”事变以来形势的发展，盲目地宣称“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断定第五次反围攻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它将决定中国的“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说什么：“在我们已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会统一，中国民众才会完成民族的解放”。

与政治上的冒险主义相适应，王明路线在军事上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并逐步在红军中取得了统治地位。他们要求红军实行所谓“正规化”，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他们否认敌强我弱的前提，反对红军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的方针，要求实行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他们反对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上的速决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反对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正确方针，要求“六路分兵”，“全线抵御”。反对诱敌深入，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他们以这套错误的所谓“新原则”代替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开始，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敌军为割断中央区和闽浙赣区的联系，首先占领了黎川。红军由福建回师，在洵口打了一个遭遇战，歼敌一个师，获得了胜利。但是，他们违反“慎重初战”的原则，震惊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企图收复黎川，冒险地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结果，红军在硝石一战不胜，资溪桥再战又不胜。以后，就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

堡垒之间，完全陷入了被动地位。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被蒋介石调来福建从东线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并表示愿意同红军合作，共同抗日反蒋。这正是红军消灭敌人的良好时机。毛主席力主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使进攻赣南闽西的敌人回援其统治中心。这样，既可粉碎敌人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又援助了福建人民政府。但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却拒绝采用这一扭转战局，变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的正确措施。“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人民政府之后，又集中全力进攻红军。敌我双方在康都、建宁、泰宁地区，相持达九个月之久。这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拚命主义。他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们捧着消极防御当宝贝，把兵力分得很散，强使红军在敌人的堡垒面前，构筑工事，进行短促突击，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同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消耗战。他们企图用消极防御来“顶”住敌人，其结果却使自己丧失了主动，既未能消灭敌人，也未能保住根据地。红军在广昌战役失利后，即退守兴国、宁都、石城一线。接着，在高虎脑、万年亭、驿前等战役中，“左”倾机会主义者继续推行消极防御路线，使红军有生力量又遭受严重损失。到了一九三四年，反“围

剿”战争已经打了一年之久，红军在错误路线的危害下，被压缩在敌人堡垒线的包围中。这时，毛主席再次提出以主力向湖南中部挺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又拒绝这样做。“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工农红军开始长征。遵义会议的召开。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 一九三四年七月，红七军团由江西瑞金北上抗日，经福建、浙江、安徽转入赣东北。十月，在江西德兴附近，和方志敏同志领导的红十军会师，组成了红军第十军团，又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继续北上的征途中，红十军团多次打破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不少胜利。十一月，进到杭州、芜湖附近一带。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赣东北的怀玉山，遭到国民党十倍优势兵力的围攻。红军英勇突围后，继续在闽浙赣根据地坚持斗争。在突围中，方志敏同志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国民党反动派头目，包括蒋介石在内，用尽各种方式来劝降。面对着敌人的威胁和利诱，方志敏同志始终坚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他以“我们为革命而生，愿为革命而死”的大无畏精神，回击了反动派的无耻伎俩。在敌人的法庭和监狱里，他义正词严地斥责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共卖国罪行，宣传了我党的革命主张。一九三五年八月六日，方志敏同志英勇就义于南昌。

一九三四年八月，紧接着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后，湘赣区的红八军和湘鄂赣区的红十六军组成红军第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的先遣部队，开始突围西征。十月，红六军团在贵州东部与红二军团会师，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由任弼时同志任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在桑植、石门、印江等地开

展活动，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被迫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中央红军连同中央机关共八万多人，从江西瑞金、雩都和福建长汀、宁化等地出发，向西转移。党中央决定，由陈毅同志等率领红军和地方工作人员三万余人，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除陕甘边区以外，也先后退出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

长征初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长征开始前，他们既不在红军和干部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不认真进行战略转移的组织准备。长征开始后，他们以消极的防护作战，来掩护整个部队和庞大机关的转移，使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那时，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之间，设置了四道防线，阻拦红军前进。广大红军战士和干部前仆后继，英勇作战，渡漳水，占宜章，过粤汉线，连续突破了敌人的三道防线。但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把希望寄托在和红二方面军的会合上，不顾一切地命令红军硬攻硬打。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红军与敌军激战一星期，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却使部队损失过半。在不到三个月时间里，中央红军已减员至三万多人。党和红军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如果再和优势敌人硬打硬拚，红军就有覆没的危险。在这个紧要关头，毛主席力主放弃和红二方面军会合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以使被动转化为主动。毛主席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大部分同志的支持。十二月，红军攻克黎平，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决定向贵州前进。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

第五次反围攻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损失，使广大干部和党员逐渐认清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觉悟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攻失败的教训，集中在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上，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明确指出：王明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攻’的主要原因。”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路线。决议强调指出，当前红军的行动，“须有高度的机动性”，实现“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会议撤换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领导职务，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

遵义会议在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它是我们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我们党经过十四年的艰苦奋斗，从胜利与失败，前进与后退，扩大与缩小的多次反复的革命实践中，认识到只有毛主席才是自己的伟大领袖，认识到只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是唯一正确的路线。这是流了多少鲜血，付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呵！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从此，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弱为强，转败为胜，永远沿着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胜利前进！

第五节 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路线的斗争。工农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反对张国焘逃跑主义的斗争。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红军广大指战员后，人人欢欣鼓舞，个个斗志昂扬，部队重新焕发了战斗的青春。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红军经过整编，精简了机关和后勤部队，丢掉了笨重的辎重物资，采用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准备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当中央红军北上经桐梓渡赤水河时，四川军阀急忙调集三十六个团的兵力至川黔边境布防，并构筑碉堡封锁了长江。红军遂改变计划，西进至滇东北之威信。蒋介石又调国民党中央军奔集阻拦。红军突然甩开敌人，挥戈东指，再渡赤水河，重占桐梓、娄山关和遵义城，消灭了贵州地方军阀的两个师。接着，我军同敌追击部队周浑元、吴奇伟部展开激战，一直打到乌江边，歼敌一个多师。残敌渡江南窜，来不及渡江的，悉数被歼。这一战役，共歼灭敌人二十个团，是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

三月，我军又自遵义西进，占仁怀，由茅台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敌人料我将北渡长江，连忙在川黔滇三省边界布置封锁线，企图围歼我军于长江以南。但红军却突然由川南折回贵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急行军通过枫香坝，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这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他唯恐红军夺取贵阳或东出湘西，慌忙调集云南军阀部队至贵

阳及其以东地区，妄图阻止红军前进。我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城，三军团占领倪儿关，掩护全军通过湘黔公路，然后分两个纵队向云南进发。四月下旬，红军进逼昆明。云南军阀龙云主力东调，后方空虚，忙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准备死守。我军却虚晃一枪，分三路向金沙江挺进，连夜急行军，抢占了绞车渡，用七只小船，经九天九夜，于五月初，全部渡过金沙江。当敌军大队赶到江边时，只拣到了一只破草鞋，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了。

红军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四渡赤水，迂回曲折，穿插于敌军之间，敌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途中大量歼灭敌人，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地渡过了金沙江，粉碎了敌人妄图消灭我军于川滇黔边境的反革命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是我军作战史上的光辉典范！

红军巧渡金沙江后，党中央在会理召开会议，粉碎了彭德怀伙同林彪反对毛主席的领导、阴谋夺权的反党分裂活动。会后，红军继续北上，赶到了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我第一师连夜渡河，沿着大河东岸，同河西的第二师夹河而上。五月二十五日，西岸红军开始强夺泸定桥。“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桥身由十三根铁索组成，桥下是惊涛骇浪。红军二十二个勇士，组成突击队，手持步枪，身背马刀，腰缠手榴弹，冒着密集的弹雨，攀着铁索，冲过桥去。接着，后续部队也冲过了桥，占领了泸定。三十日，红军大队人马从泸定桥渡过了天险大渡河。在汉源，红军击溃了四川军阀的四个团。旋经天全、芦山、宝兴，遇到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的险阻。夹金山，海拔

四千多公尺，山上白雪皑皑，积雪最深处有十几丈，掉下去就再也爬不上来。山中气候恶劣，瞬息万变，空气稀薄，使人喘不过气来。但是，困难吓不倒英雄汉！红军战士手拉着手，坚定地向前迈进，走不动的扶着走，不能走的抬着走，终于翻过了第一座大雪山。六月十六日，中央红军在川西北的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红四方面军自离开鄂豫皖根据地退到川陕边境后，和当地红三十三军会合，以四川北部的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建立了川陕边区根据地，部队扩大到八万余人。川陕根据地红军在一九三三年底至一九三四年九月，粉碎了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从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开始，张国焘就被蒋介石在第五次围攻中的反革命气焰所吓倒，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到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以后，又进一步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一九三五年三月，在胡宗南匪军进攻下，张国焘竟自动放弃了川陕根据地，带着全部人马向四川西康边界退却。

懋功会师后，党中央政治局于六月十八日作出决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②，迎接全国抗日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潮。二十六日，党中央在两河口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毛主席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抗日，在抗日前线的西北部战胜敌人，开辟新的根据地，使党和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但是，张国焘却反对毛主席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他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就已成立所谓西北联邦政府，企图使红军退却到西康、青海、甘肃西北部以至新疆去。这时，他主张红军

向康藏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党中央、毛主席拒绝了张国焘的退却路线，决定红军继续北上。

两河口会议后，毛主席率领红军自懋功一带北上，翻越了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于七月到达四川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可是，张国焘不但坚持他预定的退却计划，而且妄图按照他的意志改编红军。为了同张国焘的退却路线和宗派分裂活动作斗争，八月初，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由于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的会合，中国革命的形势不是低落，而是继续向前发展。因此，过分夸大敌人的力量，过低估计革命的力量，从而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会议再次肯定了红军继续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批判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强调了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和一、四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批判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和分裂主义。在经过尖锐的斗争和耐心的说服教育后，张国焘表面上接受了党中央的北上抗日的方针。

毛儿盖会议后，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一、四方面军合编为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组成，左路军由四方面军的主力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第五、九军团组成。右路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从毛儿盖出发，来到了纵横数百里、人烟稀少的水草地。草地到处是淤黑色的水，人吃了就会中毒，伤口泡了就会红肿溃烂。草茎和腐草结成“泥潭”，人在上面走过，一不当心，就会陷下去。加以天气变化无常，行军途中缺乏粮食，

真是困难重重。但是，最大的困难也吓不倒共产党人。红军吃着野草、皮带，经过六天六夜的艰苦斗争，终于在茫茫的草地上踏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胜利地越过了草地，到达四川西北的巴西。左路军由朱德任总指挥，张国焘任政委。从卓克基出发后，原定经上下阿坝出草地，进至班佑与右路军会合。但是，张国焘仍然坚持他的错误路线，当左路军通过草地进至阿坝后，他拒不执行中央关于北上的命令，公开在军队中进行反党反中央的背叛活动，甚至阴谋以武力截击中央，危害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这紧急形势下，党中央于八月二十九日在巴西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脱离危险区域，同时把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支队，以实现毛主席的北上抗日的伟大战略部署。

九月初，红军北上抗日支队从巴西出发，渡包坐河，进入四川俄界。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举行会议，听取了毛主席《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作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会议严肃地批判了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反党、分裂红军和军阀主义的严重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展开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会后，毛主席率领部队沿白龙江前进，到达甘肃东南部腊子口。腊子口是甘南和岷县的天然屏障，两边悬崖绝壁，中间是一条长约三十米，宽三米多的隘口，只有一条一丈多长的独木桥可以通过。当地群众说：“人过洮岷山，象过鬼门关，走过腊子口，象过老虎口。”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势。蒋介石用了三个团守在隘口，妄图阻止红军北出甘南，阴谋将我军消灭于雪山草地。红军一方面发动

正面进攻，一方面机智地攀上陡峭的石壁，绕到守敌的侧后，夹击敌人。经过一昼夜的激烈战斗，于九月十七日突破了天险腊子口，并乘胜追击，歼灭了大部守敌。接着，大军越过岷山千里雪，到达甘南之岷县、西固间的哈达铺。以后，又连续突破了会宁、静宁之间的封锁线和平凉、固原之间的封锁线，跨过了长征途中的最后一座高峰——六盘山。十月十九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的吴旗镇，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红军越过岷山之时，写下了歌颂这个历史性的长征的光辉诗篇：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它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十二个月中，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红军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有过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它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人民群众怎么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了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

是播种机。它散播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在中央红军向陕北进军时，原来活动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第二十五军，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组成了红军第十五军团。十月，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在陕北胜利会师。当时，蒋介石正向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和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下，陕北根据地处于非常危急的境地。十一月，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在毛主席的指挥之下，经过充分的准备，以少数兵力诱敌进入直罗镇，而以主力埋伏在镇的南北两边山地。第三天下午，敌一〇九师开进直罗镇。两路红军象两只铁拳同时砸向直罗镇，敌人纷纷瓦解逃窜。不到两小时，红军就占领了直罗镇，全歼敌一〇九师。接着，又乘胜追击，歼敌一〇六师一个团，并迫使敌一〇八师、一一一师退回甘肃境内。从东路进犯的敌一一七师，也随着退出了酆县。正是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挽救了陕北根据地，从而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毛主席指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路线的破产】 张国焘截击中央的阴谋破产后，擅自率领被其欺骗和强制的左路军以及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南下，重过草地，翻雪山，向川康边境的天全、芦山一带退却逃跑。一九三五年十月初，张国焘

野心毕露，不顾其他同志的反对，在绰木碉宣布成立他自己的“党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自命为“主席”，公开打出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黑旗，严重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统一与团结。

毛主席、党中央对张国焘的反党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电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伪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并在党内公布俄界会议的决定。但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的命令，继续进行反党活动。在他的退却路线的危害下，红四方面军遭到了严重的挫败。部队重过草地南下，敌情、地形、居民、给养等条件都不利，行军途中没有粮食，严冬时节没有棉衣。在天全、芦山停留三个月，受到敌人的多次围攻，损失很大，最后不得不退到西康的甘孜一带。

这期间，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红二方面军，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奉命开始长征，途经贵州、云南，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到达西康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时，张国焘又企图用强制与欺骗的方法，使红二方面军同意他的错误路线，共同反对中央。但这一罪恶企图遭到红二方面军的拒绝而完全失败了。由于毛主席、党中央采取了正确的党内斗争的原则，由于红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拥护中央的正确路线，纷纷起来同张国焘作斗争，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毫无出路，最后，张国焘被迫取消了他的一套伪中央的组织机构，表面上同意北上，实际上仍然野心不死。一九三六年七月，红二、四方面军从甘孜分左、右两路军北上，经东谷、阿坝、包坐，再过雪山草地，十月到达甘肃的会宁地区。这时，红一方面军也转战到这一带前来迎接。于是，全国的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地区会师，胜利地完成了战略大转移的

任务。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合，壮大了革命的声势，使我们党在接近抗日前线的陕北建立了巩固的阵地。

会宁会师后，张国焘仍在继续进行反党分裂活动。他假借中央名义，提出什么“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等口号，擅自命令红四方面军前锋部队两万五千余人组成西路军，于十月二十六日由甘肃靖远西渡黄河，向青海西进。部队到达甘州、肃州地带，即被国民党军队辗转包围，虽经广大指战员英勇抗击，仍遭惨败。最后只剩下八百多人，从祁连山突围到新疆，经党中央的营救，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回到延安。

一九三七年四月，毛主席在延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反党行为，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并作出了系统的总结。会议指出，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原则错误。这些错误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中已经开始出现，在川陕根据地时已发展为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从退出川陕区到成立伪中央，是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则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会议充分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艰苦奋斗，英勇苦战的革命精神，并对此表示深切的敬意。指出过去红四方面军在路线上的错误，应由张国焘负主要的责任。会议号召全党全军在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积极完成党的伟大任务。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对于张国焘本人，党中央仍尽力进行教育和挽救，重新分配他担任负责的工作，给他以悔过自新的机会。

张国焘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继续耍弄两面派手

法，口头上表示接受党对他的错误路线的批判，并发表声明，表示“今后绝对忠于党的路线”，实际上却准备最后叛党。一九三八年四月，张国焘借口去陕西中部祭黄帝陵，只身逃出陕甘宁边区，跑到西安和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的怀抱，成了可耻的叛徒。正如毛主席所指出：“张国焘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整顿党的作风》）四月十八日，党中央决定将叛徒张国焘开除出党。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由于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路线的危害，损失很大。到长征结束时，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二万五千人，革命根据地只剩下陕甘边区一块。我们党的力量，从数量上看是暂时减少了；但是，由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由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成了党的指导路线，从质量上看却比过去更强大。全党全军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站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前头，朝气蓬勃地去迎接新的伟大的战斗任务。

第六节 党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的发表

【瓦窑堡会议。《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发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三年又向我热河、察哈尔发动了进攻。由于蒋介石政府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三月日寇侵占了热河省会承德。接着，又占领长

城各口，并进攻滦东，直逼北平、天津。五月三十一日，国民党反动政府和日寇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这个协定实际上承认日本占领我东北三省和热河，并把冀东划为日寇可以“自由行动”的非武装区，使整个华北放置在日军的监视之下。一九三五年，日寇又发动了“华北事变”。五月，日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华北统治权的要求，同时调集大量军队侵入关内，以武力相威胁。六月，国民党政府在华北的代表何应钦，与日寇华北驻屯军头目梅津美治郎签订了所谓“何梅协定”，接受日寇的无理要求，使我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十月，日寇在河北省的香河，指使汉奸暴动，占据了县城。十一月，日寇进一步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国民党政府也指派宋哲元等组成“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寇“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向全国人民揭露了日寇“要把全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侵略野心，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组织起来，拥护与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反蒋的战争！”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又联名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全国一切愿意抗日的政治派别、武装部队、社会团体和人民群众，广泛地联合起来，进行抗日反蒋的斗争。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一万多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提出了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爱国口号。反动政府出动大批军警，举着大刀、水龙前来镇压。赤手空拳的学生，同反动军警进行了英勇的搏斗。在十二月十六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成立的那一天，北平的学生、市民三万多人再次举行示威，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北平学生的抗日爱国行动，得到了各地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武汉、长沙、太原、开封等各大城市，都纷纷举行集会游行，表示声援。“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一九三六年九月成立了革命青年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二·九”运动标志着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时期。

在革命形势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民族革命战争急剧转变的关头，我们党迫切需要制订新的政治策略方针，以指导革命向前发展。“九·一八”以后，王明“左”倾关门主义者没有实行这个策略的转变。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建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但是，由于当时军事形势非常紧急，还来不及彻底清算王明“左”倾关门主义的政治策略方面的错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主席进一步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策略路线方面的问题。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关门主义，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二十七日，毛主席根据中央决议，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总结了第一

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中国革命的经验，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彻底地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

毛主席在报告中，首先对“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作了深刻的阶级分析。当时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个变化，变动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工农阶级有可能重新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在当时的条件下，其左翼有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其他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地主买办阶级的营垒也将会进一步发生破裂，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当时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时局的另一特点是，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两种特点都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要建立抗日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就必须彻底批判王明“左”倾关门主义的策略。王明“左”倾关门主义者认为革命的力量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要笔直又笔直，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对的。毛主席指出：“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

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道路是曲折的，在曲折的斗争中前进，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中国无产阶级要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不仅需要坚固的和可靠的同盟军，而且还需要争取一些动摇的和不可靠的同盟军。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如果不用统一战线的策略武器去射击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目标，就会脱离广大的人民群众，而把自己孤立起来。其结果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所以，王明“左”倾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

要建立抗日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还必须善于利用反革命营垒中的矛盾。旧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互相争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各帝国主义都豢养了自己的一批走狗。走狗虽属一类，却有小狗大狗饱狗饿狗之分，又有亲日派与亲英美派之别。反革命营垒中的这种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无产阶级应该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武器，把敌人营垒中被裹胁的人们，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集中力量去打击当前最主要的目标。实践证明，“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主席在报告中还提出了以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来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人民

共和国仍然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阶级和政治集团。报告并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策。

毛主席在批判“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同时，又着重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毛主席说：“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即将形成的时候，毛主席就及时提醒全党要注意担负起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警惕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复活。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报告，从政治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我们党制定了民族革命战争的正确路线。

【红军的东征与回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瓦窑堡会议后，毛主席领导全党为争取国内和平，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巨大的努力。

一九三六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等发出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重申党的抗日主张，呼吁停止内战，表示希望首先同东北军实现停战，并欢迎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到陕甘根据地来协商共同抗日的办法。二月，毛主席亲自率领红军抗日先锋队东渡黄河，进入晋西晋中地区。红军在这个地区发动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没收汉奸、恶霸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广大贫雇农，并且成立了抗日救亡组织，迅速发展了部队。但是，正当抗日先锋队占领同蒲铁路，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时候，蒋介石却派了十个师以上的兵力进入山西，协同阎锡山阻拦和围攻红军出师抗日，同时又命令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向陕甘革

命根据地发动进攻。为了保持抗日实力，促进统一战线的建立，红军决定回师河西，以示团结抗日的诚意。五月五日，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

由于日本继续向华北进攻，英美帝国主义为了保护它们的在华利益，开始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并给蒋介石政府的对日政策以深刻的影响。日本的进攻也威胁到蒋介石的统治，使日蒋的矛盾尖锐起来。这种情况表明，在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蒋介石政府有参加抗战的可能。根据这一估计，我们党从回师通电开始，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政策，加强了对国民党的分化和争取工作，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我党中央又致书国民党中央，揭露与批判了国民党对日寇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同时建议两党派出全权代表，“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为了团结抗日，信中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

我党采取的这一系列重大的政治行动和策略，迅速扩大了党和红军在全国的政治影响，调动了各种抗日力量的积极性，加速了国民党营垒的分化。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日寇及伪军进攻绥远，驻绥远的国民党军队在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下，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奋起抵抗。十一月至十二月间，上海、青岛等地日本纱厂的工人先后举行了大罢工。全国各地抗日民主运动迅猛发展，整个形势向着有利于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向转变。这个转变的枢纽就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当时，驻在西安的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

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在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和感召下，在工农红军和人民抗日运动的推动下，联合反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对内用兵的反动政策，要求迅速停止进攻红军，联共抗日。蒋介石加以拒绝，而且更加倒行逆施，积极布置“剿共”军事，并在西安屠杀抗日青年。于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临潼拘捕了蒋介石，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亲日派和汉奸、托派互相勾结，散布谣言，乘机制造混乱。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调兵遣将，派出大批军队由洛阳进至潼关一带，准备进攻西安，还计划出动飞机炸死蒋介石。他们的目的是企图煽动大规模的内战，破坏全国抗战局面的实现，借以制造日本灭亡中国的有利条件，并取蒋介石的地位而代之。国民党内英美派宋子文、孔祥熙等，则主张南京同西安之间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事变，以维护蒋介石在国民党的地位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事变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新的内战爆发，全国抗战推迟实现；一种是内战由此结束，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早日建立。因此，西安事变的正确解决成了当时时局发展中的关键。

在我们党内，张国焘等人由于对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始终表示怀疑，事变发生后，他们就主张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进攻国民党部队。这种主张，正是日寇与国民党亲日派所欢迎的。毛主席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正确分析了事变的性质和前途，坚决反对了这种错误主张，采取了在有利于抗战的前提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当时我们党的方针是：（一）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

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求得和平解决。（二）联合南京政府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它走向抗日的立场。（三）给张学良、杨虎城以军事上政治上的援助，使之实现抗日的主张。（四）同时，充分作好打退南京亲日派“讨伐军”的进攻的准备。

十二月十六日，党中央派周恩来同志等赴西安参加谈判。十九日，党中央发出通电，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指出：“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建议以“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为基本纲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毛主席的正确方针指引下，经过种种艰巨的斗争，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

十二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回南京途中，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内容含糊曲折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词》。他迫于形势，不得不接受我党的抗日主张，开始转变其十年反共内战政策，但又要坚持专制独裁，极力掩盖西安事变的真相。针对蒋介石的两面政策，十二月二十八日，毛主席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严正指出，蒋介石的出路，只有“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如果蒋介石还要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那末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必将他席卷以去。毛主席的这个声明，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迫使蒋介石向着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向转化。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我党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推动国共两党的合作，于二月十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

项保证。五项要求是，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自由，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迅速准备抗日和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是，停止武装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改变名称，在革命根据地实行普选和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在我党的坚决斗争下，在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压力下，国民党三中全会终于否决了亲日派汪精卫提出的“剿共”降日的政治决议案，通过了一项实际上接受国共合作抗战的提议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基本上实现了。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王明“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结果。这时，从全党范围来说，王明“左”倾关门主义的恶劣影响还没有彻底肃清，仍然是党内的主要错误倾向。但在同时，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象潮水一样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倾向又开始抬头了。

在新的形势下，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王明，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从极“左”跳向极右。一九三五年七、八月间，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王明就暴露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一九三五年底瓦窑堡会议后，他继续在国外发表了《抗日救国政策》等文章，鼓吹阶级合作论，否认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主张建立在国民党领导下的“国防政府”和以国民党军队为中心的“抗日联军”。

一九三六年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从革命根据地到达国民党统治区，在天津窃据了党的北方局的领导职位，竭力贩卖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他热衷于走上层路线，搞合

法主义，主张对蒋介石政府“委曲求全”、“卑躬屈节”，贯彻了一条错误的白区工作路线。八月，他又指使薄一波等几十个人在监狱中叛变自首，结成了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叛徒集团。

因此，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步建立，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已经迫切地提到党的面前了。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准备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来到，牢牢把握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举行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系统地分析了从“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来的新形势，总结了这一阶段革命运动的新经验，指出“争取和平”的阶段已经过去，新的任务是用争取民主去巩固和平、实现抗战。

毛主席指出，要实现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必须“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同时又向尾巴主义作斗争”。

我们党内历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民众运动中，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倾向，这是一个妨碍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多数群众的恶劣倾向。这时，党内有“左”倾观点的人，观察问题不从根本之点出发，而从许多局部和一时的现象出发，于是对形势形成了一幅暗淡的画图。他们认为“日本后退了，南京更动摇了，民族矛盾下降，国内矛盾上升”，否认国民党开始转变，否认新阶段的到来和新任务的提出。这种估计是错误的。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前不得不暂时向无产阶级找同盟军，也和我们向资产阶级找同盟军一样。观

察问题不从这一点出发，就会否认过去一年半以来为建立统一战线而作的努力，就不可能把革命车轮推进一步。因此，在每一个具体的工作中肃清这个倾向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则以民族斗争来否定阶级斗争，抹煞国内的阶级矛盾。他们在国内和平实现后，只讲抗日，不要民主，把抗日与民主对立起来。毛主席指出：“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毛主席还指出，抗日是人民的抗日，抗日需要人民的动员，因此，就要争取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日战争，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所以，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自由权利的取得，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的重要部分，也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针对右倾机会主义者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应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要求的错误，毛主席尖锐地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只有认清党在统一战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坚决向尾巴主义作斗争，才能保证我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

党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自己对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

呢？首先，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是这样的口号。为了实现这些基本政治口号，还要提出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如“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等，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党应该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党的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和纪律的严格。

毛主席在报告中强调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党面临着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的任务，就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毛主席号召全体干部学习革命先烈，把自己改造得更好一些，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革命水平。但是还不够，还要作为一种任务，在全党和全国发现许多新的干部和领袖。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毛主席这两个报告，批准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自一九三五年以来的新的政治路线，为我党领导抗日战争作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重要准

备。

【《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哲学著作的发表】

在土地革命战争快要结束，抗日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为了总结我党长期斗争的历史经验，从思想上、理论上引导全党分清路线是非，从两条路线斗争中吸取必要的经验教训，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下了一系列光辉的哲学著作。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主席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并在党中央举办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作了讲演。这一著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概括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人民革命战争的经验，完整地规定了我党领导革命战争的战略原则。这部伟大的著作，是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成果，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的总结。它深刻地批判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等在军事问题上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特别是着重批判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它是一部重要的马列主义军事著作，也是一部光辉的哲学著作。

从思想上、理论上分清路线是非，最主要的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弄清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的思想根源，分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形而上学。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总是从认识论的高度来揭露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不断地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来武装全党。

早在一九三〇年五月，毛主席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出发，深刻地阐明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意义，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

论断。毛主席尖锐地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并且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一九三七年七、八月，毛主席又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两部哲学著作，并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了讲演。毛主席在这两部光辉哲学著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王明路线，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从思想上、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总规律和宇宙发展的根本法则。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人的认识依赖于人的社会实践。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否认了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离开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就不可能获得任何可靠的知识。

《实践论》分析了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飞跃，指出“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人的认识，在低级阶段，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表现为理性的。感性和理性两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实践论》又分析了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飞跃，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理论必须再回到实践中去，用到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

总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

“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我们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在认识论上，都是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反对进行调查研究和革命实践，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理论和实践统一这个根本观点背道而驰的。王明之流拒绝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来研究中国革命实践，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片言只语，去吓唬人们。他们坚持唯心论和主观主义，反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进行调查研究和阶级分析，反对理论联系实际。而有一些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的同志，不了解理论对于指导革命实践的重要性，把局部经验当作普遍规律，对了不知对在那里，错了不知错在何处，因而有时上当受骗，做了这种假马克思主义者的俘虏。为了保证党在政治路线上的正确，必须坚持思想上、理论上的正确路线。**“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首先强调指出，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用这个观点来分析我们革命失败和胜利的原因，就可以看出，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党内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起作用的。当我们清算了陈独秀机会主义，革命就重新发展了。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中国革命又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打击，是因为党内产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当我们清算了王明路线时，革命又重新发展了。所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毛主席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因此，在我们党内始终存在着矛盾斗争。“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矛盾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各别事物的特殊本质，才有可能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研究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进行考察。然而，王明之流却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完全不管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

事情弄得很坏。”

毛主席还指出，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因此，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是我们党正确地决定政治上、军事上的路线和政策的一个重要方法。但是，王明机会主义者却与此完全相反。他们根本拒绝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不分析每个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在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时候，改变自己的政策和策略，导致了革命的严重挫折。

在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后，还必须进而研究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毛主席指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一切矛盾着的东西，都是互相联系着的，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我们党正是按照这个客观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去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者却坚持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死的、凝固的东西。这种主观主义，一害革命，二害自己。

毛主席指出，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我们党内正确思想同错误思想的矛盾，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

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如果犯错误的同志能够改正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矛盾。因此，一方面必须对错误思想进行严肃斗争，另一方面又要给犯错误的同志以改正错误的机会。但是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会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历史证明，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由于他们的阶级本性和两面作风，是很难改正错误的。

《实践论》、《矛盾论》这两部伟大的哲学著作，批判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清算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大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给了全党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

第七节 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深入。在文化战线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在对革命根据地发动反革命的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化运动，配合人民革命战争，进行了坚韧不拔的斗争，粉碎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成为当时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这场深刻的文化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在文化战线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鲁迅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

态，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机会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鲁迅写下的一系列的战斗檄文，是广大共产党员必读的著作。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反动文人，在它的指挥刀的保护下，亮出各种招牌，疯狂地“围剿”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正是在这刀光剑影中，鲁迅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团结并率领广大的进步文艺工作者，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粉碎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鲁迅在同“新月社”^①的斗争中，撕开了胡适、梁实秋之流标榜“为艺术而艺术”的假面具，戳穿了他们“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真面目。之后，一部分堕落的人文公开投靠国民党反动派，挂起“民族主义文学”^②的招牌，歌颂侵略战争，鼓吹民族投降主义。鲁迅愤怒地斥责他们是“洋大人的宠儿”，揭露了他们出卖民族的奴才本相，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正当鲁迅同“民族主义文学”进行斗争的时候，托派匪徒胡秋原却打着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幌子，贩卖资产阶级的“文艺自由论”，攻击革命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是剥夺作家的“自由”，“破坏艺术形式”。鲁迅辛辣地讽刺了这伙匪徒，指出他们是“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思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③与托匪“自由人”同时出现的，是以苏汶为代表的所谓“不偏不倚”的“第三种人”^④。他们宣扬超阶级的、永久的文艺，并居心叵测地向受着反动派残酷压迫的“左翼”文坛要“创作自由”。鲁迅剥开了他们的伪装，指出他们虽然标榜自己是“第三种人”，实际上是一定超不出阶级的，不过是顽固地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而已。在这场尖锐的斗争

中，以买办资产阶级文人林语堂、周作人为代表的“论语派”^⑤，大肆提倡“闲情逸致”的“幽默”小品，为国民党反动派粉饰太平。鲁迅尖锐地指出，这是一群“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西崽”^⑥，他们捧出“幽默”来，无非就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⑦，借以麻醉人民。鲁迅正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围攻中，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阶级分析为武器，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反动谬论，杀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

鲁迅还密切配合红军的反“围剿”斗争，猛烈地抨击了国民党对内对外的反动政策。他根据形势的发展，通过对政治生活中重大事件的分析，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及其“以华制华”的老法宝，揭露了蒋介石卖国集团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反革命嘴脸。鲁迅用高超的文笔，勾画了买办官僚们在国难声中一面逃跑投敌，一面搜括民脂民膏的丑态，戳穿了他们污蔑共产党和劳动人民反动宣传。同时，鲁迅猛烈地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赖以安身立命的反动理论基础——“孔孟之道”，发表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等著名讨孔檄文，彻底批判了孔家店的反革命本质。鲁迅深刻地指出，古今中外的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捧出尊孔这块招牌，都是“怀着别样的目的”的，一语道破了尊孔复古的反动用心。鲁迅的文章、讲话和宣言，是匕首，是投枪，刺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心惊胆颤，坐立不安。

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惧。他们采取了种种卑劣的法西斯手段，查封、捣毁进步文化团体，逮捕以至杀害进步人士。鲁迅本人曾被“通缉”，多次被迫转移。一些战友被秘密杀害。但是，鲁迅仍然不计个人安危，“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

迅小诗”，^②决不退缩一步。在白色恐怖中，鲁迅先后用了一百三十五个笔名，以隐晦曲折、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坚持斗争，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顶恶风、战逆流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正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化战线的英勇斗争，使得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也罢，封建买办文化的精神枷锁也罢，御用文人的伪装欺骗也罢，统统挽救不了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失败。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新民主主义论》）

文化战线上反革命的“围剿”和革命的反“围剿”之间的斗争，实质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文化战线上的领导权的斗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不久，在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影响下，创造社、太阳社里的某些人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挑起了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他们采取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态度，多方围攻鲁迅。鲁迅向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三〇年三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在成立大会上，鲁迅发表了著名的讲话《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就左翼作家队伍的建设问题，提出了纲领性的意见。鲁迅深刻地批判了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以及思想上的个人主义，指出它们的哲学基础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唯心主义。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指导战斗的左翼文化运动的纲

领。

从一九三一年开始，窃取了“左联”领导职务的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四条汉子”，在政治上推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实行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上则以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为指导，形成了一条三十年代的文艺黑线，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但是，鲁迅并没有被他们的反动气焰所吓倒，他领导和团结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向这条文艺黑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鲁迅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了更好地去战胜敌人，积极团结广大作家，对周扬之流的错误曾作过多次严肃的批评和帮助。但是，周扬一伙为了推行他们的错误路线，却大搞宗派分裂活动，拒绝鲁迅的劝告。他们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唆使同伙或亲自出马，发表化名文章，制造谣言，施放暗箭，恶意诬蔑和攻击鲁迅。他们实际上是充当了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别动队。对此，鲁迅曾经愤怒地指出：“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②

红军长征胜利以后，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动。毛主席、党中央根据这个新变化，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但周扬一伙却追随王明，从极“左”跳到极右。一九三六年春，他们背着鲁迅，解散了“左联”，并公开提出了“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口号。陈独秀一伙托洛茨基匪徒，这时则以极“左”面貌出现，恶毒攻击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利用周扬一伙围攻鲁迅的机会，妄图挑拨鲁迅和党的关系。

鲁迅为了驳斥托派匪帮，于六月九日写了《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严正声明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热情地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无情地揭穿了托匪的理论“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不免要“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痛斥托匪“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实在“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十日，鲁迅又写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抓住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个关键问题，正式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口号，击中了“国防文学”的要害。

由于鲁迅对周扬一伙的深刻揭露，迫使他们的主子不得不亲自出马上阵。大叛徒刘少奇化名莫文华，抛出黑文，叫嚷统一战线要“更大胆些，更放手些，把门完全打开！”^④一直紧跟王明的那个所谓“天才”“理论家”陈伯达，这时也跳了出来。他叫嚷两个口号的论争应当立即“休战”，却又吹嘘“国防文学”“是联合战线的口号”，“是不可驳倒的”，诬蔑“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宗派主义”。他还抛出了“国防哲学”这个资产阶级的口号，鼓吹要“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帮助、合作下，让反共头子、买办文人、文化特务以及资产阶级学者，以封建的“孔孟之道”，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蒋介石标榜的“礼义廉耻”，来“开发民智”、“启蒙大众”。这种所谓“国防哲学”，同周扬一伙的“国防文学”以及“国防音乐”、“国防戏剧”等等，完全是一丘之貉，都是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是国民党

文化专制主义的帮凶。

尤其令人气愤的是，周扬之流明知鲁迅病情转重，却指使徐懋庸写信骂上门去，乘机“大布围剿阵”。他们攻击鲁迅“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胡说无产阶级“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不要“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否则就会“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徐懋庸还指桑骂槐地诬陷鲁迅“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鲁迅敏锐地看出，“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④于是，鲁迅以惊人的革命毅力克服病痛，扶病口授《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并化了四天时间亲自加以修改和增写。文章再一次声明坚决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

“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文章指出，周扬一伙所侈谈的什么“基本的政策”，只不过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的东西。鲁迅又根据他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正确地断言：“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鲁迅在卧病期间，就是这样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周扬一伙所推行的王明投降主义路线，为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不幸在上海逝世。鲁迅的一生，是共产主义者光辉战斗的一生。他坚持革命作家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斗争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社会，改造客观世界，同时又切切实实地无情地解剖自己，改造主观世

界。直到临终前两个月，他还表示：“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⑤。鲁迅正是以这种革命一辈子、学习一辈子、改造一辈子的精神，在斗争实践中，认真读书，真正弄通马列主义，成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作了崇高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本 章 小 结

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土地革命战争（又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或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为推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国内革命战争。

这个时期，由于有了前一阶段的经验，由于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进一步的了解，由于全党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就能够进行了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资产阶级虽然叛变了，但是党能够紧紧地依靠着农民。党的组织不但重新发展了，而且得到了巩固。敌人虽然天天在暗害我们的党，但是党驱逐了暗害分子。大批干部重新在党内涌

出，而且变成了党的中心骨干。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所有这些，都是党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

这个时期，我们党曾遭受过多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正如毛主席所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关于情况的通报》）当我们党同国民党分裂，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后，很快又出现了一九二七年底至一九二八年初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这个时期内，虽然出现过陈独秀取消主义、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以及其他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的倾向，但是，主要是这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危害极大，教训极深。

两条路线，两种结果，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全党。按照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没有人有了人，没有枪有了枪，没有政权有了政权，按照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却丢掉了人，丢掉了枪，丢掉了革命根据地，使工农红军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经过革命实践的反复检验，证明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从此，我们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注 释】

- ①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二日天津《大公报》
- ② CC系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授意陈果夫、陈立夫扩大“浙江同志会”，在南京成立“中央俱乐部”，以把持国民党党务和文化教育等部门。其中，专设职业特务机构“调查科”。一九三八年，更名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简称“中统”。关于CC有两种说法，一说，“陈”字英文拼音第一个字母为C，CC即两陈的意思，或说，CC是“中央俱乐部”的英文译名 Central club 的速写。
- 蓝衣社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仿效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的“褐衫党”，组织“蓝衣社”，专门从事破坏革命运动、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的罪恶活动。一九三二年成立“复兴社”，社员制服为蓝衣蓝褂。其核心组织为“力行社”，由特务头子戴笠主持。一九三八年在“蓝衣社”的基础上，成立了特务组织“军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 ③ 引自《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一九二七年八月）
- ④ 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其干部多为共产党员。汪精卫叛变革命后，这个警卫团于八月三日离开武昌，准备到南昌参加武装起义。行至中途，闻南昌起义军已南下，乃到修水与

平江浏阳农军会合。

- ⑤ 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九二七年二月）
- ⑥ 十大纲领是：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治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民；八、改善士兵生活，给士兵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 ⑦ 陈独秀：《关于中东路问题给中央的信》（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
- ⑧ 转引自《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决案》（一九三〇年九月）
- ⑨ 引自《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一九三〇年十二月）
- ⑩ 引自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 ⑪ 参见《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 ⑫⑬⑭ 引自《中共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
- ⑮ 引自《中央给红军党部及各级地方党部的训令》（一九三一年六月十日）
- ⑯ 转引自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 ⑰ 淞沪停战协定，即《中日上海停战协定》。“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派外交团

次长郭泰祺去英领事馆，同日本公使重光葵进行停战会谈。五月五日，签订了这个卖国协定，规定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中国无驻军权，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域，而日本则可以在上海许多地区驻扎军队。

- ⑮ 引自《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 ⑯ 一九三一年一月上旬，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一军与红十五军会师，合编为红军第四军。
- ⑰ 转引自《中央关于一、四方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
- ⑱ 新月社，是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文化团体，成立于一九二三年，因出版《新月》月刊（一九二八——一九三三年）而得名，主要成员有胡适、梁实秋、徐志摩、叶公超等。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反动政权建立后，他们从原来依附于北洋军阀转而向国民党反动派卖身投靠。在政治上公开反共反人民，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统治效劳，在文学上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为艺术而艺术”等谬论，攻击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化运动，充当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急先锋。
- ⑳ 所谓“民族主义文学”，是国民党反动派直接策划的卖国主义文学运动。一九三〇年六月，由国民党特务、反动文人王平陵、朱应鹏、傅彦长等发起，主要刊物有《前锋周报》和《前锋月刊》。他们妄图用“民族主义”的口号掩盖国民党反动派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实质，配合其主子的反革命文化

“围剿”，对抗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化运动。

- ⑳ 鲁迅：《论“第三种人”》
- ㉑ 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正当鲁迅同反动的“民族主义文学”进行斗争时，反动文人胡秋原、苏汶（即杜衡），自称居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左翼革命文艺阵营之间，伪装成所谓“自由人”、“第三种人”，打着批评“民族主义文学”的幌子，贩卖资产阶级的“文艺自由”论，宣扬超阶级的、“永久”的文艺，反对文艺为革命政治服务，攻击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运动，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效劳。
- ㉒ 论语派，是资产阶级文学的一个流派，以一九三二年九月在上海创办《论语》半月刊得名。以后又陆续出版过《人间世》、《宇宙风》等期刊。主要代表人物有林语堂、周作人、邵洵美等。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时，他们提倡所谓“幽默闲适”的小品文，引诱青年逃避现实斗争，起着麻痹人民群众的反动作用。
- ㉓ 鲁迅：《“题未定”草》
- ㉔ 鲁迅：《“论语一年”》
- ㉕ 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
- ㉖ 鲁迅：《给杨霁云的信》（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 ㉗ 莫文华（刘少奇）：《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 ㉘ 鲁迅：《给杨霁云的信》（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 ㉙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第三章 抗日战争

(一九三七——一九四五)

第一节 全国抗战的开始。国共两党 两条抗战路线的斗争

【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当晚十时许，日军在北平西南的芦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遭到当地中国驻军的拒绝。日军竟向宛平县城射击，并重炮猛轰芦沟桥，悍然挑起了这场侵略战争。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影响下，当地的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芦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从此，中国人民革命运动，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

“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列宁：《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是它长期以来对外侵略政策的继续，是它内外矛盾发展的结果。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开始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日本

资本主义同天皇制的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在对外扩张侵略和对内残酷剥削中，扩展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进一步形成垄断资本主义。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财阀集团为代表的垄断资本，到一九一三年已控制着日本工商企业全部资本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垄断资本财团，一面操纵国民经济命脉，残暴地压榨本国劳动人民，一面策动对外侵略，疯狂地掠夺殖民地，霸占海外市场，争夺原料和投资场所。

日本天皇政府，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把对外扩张作为最高国策。长期以来，它扩军备战，穷兵黩武，妄图独霸东亚，主宰世界。日本天皇政府曾先后提出两种对外侵略政策。一种主张在占领朝鲜后，侵占我国东北和内蒙，然后并吞全中国，进而独霸亚洲大陆。这就是所谓“大陆政策”。另一种主张以我国的台湾为跳板，向南洋群岛一带扩张，进而称霸亚洲、太平洋地区。这就是所谓“海洋政策”。不论是“大陆政策”还是“海洋政策”，都把中国作为对外侵略的主要目标。一九二七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召开了“东方会议”，讨论了独霸中国和亚洲的基本政策。会后，田中向天皇提出了奏折，十分露骨地说：“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与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洲之用。”^①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和向南蚕食我国华北，就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战略侦察步骤。

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促使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同广大劳动人民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在经济上，日本政府为了发动侵略战争，加紧扩军备战，使军费年年上升。仅直接军费一项，一九三六年就比一九三一年增加一倍以上，达到十亿

七千八百万日元，占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四十七点二。国民经济军事化，使军需工业畸形发展，民用物资奇缺。日本政府为解救经济上的窘境，滥发纸币，加重税收，更使广大人民日益贫困。在政治上，日本反动政府全面加强了法西斯专政。一九三六年广田内阁上台后，在所谓“全面革新政治”的口号下，颁布了“思想犯保护监视法”等一系列反动法案，禁止人民集会结社，大大地强化了法西斯统治。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同年，日本工人罢工斗争达到了战前的最高峰，总数超过四十二万人。农民的反抗斗争也日益激烈。据日本官方统计，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每年的“租贷纠纷”比一九二九年增加了一至二倍。

同时，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也加速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步伐。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日本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经济危机之后，出现了持续性的特种萧条。到了一九三六年，旧的萧条尚未结束，又开始酝酿着新的危机。经济危机激化了政治危机，不但国内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在国际上同美、英、法之间的矛盾也加剧了。日本垄断资产阶级认为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分赃过少，迫切要求改变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支配中国的局面，而企图独霸中国。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日本宣布废除华盛顿条约。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美、英、法、日、意在伦敦开会，为了争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大吵大闹，日本则以退出会议来同美英相对抗。一九三六年八月，日本内阁“五相会议”通过了《基本国策纲要》，规定日本政府的“根本国策是在外交国防密切配合之下，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上的地位的同时，向南洋发展”。十一月，日本同德国结成同盟。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准备用发动战争来重新分割世界，而中国就

被它看作为重新分割世界的首要目标。“七七”芦沟桥事变，就是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国共两党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 芦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立即发表了《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七月十五日，我党又向国民党发出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同国民党约定，这个宣言要和蒋介石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同时公开发表。但是，国民党却拖延了很久不予发表。七月十七日，我党中央代表周恩来同志等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等在庐山举行谈判，蒋介石被迫接受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之后，经过我党一再的批评和督促，直到九月二十二、二十三日，国民党才先后发表了我党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至此，国共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宣告成立。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它为实现我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创造了基本的条件。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存在着左、中、右三个集团。左翼集团是共产党率领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他们是抗日的基本力量。尤其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群众，是抗日战争的主力。中间集团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同工农群众有矛盾，但他们受到日本侵略者的严重打击，也受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限制和损害，因此可以成为我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右翼集

团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暂时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它们同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仍然是敌我性质的，他们的投降倾向是必然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存在着不同的阶级、党派和集团，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便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斗争，主要表现为国共两党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的斗争。

国民党由于害怕人民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推行了一条片面抗战路线。这条路线不要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幻想依赖美英的援助，由腐败不堪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包办抗战。芦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方面宣称对日作战，表示要“抗战到底”，另一方面却和日寇勾勾搭搭，密使往返频繁，积极进行谋和活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德国驻国民党政府大使陶德曼的斡旋下，蒋介石表示愿意以日本政府提出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对日谈判。后来，只是由于日寇的条件十分苛刻，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不断高涨，才不得不暂时作罢。在对内政策上，蒋介石口头上表示“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⑤但是，事实上却把共产党看成“第一个敌人”，阴谋“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蒋介石政府集中了相当一部分主力部队，封锁陕甘宁边区，准备伺机发动进攻。在国民党统治区，更用各种办法限制共产党，继续暗杀、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破坏人民抗日活动。总之，“他们惧怕人民起来，惧怕民主运动，惧怕认真地动员全民的抗日战争。这就是他们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对内的反人民、反民主、反共的反动政策的总根源。”（《论联合政府》）

中国共产党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坚持一条全面抗战路线。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指出，从芦沟桥事变开始，中国的政治形势已进入了实行抗战的新阶段。但是，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将给抗日战争带来严重的危险，由此可能发生内部分化、暂时退却、局部妥协等不利的情况。抗日战争必将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但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必能克服一切困难，取得最后胜利。会议指出，当前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为此，“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洛川会议前后，即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到十月间，毛主席为了阐明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批判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先后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等四篇重要著作。

毛主席指出，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存在着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前途。共产党的方针是坚决抗战，办法是依靠人民群众，其结果就能得到民族解放的前途。国民党的方针是妥协退让，办法是压迫人民大众，其结果必将是做奴隶的前途。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实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民力和军力相结合”，“政府和人民相结合”。“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问将不能取得胜利。”（《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因此，“我们

的基本口号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

为了领导全国人民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需要有一个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革命纲领。毛主席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代表我党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十大救国纲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的外交政策；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抗日的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抗日的民族团结。这个纲领是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在抗日时期的具体化，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有力武器。

要实行这个革命纲领，必须改造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须将现政府改造成为一个有人民代表参加的统一战线的政府。这个政府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这个政府实行必要的革命政策。”（《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一个新政府的出现是完全必要的，有了这样一个政府，才能执行革命的纲领”。（《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毛主席的这四篇重要著作，深刻地揭示了国共两党两条抗战路线的根本分歧，尖锐地批判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提出了我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革命纲领，规定了党在政权问题、军队问题、人民民主和军事作战问题上的方针和政策，指明了抗日战争胜利前进的方向。

【国民党军队的溃退。解放区战场的开辟】 在两条根本对立的抗战路线指导之下，出现了两个抗日战场、两种局面。

芦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内亲日派到处散布“和必乱，战

必败，败而后和，和而后安”的谬论，而亲英美派的蒋介石则企图用“外交方法”解决，和日寇进行谈判。结果，日本侵略者争取了时间，调集了援军，加强了攻势。七月三十日，北平、天津同时失陷。日寇在占领平津后，即把进攻的矛头指向华北和华东。在华北，沿平绥、平汉、津浦各线，分路进攻山西、绥远、河南、山东。在华东，大举进攻上海。

在日寇的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由于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完全丧失战斗力，一触即溃，一溃千里。在华北方面，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南口和张家口守军不战而退，日军沿平绥线长驱直入。九月中旬，大同陷落。十一月八日，太原失陷。八月下旬，日军又沿平汉线南犯。国民党军队在涿县失守后，即自动放弃保定，仓皇南逃，直奔河南。十月中旬，石家庄失守。十二月中旬，津浦线上的重镇济南失陷。到一九三八年春，华北的重要据点大部陷入敌军之手。在华东方面，八月十三日，日军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上海人民英勇地奋起抵抗。由于上海是国民党四大家族的经济中心，驻上海的国民党军队也进行了抵抗。但是，国民党害怕发动民众，军事上又采取单纯防御的方针，至十一月十二日，上海终于陷落。接着，日寇分兵几路进攻南京。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南京之间的防线，不堪一击，不到一个月，南京城已处在日寇的三面包围之中。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中央机关纷纷逃奔武汉。十二月十三日，国民党军队在极度混乱的状态下撤出南京。一九三八年五月，津浦线上的战略要地徐州失守。接着，日寇进犯华中、华南。十月中旬，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国民党守军望风而逃。二十一日，广州沦陷。同月二十五日，在日军南北夹攻下，华中重镇武汉失陷。国民党中央政府又从武汉搬到重

庆，躲进了峨眉山。

抗战仅一年零三个月，蒋介石就把大片国土拱手让给了日本帝国主义。日寇所到之处，扶植傀儡政权，劫掠经济资源，进行奴化教育，更兼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使沦陷区人民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南京被占领后的一个多月内，全市被焚毁的房屋达三分之一，被屠杀的群众在三十万人以上。其残暴狂虐的程度，为世界历史所罕见。日寇妄想用血腥暴行，慑服中国人民。但是，结果适得其反，它激起了中国人民对日本法西斯强盗的无比愤怒，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

同国民党军队的溃退相反，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遵循毛主席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教导，开辟了敌后战场，英勇抗击日寇，建立了大片抗日根据地。一九三七年八月，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后又称第十八集团军），以朱德为总指挥，下辖三个师，以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十五军团为主，编为一一五师，以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为一二〇师，以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为一二九师，全军共约三万人。九月间，八路军东渡黄河，陆续进入山西，奔赴晋西北、晋东北前线，迎击日寇。同年十月，长征后散布于赣、闽、粤、湘、鄂、豫、浙、皖等八个省十四个地区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以叶挺为军长。一九三八年一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江南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在安徽岩寺一带集中，编为第一、二、三支队，共六个团。江北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的七里坪、河南确山的竹沟两处集中，编为第四支队，分三个团。新四军共四个支队，一万二千人，在毛主席、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东进抗日。这时，八路军、新四军虽只有四万

多人，但却是久经考验的人民军队。他们高举民族解放大旗，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点燃起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火，创建了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陕甘宁：一九三七年九月，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共辖二十三县。十一月，在完成普选运动的基础上，建立了边区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党中央一直在陕甘宁边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战。陕甘宁边区成了全国抗日的中心，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首府延安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在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前线后，驻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和地方武装，守卫着几百里黄河河防，保卫着边区。一九三八年三月，日军一度占领府谷，九月，炮击宋家川，妄图进犯边区，但都先后被粉碎。陕甘宁边区还成立了总工会、农民会、妇女联合会、青年救国会，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开展了蓬蓬勃勃的抗日民主运动。一九三九年初，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宣告成立，并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的抗日民主运动，为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提供了经验，树立了榜样。党中央在这里创办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马克思列宁学院、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卫生学校，为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培养了大批干部。在毛主席、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欣欣向荣，成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大后方”的腐朽、黑暗、倒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晋察冀：一九三七年秋，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在政委聂荣臻同志率领下进入五台山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十一月七日，成立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接着，打退了日寇的第

一次围攻，收复了晋北、冀西、冀中、察南五十多个县。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在阜平召开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组成了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一九三八年春，派出一个支队挺进到北平西郊的西山一带，开辟了平西根据地。同年四月，建立了冀中抗日民主政权。六月间，又组织一个纵队，进入冀东地区，配合当地的党组织，在冀东七县发动武装起义，并在十七个县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开辟了冀东根据地。这些地区的开辟，使晋察冀根据地更扩大了。

晋东南：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由刘伯承同志率领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在正太线痛击日寇之后，进入晋东南，与当地抗日武装相结合，建立了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四月初，日寇抽调兵力三万多人，分九路向晋东南根据地大举进攻。我军以一二九师和一一五师一部为主力，英勇地进行反击。经过十余日的血战，敌人在我军民不断的阻击下，不得不退出根据地。我军乘胜追击，在武乡长乐村一战大捷，打死打伤敌军二千二百余人。我军在这次反击战中，共计毙伤敌四千余人，收复了十多个县城，彻底粉碎了日寇的围攻。在开辟晋东南区的同时，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二九师又组织一个挺进队，越平汉路进入冀鲁豫大平原。次年一月，由冀南挺进津浦线，在鲁西北和津南开展抗日斗争，开辟了冀鲁边的抗战局面。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二九师还组织了东进纵队，进入冀南平原。第二年二月，召开了冀南第一次军政民代表大会，产生了冀南军政委员会筹委会。八月，正式成立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到九月，全区共建立了五十一个县的抗日政权。上述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为以后建立统一的晋冀鲁豫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晋西北：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国民党弃守太原后，八路军

一二〇师坚持在晋西北开展游击战争，并创建了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三月，日寇乘我军开赴同蒲路作战之时机，调集万余兵力，占据了晋西北宁武、神池等七个县城。一二〇师主力星夜赶回，两天行军三百余里，激战二十多天，打退了日寇的进攻，全部收复七县，推动了晋西北区抗战局面的迅速发展。同年八月，一二〇师一部北上绥远，攻凉城，越平绥线，进入大青山地区，与当地的抗日武装相配合，发动绥东、绥西、绥南以及察哈尔的游击战争，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以后，大青山区和晋西北区统一为晋绥抗日根据地。

山东：一九三七年冬，我党领导的鲁中徂徕山抗日武装，与新泰、莱芜、泗水的三支游击队会合，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自卫第四支队。一九三八年二月，胶东地区的一支游击队组成为第五支队。同时，山东其他地区的抗日游击队，也在战斗中壮大起来了。到一九三八年秋，山东全省的人民武装发展到九个支队，三万人左右，组成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并在胶东的蓬莱、黄县、掖县等地，首先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一九三八年内，各支队发动了胶东、龙口、济南等大小战役数十次，毙伤日伪军三千余人。

华中：一九三八年四月起，新四军除军部和三支队留守皖南外，其余部队分江南、江北两路东进，深入敌后。江南的一、二支队向苏南进军，六月，进至南京、镇江、丹阳、句容、金坛、武进、溧水、高淳、芜湖一带，把广大农村从敌伪手中解放出来，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解放区。在六、七、八三个月中，江南部队作战三十余次，有力地打击了敌人，鼓舞了群众。次年春夏间，又派出东进纵队，在苏（州）常（熟）太（仓）地区开辟解放区。江北的四支队向皖

东挺进，五月进到安徽巢县、无为地区，开辟了以藕塘为中心的江北根据地。同时，又在巢湖击溃登岸敌人，乘胜解放了淮南路两侧和津浦路南段两侧地区，开辟了淮南解放区。一九三八年五月，徐州失陷后，新四军东进支队越平汉线，和豫东地区的人民游击队会合，次年春进入徐州、蚌埠间开展游击战争。这支部队被编为第六支队，开创了淮北解放区。同年十月，武汉失陷后，豫南、鄂中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不久，两处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在汉水两岸的广大地区，开创了鄂豫皖解放区。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一月，新四军江北江南两个指挥部相继成立，分别由张云逸同志和陈毅同志负责。

东北：七七事变后，我党领导下的抗日联军发展到十二个军。第一、二军，战斗在辽宁省。第四、五、七、八、九、十军，战斗在吉林省。第三、六、十一军，战斗在黑龙江省。第十二军，战斗在热河南部。日寇为了对抗日联军进行“扫荡”，组成了八个军区，设立了八个宪兵团，使用了并大村、筑围墙、坚壁清舍、封锁食粮、户口登记、十家联保、通行证等办法，企图隔断人民群众与抗日联军的联系。一九三七年底，日寇更用四个师团的兵力，实行“三江省大扫荡”。抗日联军沉重地打击了日寇，虽然自己的力量也受到了损失，但仍然继续坚持斗争。

当时抗日战场的形势，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从一九三七年九月到一九三八年十月，华北八路军与敌人战斗一千五百余次，毙敌五万多人，牵制敌兵力三十万以上，自身队伍也迅速发展到了十五万多人。解放区战场的开

辟，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打破了日寇企图在短时间内灭亡中国的幻梦，制止了它在国民党战场长驱直入的凶焰。日寇惊呼：“华北有八路军是不能安枕的”。^④只得被迫停止战略进攻，回过头来以主要兵力把守占领区。

第二节 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发表。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斗争的展开】 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第二次建立，象潮水一样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发生了对国民党无原则迁就的错误。在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政权问题上，出现了右倾的主张。在八路军中，产生了新军阀主义的倾向。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中，也出现了议会主义的倾向。

这种错误倾向，也反映在作战行动上。林彪在彭德怀的支持下，违反毛主席的正确方针，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下旬集中一一五师主力，适应国民党的需要，在平型关打大仗。毛主席早在八月洛川会议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我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九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发出了《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指出要以分散兵力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的唯一无二的办法。二十五日，毛主席又发出了《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强调当前的一切工作都应环绕于游击战争，指示全党要把游击战争作为今后的唯一工

作。但是，林彪迫不及待地发起平型关战役，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同毛主席提出的游击战的方针相对抗。平型关这一仗，由于我军全体指战员的英勇奋战，歼灭了日军最精锐的板垣师团三千多人，取得了战役上的胜利，但是，在战略上则是错误的。

我们党一开始就对这种右倾投降主义倾向进行了斗争。在根据地内坚持了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在八路军中恢复了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及时重建了政治部。九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参加地方政府，只会“模糊共产党人的面目，延长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对于推动统一的民主政府的建立，是有害无利的。”

十一月，毛主席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报告。毛主席在报告中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左、中、右三个集团的政治态度，指出我党的任务是在坚决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孤立右翼集团。并指出在芦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是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毛主席及时告诫全党：“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再一次强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没有独立自主，就没有真正的统一战线；离开独立自主原则同资产阶级合作，就是阶级投降主义。“因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必须尖

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

正在这个时候，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从国外回国。他不仅不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告诫，反而摆出一副“钦差大臣”的姿态，反对毛主席的这个报告。在十二月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降低共产党的原则立场，竭力鼓吹阶级投降主义。十二月九日，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大纲《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就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纲领。会后，他担任长江局书记的职务，到武汉工作。在那里，王明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大搞独立王国。十二月二十五日，王明不经中央批准，擅自发表所谓《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提出六点投降主义主张，公然同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相对抗。接着，他又炮制了《挽救时局的关键》、《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等文章、报告，更加系统地宣扬了投降主义的谬论。

王明抹煞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和阶级矛盾，抹煞了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他鼓吹统一战线中“不分左中右”，说什么国共两党都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宣扬国民党是“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生存而奋斗的最大政党”^④，“经济力量最雄厚，军事力量也最强大”，是“抗日的政治经济中心力量”^⑤。正是从这个根本观点出发，王明在政治、军事等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一整套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和政策。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王明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完全取消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质上是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不敢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作坚决斗争，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日寇占领区扩大抗日根据地，

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拱手送给国民党。

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上，王明反对毛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展人民武装，扩大八路军、新四军的正确方针，而鼓吹一切抗日军队实行所谓“七个统一”：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实际上是要把人民军队交给蒋介石。他反对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提出“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⑥的错误方针。

在党的工作重心问题上，王明反对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而主张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城市。他醉心于合法运动，致力拉拢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企图以所谓“建议”、“赞助”去推动国民党抗战，把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他认为抗战的胜利，不是人民的胜利，而是国民党的胜利，抗战胜利后的天下，不是人民的天下，而是国民党的天下。王明的这些主张，完全适应了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需要。这样，王明又回到了一九二七年陈独秀“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错误路线上去了。

为了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十四日、二十二日，毛主席和党中央给长江局、东南局连续发出了重要指示，对新四军的作战行动和徐州失守后的华中工作，提出了正确的方针。在《中共中央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党在长江流域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的建立几个基干游击队与游击区”，华中工作的重心应由城市转入农村，要动员上海、武汉等大中城市的工人、学生和其他革命分子，到农村中去，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

地。在关于新四军进行游击战的指示中指出，新四军主力应进入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的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

但是，王明拒不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顽固地认为徐州失守后抗日的战略中心是“保卫大武汉”，仍然把华中工作的重心放在大城市，而不去组织游击战争和开辟根据地。结果，城市的革命力量没有适时地转到农村，使我党丧失了长江流域发展革命武装和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有利时机。由于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新四军的发展也较缓慢，到一九三八年，仅由抗战开始时的一万多人发展到二万五千人，而八路军已从三万人发展到十五万六千人。

【《论持久战》等著作的发表】 当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战争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指使军队对陕甘宁边区进行蚕食和侵扰，派遣特务进入边区偷窃军事机密，破坏军事、经济、文化组织和各种民众团体，还唆使和支持地主分子进行复辟活动，强迫农民交还已分得的土地房屋和已废除的债务。在这种情况下，王明投降主义者却对蒋介石的反共阴谋步步退让，甚至“热情”地向国民党表示“诚挚的友谊”。为了打击蒋介石的破坏活动和纠正党内的机会主义错误，一九三八年五月，毛主席写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明确宣布：保护人民既得利益，一切已经分配的土地房屋和已经废除的债务，不准擅自变更；保护边区各种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组织及民众团体，制止一切破坏行为；对于破坏分子，一律严惩不贷。这一布告，得到人民群众的坚决拥护，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的破坏活动。

当时，在对日作战问题上，国民党分子和王明右倾机会

主义者还散布了一系列谬论。国民党内的汪精卫集团组织了“低调俱乐部”，专门鼓吹“亡国论”，叫嚷：“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①蒋介石也是“亡国论”的鼓吹者。他早就高唱“三天就亡国”的论调，说什么：中国“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②然而，蒋介石又幻想依靠外援取得速胜，同时鼓吹“速胜论”，宣扬“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变化”，就可以取得胜利。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台儿庄一战，国民党集中了四十万军队，消灭了日寇七千人，这一来，“速胜论”就鼓吹得更热闹了。当时，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者也在鼓吹“速胜论”。他幻想依靠国民党的“数百万”军队来取得速胜，宣称“南京军队表现他们能够抵御日本机械化部队从海陆空各方面的攻击”^③，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则污蔑说，“现在大家都喊游击战，好象有了游击战什么都不成问题似的”。^④

为了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一九三八年五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部重要著作。毛主席全面地总结了抗日战争以来的经验，科学地分析了抗日战争所处的时代特点以及中日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精辟地论证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并且指明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制定了人民战争的路线和方针。

毛主席深刻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这一对主要矛盾，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毛主席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

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中日双方有互相矛盾着的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这些特点将在战争进程中发生作用。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来看，日本的长处是暂时的，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日本的短处是基本的，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中国的短处是暂时的，可因我之努力而克服，中国的长处是基本的，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日本的长处和中国的短处，决定了中国不能速胜。中国的长处和日本的短处，决定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毛主席科学地预见到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这样，既批判了“亡国论”，又批判了“速胜论”。

毛主席在这两部重要著作中，批驳了王明的机会主义观点，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上来考察，为我军规定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由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进步性，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而是大规模的，就不仅有战术的配合作用，而且有重大的战略作用。并且，游击战争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作战，而是在外线独立自主地单独作战。游击部队不仅要担负作战任务，还必须担负起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伟大战略任务。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游击队和游击战本身也将逐步向正规部队和正规战争发展。游击队在斗争中必须建立和发展根据地，实现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达到最后战胜敌人的目的。

毛主席关于持久战的理论和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体现了彻底的人民战争的思想。坚持持久战的过程，也就是动员人民、组织人民、武装人民，在长期斗争中逐步地削弱敌人，壮大自己，使敌人变强为弱，使自己变弱为强，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过程。“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把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就能制敌于死命。这一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彻底地批判了王明投降主义者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人民群众，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抗战，不敢发动群众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被克服】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主席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政治报告，着重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王明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在十月二十日的发言中，表面上同意毛主席的政治报告，实际上继续鼓吹“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谬论，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十一月五日和六日，毛主席又作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的结论，进一步驳斥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理论。

毛主席阐明了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强调坚持统一战线必须同时坚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统一战线建立以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它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因此，王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

战线”的口号，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王明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实质上就是坚持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彻底实行阶级投降主义。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们应该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毛主席还批判了王明轻视武装斗争、反对发展人民军队和农村根据地，妄图把我军“统一”给国民党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毛主席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战争和战略问题》）离开了准备武装斗争和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武装斗争，民众的组织和斗争就不能真正发挥革命的作用。例如，王明在武汉搞的那一点所谓合法组织，被国民党一禁止，便一下子垮了，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所以，紧紧地掌握无产阶级的兵权，是决定党和人民的命运的大问题。毛主席教导全党：“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战争和战略问题》）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毛主席的政治报告和结论，批准了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由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经在全党占了统治地位，才使王明路线没有在更大范围内危害党的事业。全会还撤消了王明负责的长江局，重申了党的纪律，规定未经中央同意，党员个人不得以党的名义发表任何宣言和文章。六届六中全会对王明路线斗争的胜利，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

第三节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发表。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

【相持阶段初期的形势。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斗争】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武汉、广州以后，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日本侵占了半个中国，盘踞了我国大部分交通线和大城市，但是，它的战线更加延长，兵力越来越分散，财政经济危机日益加剧，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也进一步发展了。特别是我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使日寇的后方燃起了人民战争的熊熊烈火。在战争初期，日本军阀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对国民党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用主要力量向国民党战场进攻。经过一年多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者深感国民党并不可怕，共产党则是可

怕的。于是，改变为重视共产党，轻视国民党，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而逐渐转移其主力来对付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制定了《关于一九三八年秋季以后战争指导的一般方针》和《对华处理方案》，叫嚷：“强化长期持久作战的体制，抱着断然继续战争的决心，确保占领地区的治安，进行自主的建设。”这表明日寇的策略有了改变，停止了战略进攻，把主要兵力转向了敌后解放区战场。

日本帝国主义根据新的策略，将其前线兵力源源向华北后方转移。一九三九年春，华北敌军制定了《治安肃正计划》，在军事上提出了“巩固点线，扩大面的占领”的方针。敌人使用杀光老百姓制造无人区的“竭泽而渔”的掏水战术，集中一路优势兵力深入袭击我中心区的“单刀直入战术”，以及用绝对优势兵力对游击区“分区扫荡，分散布置，灵活进剿”的“牛刀子战术”，大举“扫荡”抗日根据地。在战争的第二、三周年，千人以上的“扫荡”有一百零九次之多，使用兵力达五十万左右，其中一万到二万人的大“扫荡”七次，三万人以上的两次，六万人以上的一次。为了配合“扫荡”，敌人还大事修筑铁路、公路、据点、碉堡等工事，提出了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并辅之以封锁沟、墙的对敌压缩包围的“囚笼政策”。

日本侵略者还提出所谓“共同防共”、“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口号，加紧对蒋介石集团进行政治诱降，企图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其“以华制华”阴谋。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日本政府发表宣言声称：“至于国民政府，倘能抛弃从来错误政策，另由其他人员从事更生之建树，秩序之维持，则帝国亦不加拒绝。”并宣布废止同年一月十六

日的宣言，放弃不以国民党政府为谈判对手和建立伪政权的政策。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又发表了中日关系之“根本调整方针”的声明，进一步表示：只要向日本投降，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的地位均可不变，日本可以退出华中、华南，华北是要占领的，但主权的名义可以不要。在经济上，日本一方面竭力掠夺中国的资源财富，以实现其“以战养战”的方针，一方面又以所谓“经济提携”，“合办实业”来相引诱。在华中、华南，日本允许中国资本家投资百分之五十一，日资占百分之四十九，在华北，日本允许中国资本家投资百分之四十九，日资占百分之五十一。日本还允许发还中国资本家原有产业，折合计算，充作资本，作为诱饵。

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还伙同美、英、法帝国主义大搞“远东慕尼黑”的政治交易，企图通过他们进一步迫使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

美、英、法帝国主义一贯标榜采取“中立”或“不干涉”政策，纵容德、意、日法西斯进行侵略活动。一九三八年九月，英、法和德、意签订慕尼黑协定，出卖捷克、换取德国向苏联进攻。但是，他们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法西斯德国并没有按照英、法反动派的意图立即进攻苏联，而是相反地把主力调往了西线。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这个协定，打破了英、法帝国主义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投降派。同年九月，德国进攻波兰，英、法同时对德宣战，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就在欧洲搞慕尼黑阴谋的同时，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间，美、英、法帝国主义还企图通过所谓“太平洋

国际会议”，解决“中日冲突”，出卖中国，以谋求同日本的妥协，维护他们在华的殖民权益，并便于他们应付德国的挑战。一九三八年冬和一九三九年春，英驻华大使多次往返上海、重庆之间，劝说蒋介石向日本投降求和。一九三九年七月，英国同日本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公然承认日寇侵华为“合法”行动，叫嚷“凡有妨害日军……的行动，英政府均无意加以赞助。”十月，英、美大使一齐到重庆进行劝降活动。一九四〇年七月，英国取得美国的支持，竟封锁了中国西南交通线滇缅公路，以讨好日本，压迫蒋介石投降。国际投降主义者的这种劝降活动，一直延续到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在日寇诱降、英美劝降的情况下，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迅速增长了。国民党亲日派汪精卫集团，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离开重庆往河内，配合近卫声明，发表“艳（二十九日）电”，公开投敌。一九三九年底，汪精卫和日本签订了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⑩。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成立了臭名昭著的汪伪“国民政府”。国民党亲英美派蒋介石集团，则与汪精卫集团里应外合，唱双簧，装红白脸。它把主力龟缩到西南和西北，避战观战，保存实力。同时，积极制造“和则存，战则亡”、“日本将改变其根本政策，自动地退出华中、华南甚至华北”等等投降舆论，并公开发表谈话，要求英美进行“调停”。蒋介石的代表还多次与日本代表在香港、上海等地秘密谈判，谋求对日妥协投降。

蒋介石集团为了扫清投降的障碍，日益加强了反共活动。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政策，设立了“防共委员会”。

接着，就雪片一样地制造所谓“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向外扩展”，乃至“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等等的假消息、假报告、假文件、假决议，用以蒙蔽真相，欺骗舆论。随后，又陆续秘密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并在兰州、西安、赣州、上饶等地设立了许多“集中营”，大肆迫害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还继续派遣特务潜入我抗日根据地，开展所谓“点线工作”，发展特务组织，进行破坏活动。蒋介石在实行“政治限共”的同时，更加紧“军事限共”，到处制造磨擦。一九三九年四月，国民党秦启荣部在博山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游击支队，惨杀八路军战士四百余名。六月，国民党张荫梧部袭击八路军在河北深县的后方机关，惨杀我军指战员四百余人。六月十二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派兵包围新四军湖南平江的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位同志，制造了“平江惨案”。十一月十一日，国民党军队和特务一千八百余人，围攻河南确山县新四军留守处，惨杀新四军伤员和家属二百余人，制造了“确山惨案”。此外，蒋介石还玩弄所谓“曲线救国”的阴谋，指使其一部分军队和官员公开投降日寇，变成伪军、伪官，配合日军一起进攻我抗日根据地。

针对这一极为复杂和严重的形势，毛主席发表了《反对投降活动》、《必须制裁反动派》、《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和《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等一系列重要著作，尖锐地指出：“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

准备投降这一个主要的特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反对投降活动》）毛主席教导全党要提高警惕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针对国民党的投降分裂活动，毛主席重申了我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三大政治口号，号召全国人民用一切努力去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投降阴谋，力争时局的好转。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必须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的自卫原则，以严正的态度对待之。

【《〈共产党人〉发刊词》的发表】 为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迫切需要总结经验，加强党的建设。经过头三年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革命实践，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变成了一个屹然独立的大政党。然而，大批新党员还没有受到教育，老党员也有提高水平的问题，很多的新组织还没有巩固，老组织也需要进一步巩固。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时时刻刻在企图破坏我们的党，党内混进了许多投机分子和敌人的暗害分子。因此，一九三九年八月，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规定党的发展一般应当停止，而以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并要求对党员成分进行详细审查，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加强党的干部教育与培养，以及加强党的纪律和党的团结。这个决定，对于党的巩固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党的建设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九三九年七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抛出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大毒草。他闭口不谈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不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谈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却大肆宣扬孔孟之道，大谈唯心主义的“思想意识修养”，要人们关起门来，“吾日三省吾身”。刘少奇离开了当时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党内矛盾，大肆兜售这种唯心论的“修养”经，其目的就是妄图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党、腐蚀党，使我们党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把党员“修养”成资产阶级的伪君子、两面派，以适应蒋介石“溶共”政策的需要。

为了把我们的党建设成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使党有力地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去夺取抗日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一九三九年十月，毛主席为党中央主办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写了一篇发刊词。《〈共产党人〉发刊词》这一光辉著作，总结了我党成立十八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论断，党的建设过程，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的武器。因此，这个时期党的建设问题，总是“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

毛主席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十八年来，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都是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

在民主革命中的两重性，不能正确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因而导致了革命的失败。党的历史经验证明：“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反之，就会后退一步。

毛主席揭示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又一个基本特点，就是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是密切地联系于这一斗争形式的。十八年来，我们党的发展和巩固，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离开了武装斗争，就不能了解我们党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党的建设。党的历史经验证明，“当我们党正确地处理革命武装斗争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反之，也就会后退一步。

毛主席全面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深刻地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同正确处理统一战线的问题密切联系起来，必须同武装夺取政权这个革命的中心任务密切联系起来，必须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起来。我们党的建设过程，也就是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斗争过程，党的发展、壮大和巩固正是在这种斗争中实现的。这就是我们党的建设的重要历史经验。

《〈共产党人〉发刊词》这篇光辉著作，指出了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组织的重要意义，指出了只有投入伟大的革命实践，正确理解和贯彻党的政治路线，才能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这是古田会议提出的坚持进行路线教育的伟大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它指引着全党在正确路线

的基础上铁一样地巩固起来。

【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发表】 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〇年春，蒋介石为了准备投降日寇，掀起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边区，在陆空军的配合下，侵占了淳化、枸邑、正宁、宁县、镇原等五个县城，并集结了大量军队，准备进攻延安。与此同时，阎锡山假称对日寇发动“冬季攻势”，要我党领导的山西西部的的新军向同蒲路出击。但当新军正准备出动时，却遭到了阎部六个军的突然袭击。一九四〇年二、三月间，蒋介石又指令朱怀冰等部，分三路进攻太行山区，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这三起事件，是第一次反共高潮的主要标志。我党根据自卫原则，给了国民党进犯军以迎头痛击。在陕甘宁边区，我八路军三五九旅从华北敌后调回，协同留守部队，打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解放了绥德分区五个县，使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联成了一片。山西新军在打击了前来进犯的阎锡山军队后，转移到晋西北和太行山区，正式编入了八路军。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消灭了朱怀冰部三个师，彻底击败了这次进攻。这样，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就在军事上被完全打退了。

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顽固派在思想政治战线上也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竭力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谬论，妄图取消革命，取消共产党，取消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以维护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反共声浪，一时甚嚣尘上。民族资产阶级也摇摆不定。它虽然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矛盾，主张抗日和民主，但又惧怕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的

深入，因而企图实行“中间路线”，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

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在思想政治战线上的进攻，批判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思潮，我们党在思想理论战线上进行了伟大的战斗。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〇年一月，毛主席陆续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光辉著作，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等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回答。

毛主席深刻地指出，中国的社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前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毛主席严正驳斥了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谬论，批判了妄图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错误主张，指明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明确地指出，“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中国要走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从国际情况说，帝国主义不容许，社会主义也不容许。“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从国内情况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已经属于无产阶级

而不属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是决不容许中国走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的。毛主席严正警告国民党反动派：顽固地坚持旧三民主义、伪三民主义，继续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那就必将得到一个自寻死路的前途。

国民党蒋介石还雇佣了几名托洛茨基匪徒，摇动笔杆枪，大肆鼓吹所谓“一次革命论”，说是什么革命都包举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应该“收起”来了。针对这种叫嚣，毛主席深刻地阐明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异同，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下一阶段了。”共产主义，“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宣扬“一次革命论”的目的，就是企图从根本上消灭任何革命，为投降日寇制造舆论。“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党内陈独秀、王明之流右倾机会主义者，也抹煞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区别，不要社会主义革命，不要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之流“左”倾机会主义者，则迷惑于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不知革命有阶段之分，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毛主席批判了这两种错误观点，为我党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纲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以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作为这个政权的构成形式。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是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为国家所有，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此基础上发展具有社会主

义因素的合作经济，允许不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是建立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主席的这些光辉著作，不仅从思想上政治上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而且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理论，揭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规律，为中国革命指明了胜利前进的航向。

第四节 《论政策》等著作的发表。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被粉碎。人民抗日力量的猛烈发展

【坚持民族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在打退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蒋介石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总政策，并没有改变。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放弃斗争，听任国民党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那末，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民族统一战线就会破裂，抗日战争就要遭到严重的挫折。但是在当时，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的客观条件，还是存在的。中日民族矛盾依然是主要矛盾，全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要求抗日的。英美帝国主义和日本之间的利害关系也无法协调，远东慕尼黑会议很难召集起来。苏联则坚决支持和积极援助中国抗战。最根本的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一切，使国民党不敢轻易对日妥协投降，不敢轻易举行全国性的反共内战。

在抗战和投降两种方向同时存在、胜利和失败两种前途都有可能的形势下，我们党的任务，“就是团结一切抗日的进步的势力，抵抗一切投降的倒退的势力，力争时局的好转，挽救时局的逆转。”（《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力争民众运动的深入，力争知识分子，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

实现上述任务，关键在于坚决执行毛主席制定的革命路线和一整套正确的政策。但是，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的情况下，党内又滋长了一种“左”的倾向。这种“左”的倾向，自一九三九年冬季以来，在许多地方普遍地发生了，并且已开始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持有“左”倾观点的人，忽视中日民族矛盾依然是主要的矛盾，把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估计为“马日事变”，认为国共合作已经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内战的局面马上就要重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已经不适用了。因此，他们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无限制的斗争，不懂得适可而止，把中间势力同顽固势力混为一谈，不注意团结和争取中间势力，不愿意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政策，主张实行工农专政，过份地打击地主、资本家和商人，不注意区别对待，不愿意同非党人员共同工作，对他们表示不信任，不接近，等等。同时，党内右的倾向也还没有彻底肃清。一九三八年十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彭德怀、彭真之流继续推行王明路线，在晋察冀根据地等处贩卖王明在六中全会上的右倾投降

主义谬论。他们依然只讲联合，不敢斗争，吹捧蒋介石国民党，甘愿束缚自己的手足，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袭击缺乏应有的警惕。所有这些，都严重地妨碍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

针对这些情况，毛主席在一九四〇年一月至十二月，先后发表了《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重要著作，为我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整套策略原则和各项具体政策。

毛主席指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论政策》）这种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是建立在统一战线中我党所联合的对象具有两重性这一点上面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仅中间势力具有两面性，而且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具有两面性。它一方面同日本对立，一方面又同共产党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因此，我们“对于反共顽固派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在抗日方面，顽固派又有两面性，我们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例如暗中勾结日寇和不积极反汪反汉奸等）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顽固派在反共方面也有两面性，因此我们的政策也有两面性，即在他们尚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在他们对我党和对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方

面，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论政策》）

为了全面地贯彻执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团结和斗争这两个方面的辩证关系。“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以为斗争会使统一战线破裂，而幻想以退让求团结，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对于顽固派的投降反共政策，只有开展必要的斗争，才能限制其实施的范围，逼使他们承认进步势力的地位，借以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但是，如果认为斗争的手段可以无限制地使用，统一战线可有可无，那末，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为了实现抗战胜利和建设新中国这个总任务，我党不仅要尽力争取中间势力，而且要充分利用顽固派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在顽固派还没有公开的全面的破裂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应争取他们留在统一战线中，其时间越长越好，这对于坚持团结抗战是有利的。我们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思想上、政治上乃至军事上的各种斗争，其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党的政策是从阶级关系的区别而来的，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既要把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亲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要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论政策》）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把统一战线中的各个阶级、阶层和派别分为进步、中间和顽固这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论政策》）的策略方针。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些革命的基本力量，亦即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创立抗日根据地，在全国发展共产党的组织，放手发动一切革命的群众运动。这是我们一切斗争的立足点，是争取中间势力和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条件。“只有一步一步地发展进步势力，才能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而为抗日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这些中间势力都有抗日的要求，因而都是可以争取的力量。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有可能同我们一道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地方实力派只可能同我们共同抗日，而不愿意同我们一道建立民主政权。争取中间势力，是我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要实现争取中间势力的任务，必须有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是：我们有充足的力量，尊重他们的利益，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

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孤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方面，尽可能地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团结他们共同抗战；另一方面，同他们的反共投降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如果没有斗争，进步势力就会被顽固势力消灭，统一战线就不能存在，顽固派对敌投降就会没有阻力，内战也就会发生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必须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理即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有利即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也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而是利用顽固派内部的矛盾，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有节即休战原则。对顽固派斗争要适可而止，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头脑。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以后，应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并主动地同他们讲团结，在对方同意之下，双方实行休战，而在他们举行新的进攻时，才又用新的斗争对待之。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总之，“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论政策》）为了实现这个基本原则，克服“左”的和右的倾向，毛主席指示全党必须落实各项具体政策。《论政策》等光辉著作，还为我党系统地规定了关于政权组织、劳动、土地、税收、锄奸、人民权利、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方面的具体政策。毛主席在这个时期制定的一系列的策略原则和各项具体政策，反映了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原则性和高度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艺术，是我党领导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保证。

【打退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 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之后，仍然千方百计地想消灭我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力量。一九四〇年三、四月间，蒋

介石命令李宗仁、韩德勤等部，先后在江苏、安徽、湖北等地，对我新四军发动进攻，并要我江北部队撤往江南，企图割断我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联系，以便各个击破。

针对蒋介石的这一阴谋，五月四日，毛主席为党中央给东南局写了《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指出必须“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同时，提醒东南局要充分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但是，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却拒不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继续推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对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仍然不作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十月十九日，何应钦、白崇禧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发出了“皓电”，对坚持敌后作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污蔑，强令黄河以南的人民抗日部队在一个月内撤至黄河以北，并要五十万八路军、新四军缩编为十万人。十一月九日，我党以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等名义，发出“佳电”，向全国人民揭露了这一阴谋，指出“国内一部分人士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投降肃清道路”，这些人“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电文驳斥了国民党限令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北移的荒谬命令，号召全国人民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同时，我党为了顾全团结抗战的大局，同意将新四军皖南部队移至长江以北。我党的这一团结抗战的步骤，获得了全国人

民的拥护，取得了中间派的同情和支持，使自己在政治上处于完全主动的地位。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我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九千余人开始北移。那时，国民党反动派早已调兵遣将，准备袭击我新四军北上部队。但是，项英不按中央指出的路线前进，却去和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商量我军北上的路线。五日，当队伍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同国民党军队遭遇，项英又徘徊不进，以致遭到预先埋伏在这里的顾祝同、上官云相部七万人的合围。面对着敌人的重兵围攻，我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了七昼夜，但终因众寡悬殊，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新四军军长叶挺在谈判中被扣，项英则在突围中被打死。这就是震动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反咬一口，于一月十七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并下令汤恩伯、李品仙等的二十余万军队进攻我新四军江北部队。

皖南事变发生以后，我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立即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同志为代理军长。一月二十二日，毛主席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彻底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日伪，实行联合“剿共”的罪恶阴谋，提出了取消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惩办皖南事变祸首、恢复叶挺自由、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等十二条，作为全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行动纲领。我党严正声明：“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

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正式重建，并将所属部队扩编为七个师。在八路军的有力支援下，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与此同时，全国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解放区广大军民坚决声援新四军的斗争，痛斥蒋介石的反共投降罪行，并为打败蒋介石的进攻作了充分准备。国民党统治区和日寇占领区的各阶层人民及海外华侨进步团体，也纷纷发出通电，要求团结抗战，反对反共内战。很多中间派人士，开始时劝我让步，这时也转为支持我党的反击行动。在我党针锋相对的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声讨下，蒋介石在政治上完全陷于孤立，被迫从进攻转入防御，妄图引诱我党出席参政会，以减少国内外舆论对他的谴责。三月二日，我党中央坚决拒绝出席参政会，并扩大人民抗议运动，又提出了要国民党承认抗日民主政权等第二个十二条，作为解决时局的临时办法和出席参政会的条件。我党的这一系列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获得了广大人民包括中间阶层的拥护，给了蒋介石以沉重的打击。到一九四一年三月，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收敛了他的反共活动。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就被粉碎了。

在打退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我党的正确方针得到了国内外一切赞成抗日的人们的同情和支持。在我们党的推动下，国内的中间势力开始组织民主党派，建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同我合作进行抗日民主运动。毛主席及时总结了这次斗争的经验，写了《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文，深刻地指出：“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

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教育全党仍须提高警惕性，对蒋介石的反革命的两面政策要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要采取以打对打、以拉对拉的两面政策。但斗争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三者缺一，就要吃亏。

【人民抗日力量的猛烈发展】 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贯彻毛主席“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援，在华北、华中、华南广大地区，同敌伪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围攻和“扫荡”，给了敌人以严重的打击。在抗战第三周年的一年中，我八路军对敌伪军作战六千九百多次，歼灭敌伪军十一万三千多人。在对敌斗争中，我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获得了猛烈的发展。到一九四〇年七月，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游击队已发展到近五十万人，共产党员发展到八十八万人。我军抗击着侵华日军兵力的百分之五十八和伪军的全部，总数共达七十万。从抗战开始到一九四〇年的三年作战中，八路军和新四军收复县城一百五十座，从敌人手里夺回了大片国土。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解放区和游击区的人口达到了近一亿人。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已成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主要力量，解放区战场已成为抗战的主要战场。

在华北，八路军开辟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等四个大的战略区。

晋察冀边区，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我边区军民粉碎了五万敌军的二十五路“围攻”，毙敌七千人，伤敌万余人。一九三九年，日寇在春季大“扫荡”被粉碎后，十月间，又在北岳、冀中两个战场上发动了冬季大“扫荡”。敌

人对北岳区分兵十二路进行围攻。我军除分路阻击外，并深入敌后作战。十一月三日，日军第二混成旅团头目阿部规秀中将，从涞源派出一个联队约七百余人，向我军进攻，被我围歼于三岔口山沟里。阿部接到求援急电后，倾巢而出，向我军反扑。结果，反而陷入了我军的包围圈。阿部规秀犹如一条受了伤的疯狗，率领残部一千六百多人疯狂向北突围。在黄土岭、上庄子一带，又被我阻击部队截住。这个日本军国主义的“名将”，东冲西突，到处遭到我军的迎头痛击。经过一昼夜的激战，阿部及其以下五百余名官兵均被我军击毙。日寇哀叹道：“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到十二月中旬，我军共打死打伤日寇四千多人，俘虏日伪军二千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冬季“扫荡”。这时，晋察冀边区已发展到同蒲路以东，正太、德石路以北，张家口、涞源、承德以南，山海关以西，包括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四省之各一部，划分为北岳、冀中、平西、平北、冀东五个区。

晋冀鲁豫边区：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九年二月，我军粉碎了三万敌军对冀南的进攻。一九三九年七月至九月，在反击敌人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中，又歼敌近万人。一九四〇年八月，边区建立了统一的行政联合办事处，次年通过民主选举成立了边区政府。这样，发轫于太行山上的抗日游击战争，便扩大为西起同蒲、汾河，东至渤海，南靠黄河，北沿正太、德石路的一块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根据地划分为太岳、太行、冀南、鲁西、冀鲁豫五个区，包括山西的东南部、河北的南部、河南的黄河以北部分以及山东的西部。

晋绥边区：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〇年初，我军粉碎了

敌人春季大“扫荡”后，于一九四〇年二月在晋西北召开了第一次晋绥边区行政会议，建立了晋绥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接着，又粉碎了敌人的夏季大“扫荡”和冬季大“扫荡”，使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山东区：一九三九年三月，罗荣桓同志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一部进入山东西南部。我军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立即投入战斗，首先攻克了敌伪重要据点郛城西北的樊坝。四月下旬，敌人动员了泰安、兖州、济南、东阿等十七个城市的守备兵力六千多人，坦克一百辆，在其山东最高指挥官的率领下，分兵七路，向我军驻地泰安、肥城一带山区的陆房包围靠拢，妄图一举围歼我军。五月十一日，我军连续打退了敌军多次冲锋，毙伤敌军一千三百多人后，乘夜四面突围，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次日，敌军在炮火掩护下窜进陆房，不见我军影子，惶惑地叫道，“八路军天上飞去了！”最后，只得拖着—批尸体，狼狈而归。八月，我军再次在古梁山泊附近歼敌一个大队。一九四〇年一月，又击退敌三万余人的进攻。山东地方游击队也于一九三九年统一了编制，有力地配合着主力部队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一九四〇年底，成立了山东战时行动委员会，作为山东区最高行政机关。全区有渤海、胶东、鲁中、鲁南、滨海等五块抗日根据地，包括津浦路以东之山东省的大部地区以及河北和江苏两省的各一部地区。

在华中、华南、东北等地区，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有了发展。

在华中，新四军向江、淮、河、汉广大敌后地区挺进。一九三九年六月，东进纵队奇袭上海虹桥机场，毁敌机四架。次年五月，又连袭上海附近的安亭、葛隆两车站，日寇

败逃，我军全歼伪军，俘敌一百四十余人，给了上海人民以极大的振奋。一九三九年十月，鄂豫挺进纵队以一个团兵力，阻敌伪步骑五、六百人于鄂中新街，从早上五时战斗到晚上十时，消灭敌军百余人。这是日寇在鄂中的第一次惨败。一九四〇年，在徐蚌之间开展游击战争的新四军第六支队，也多次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在四月一日的一次著名战斗中，我军击退了二千余敌军的进攻，巩固和扩大了解放区。到一九四〇年，新四军已在淮南、苏北、苏中、苏南、豫皖、江北、皖东北、鄂豫等地区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在淮南、苏中、苏北、苏南、豫皖边区等根据地普遍地建立了县、区、乡的人民政权。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位于江、淮、河、汉之间，东临大海，西屏武当，南抵太湖，北至陇海，包括江苏省的绝大部分，安徽、湖北、河南三省的一部分。

在华南，自从广州失陷后，以东江地区老红军游击队员、香港归来的工人和爱国华侨为主要成分，组织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游击队不断地打击敌伪军，先后在淡水、东莞、惠阳、宝安等地建立了根据地。一九三九年春，在南海、顺德、中山一带，也开展了游击战争，抗日武装力量遍及于整个珠江三角洲，并以淡水为中心，在二十多万人口中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至一九四一年，游击队发展为东江人民抗日游击纵队。日寇以二千余兵力配合伪军对游击队发动轮番进攻，但都被我军打退。在海南岛也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冬，岛上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琼崖抗日自卫队独立队，当时仅有三百多人。一九三九年二月，日寇入侵以后，游击队奋起抵抗，并在斗争中迅速壮大起来。到一九四一年，游击队已发展到数千人，成立了琼崖纵队，在儋

县、临高、琼山、澄迈一带山区建立了根据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在东北，我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部队进行了缩编，但仍然继续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随着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各抗日根据地先后经过民主选举，普遍地建立了“三三制”的统一战线政权。其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代表着无产阶级和贫农；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代表着小资产阶级；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代表着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三三制”政权团结了各界人民群众，加强了对敌斗争，促进了根据地建设，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节 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的开始。《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著作的发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党中央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抓住了这个极好的时机，开展了全党整风运动。

我们党创立以后，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直到伟大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才彻底地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从那时以来，在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指引下，我们党不断地胜利前进。党的历史经验，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一条真理：一个政党的成功或失败，决定于路线是否正确。路线不正确，即便夺取了政权，还会丧失政权。路线正确，没有政权也会取得政权。

遵义会议以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依然存在。机会主义路线仍然不断地从右的或“左”的方面，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只有坚决同这些危害革命的错误路线作斗争，并且彻底战胜它，正确路线才能得到贯彻执行。党的历史上出现过的错误路线，这时虽然已得到纠正，但也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彻底地加以清算，特别是王明的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路线，其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理论是路线的基础。要彻底纠正一条错误路线，不但要进行组织上的整顿，而且还要进行思想上理论上的整顿。为了使全党能够坚持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必须开展整风运动，把两条路线斗争提高到理论上加以解决，从思想理论方面打败错误路线，彻底摧毁错误路线的理论基础。只有把思想上的路线搞正确，才有可能把政治上的路线搞对头。这是开展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必须遵循的一条客观规律，是正确路线彻底战胜错误路线的保证。

一九四一年五月，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为整风运动提出了伟大的战斗纲领。报告深刻地论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深远意义，精辟地阐明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原则和方法，号召把“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为开展整风运动作了重要的政治动员和理论准备。

同年七、八月，党中央相继对全党发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重要文件。九月，党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以及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和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领导干部的整风会议。二十六日，党中央又发出了《中央关于高

级学习组的决定》，规定中央及各解放区都成立高级学习组，学习与讨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的问题。毛主席亲自担任中央学习组组长。各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领导。延安有一百多名高级干部参加学习，全国参加学习的共约三百人。这是全党整风运动的预备阶段。

从一九四二年二月起，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部署，整风运动开始推向全党。二月一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党校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八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讲演。这样，整风运动就首先在延安展开。同年六月，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全党进行整风学习的通知，于是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在各解放区先后开展起来了。

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著作中，向全党发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伟大号召。整顿三风，从思想上清算王明路线，这是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它的根本目的，就是在于使全党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党员干部，掌握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改造我们的学习》）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理论和实践是对立的统一。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革命的实践，必须有正确的革命理论作指导，才能取得胜利。然而，任何理论如果不和客观实际相联系，如果不同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即使再好，也是不起作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它必须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成为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

但是，一切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反对理论和实践统一这个根本原则。他们坚持理论和实际相脱离、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的主观主义，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反对革命实践和调查研究。毛主席指出：“**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整顿党的作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一伙就是教条主义的典型。他们拒绝研究中国革命的经验。他们也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把自己打扮成“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这是为了吓唬和欺骗工农干部和天真烂漫的青年，而他们自己从来也不想照马克思主义办事，从来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历史和现状，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从中引出结论，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相反地，他们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把马列主义书本上的个别字句搬到中国来，当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他们把自己主观愿望、感想和空谈当作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体，树木当成森林。这样，他们的路线和政策便必然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广大人民的要求、同正确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要求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处于相对立的地位，也就必然要在革命实践中遭到破产。在我党的历史上，也有一些人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他们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把局部的经验当作普遍的真理，轻视马列主义的理论指导，不了解理论对于指导革命实践的重要性，因而往往被教条主义俘虏，并成为它的助手。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虽然表现形态不同，但在思想方法上，却是一致的，都是以理论和实践相脱离、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为其特征的，都表现为唯心主

义的主观主义。毛主席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改造我们的学习》）

为了批判王明之流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使全党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思想原则，毛主席号召全党“要认真读书”，密切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着重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整顿党的作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首先要注重研究现状，“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同时，也要注重研究历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而且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以便吸取有益的历史经验，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现实的阶级斗争。总之，要把理论、现状、历史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在组织上必然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陈独秀的家长作风，瞿秋白的惩办主义，李立三的一言堂，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都是宗派主义的表现。毛主席指出：“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

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

（《整顿党的作风》）为了克服宗派主义倾向，毛主席号召全党同志要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和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同时根据当时的情况，为全党进一步规定了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新干部和老干部、以及几部分军队、几个地方、几个部门之间的正确关系。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在文风上则表现为党八股。文风也是一种党风，它是为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在我党历史上，围绕着文风问题进行的原则斗争，实质上是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我们必须透过文风看党风，从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看待文风问题。党八股这种文风，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就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末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就要原形毕露了。毛主席强调指出：“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反对党八股》）只有彻底破除党八股，代之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文风，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才能得到发扬，马克思主义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党的事业也才能向前推进。

为了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毛主席为整风运动规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毛主席指出，对于一切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

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这是加强党的团结，使党能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战胜敌人的重要保证，也是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重要保证。毛主席在解释这个方针时说：“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整顿党的作风》）这个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的准则，既区别于否认矛盾、不分是非的“党内和平论”，又区别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它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了团结大多数的原则。为实现这一正确方针，毛主席还指出：在处理党内历史问题时，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这样做，既能彻底了解我党的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能团结一切同志，包括犯过错误、愿意改正的同志，共同工作。至于对极少数混在党内的叛徒、特务，则坚决予以彻底揭露，清除出党。

根据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方针，毛主席、党中央又规定了整风运动的方法。全党同志认真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研究党的有关文件，运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批判机会主义路线，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方法，把读书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结合起来，把学习马列主义同批判机会主义结合起来，把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斗争同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结合起来，有力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思想水平。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 政治路线的斗争，总是要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反映出来的。抗战以来，王明、周扬之流在延安和解放区各地，通过报纸、刊物、文艺作品、书籍，以及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等阵地，狂热地推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胡说什么提倡学习马列主义，就会妨害创作情绪，写不出作品来。他们以反对功利主义为名，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他们主张以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作为文艺的理论基础，鼓吹“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他们提倡所谓“暴露文学”，宣称“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他们在“写熟悉生活”的口号下，反对表现工农兵的斗争生活，专门去写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条文艺路线，是“五四”以来特别是三十年代以来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为王明的机会主义政治路线服务的。

从一九四一年开始，抗战进入最艰苦时期。混在革命阵营中的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王实味、丁玲、肖军、罗烽等，在周扬的纵容下，积极配合口寇和国民党顽固派，向党发起了进攻。丁玲、陈企霞把持的《解放日报》副刊，成了反党的前沿阵地，发表了大量反党反人民的毒草。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肖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等，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作。周扬本人也赤膊上阵，抛出了《文学与生活漫谈》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坚持推行王明路线，公然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攻。这批毒草一出笼，就博得了国民党反动

派的喝彩叫好，被当作反共宣传材料，大量印行，有的还被改编为剧本上演。

延安和各解放区的文化思想界，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对这条文艺黑线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场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是“五四”以来文化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三十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同王明路线斗争的继续，是伟大的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文艺座谈会。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出席会议，发表了极其重要的讲话。五月二日，讲了“引言”，二十三日，又讲了“结论”。这就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彻底批判了王明、周扬之流的“左”右倾机会主义文艺路线，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系统地、深刻地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为我们党制订了一条完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毛主席的这部光辉著作，是按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文艺、改造世界观的战斗纲领，是一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必读的经典文献。

《讲话》深刻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是“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的光辉思想，强调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文艺为千百万工农兵服务，还是为一小撮剥削者服务？这是马列主义文艺路线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斗争的焦点，它深刻地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

历史观的斗争。无产阶级文艺必须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成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群众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强大工具。它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斗争的目标和任务，服务于党在一定时期中的纲领和路线。因此，革命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学习和掌握唯物史观，分清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不断增强路线斗争观念。

《讲话》精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观点，全面地论述了文艺与现实生活、文艺创作和社会实践的关系问题。毛主席深刻地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一切革命知识分子、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中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转移立足点，学习和总结亿万工农兵所创造的宝贵经验，努力反映工农兵的火热斗争生活。

《讲话》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论，对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人性论”的种种表现，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在阶级社会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对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以及各种错误言行，坚决斗争到底，努力做到：“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

为了更好地发展革命的文学艺术，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作斗争，必须掌握文艺批评这个有力的武器。文艺批评的标准是什么呢？毛主席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无产阶级要求的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即“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这就为文艺批评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毛主席在《讲话》中，还论述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以及对待文化遗产的方针和政策等问题。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部光辉著作的发表，开辟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新纪元。延安和各解放区文艺界，立即掀起了学习《讲话》、实践《讲话》的热潮。以王明、周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受到了揭露和批判。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深入部队、农村、工厂，和工农兵群众共同生活，共同战斗，创作了许多反映工农兵斗争生活的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革命文艺开始把抵抗日本侵略者、反对国民党投降反共活动、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作为创作主题，小说、诗歌、杂文、报告文学、剧本、歌曲、木刻、漫画等，都开始反映革命群众的火热斗争生活。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曲《东方红》，由一个贫农创作出来了。群众性的文艺活动蓬勃地开展起来，许多村庄都成立了村剧团或宣传队。采用陕北秧歌及其他民间艺术形式创造出的秧歌剧和大秧歌，深受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欢迎。在秧歌剧运动普遍开展的基础上，涌现出了歌剧《白毛女》这样的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新戏剧。对旧

戏剧的改革工作，在毛主席的“推陈出新”方针指引下，也开始进行。延安平剧院演出的《逼上梁山》，在戏剧舞台上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使旧剧开了新生面，成为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

【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学习和时局》的发表】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全党形成了整风运动的热潮，在广大党员和干部中，深入开展了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在这期间，党中央政治局曾经几次进行了关于党的历史的讨论。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间，又组织全党高级干部学习了党史中的两条路线问题。这次党史学习和讨论，对党的历史上的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作了彻底的清算，大大地帮助了党内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的统一。

在整顿思想作风的基础上，从一九四三年春季开始，党中央又领导全党全军开展了审查干部的运动。这是从组织上巩固、扩大整风运动的成果，加强党和军队建设的重大措施。毛主席总结了土地革命时期王明路线统治下肃反工作的历史教训，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我党领导肃反斗争的成功经验，为审干运动制订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这条路线的主要内容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毛主席还提出了在机关、部队的肃反斗争中，实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毛主席指出，审查干部和一切工作人员，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离开了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农村的广大群众，及其各级联系群众的强有力的干部，就无法最妥善地、最彻底地解决这个重要问题。这次审干运动，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

下，发动了群众，贯彻了正确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在整风和审干过程中，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毛主席进一步总结了党的领导方法的经验，为党中央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主席号召全党清除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坚持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

整顿三风、党史学习和审查干部，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极大地巩固了我们的党。一九四四年四月，毛主席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为整风运动作了总结。毛主席在讲演中深刻总结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代表中央政治局对高级干部党史学习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结论。毛主席强调指出，研究历史“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另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讲演还分析了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向全党提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任务。毛主席指出：“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所谓放下包袱，就是说，

要把精神上的许多负担加以解除。在我党的历史上，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要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所谓开动机器，就是说，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要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胜利。”

一九四五年四月，党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对于各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特别是王明路线的错误，作了正式的结论。至此，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胜利结束了。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全党通过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揭露“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分清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非无产阶级思想，收到了显著的成效。“这种成效，主要地是在于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干部和党员，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团结，从思想上和理论上保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六节 党领导解放区军民粉碎日寇残酷进攻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解放区的严重困难局面】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法西斯德国经过长期准备后，终于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发动了全面进攻。苏联人民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的领导下，英勇地投入了伟大的卫国战争。苏德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我党中央就向全党发出指示，指出法西斯德国进犯苏联，“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并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帝国主义突然袭击美国的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接着，又袭击了英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基地新加坡。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战争初期，日本占领了菲律宾、关岛、马来亚、新加坡、香港、缅甸、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地。

一九四一年七月和一九四二年六月，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先后同英国、美国签订了共同对德作战协定，最后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在世界法西斯势力猖獗一时的情况下，中国抗日战争也遇到了新的严重困难。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企图把中国大陆变成为“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进一步加紧了对

我国的侵略。而当时彭德怀顽固坚持王明路线，违背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于一九四〇年调动一百十五个团四十万兵力，发动了“百团大战”，向华北主要交通线进行总攻击，结果又暴露了华北八路军的实力。因此，从一九四一年起，日本帝国主义更加强调以共产党为主要对象的作战方针，集中了侵华兵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进攻我解放区。

在日寇加紧进攻解放区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派的“曲线救国”活动也日益猖狂。一九四一年以后，大批国民党官员和军官投敌反共，造成了“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局面。至一九四三年八月止，国民党投敌的文武官员中，有中央委员二十人，高级将领五十八人。投敌的军队达五十万，占汪伪军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二。除了公开投敌外，国民党蒋介石还派军队包围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妄图困死根据地军民。

由于日寇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敌后解放区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困难局面。到一九四二年，华北解放区的面积缩小了六分之一。八路军由四十万减少到三十多万，新四军由十三万五千减少到十一万。华北解放区人口由四千万减少到二千五百万，全国解放区人口则由一亿降到五千万以下。加以当时华北地区又连续发生水、旱、虫灾，更增加了解放区的困难。抗日的队伍里，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有些地区的军民不得不以树叶草根充饥。

【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各项政策】 为了坚持抗战，夺取胜利，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方针政策。

在政权问题上，进一步贯彻“三三制”的原则。毛主席

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着手进行了“三三制”政权的普选。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提出：“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全边区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参加了选举，按“三三制”比例，选出了乡、县、边区三级参议会，各级参议会又选出了政府委员会。十一月，召开了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全体一致通过了边区党组织提出的“施政纲领”。

华北、华中各解放区，也先后贯彻了“三三制”政策，吸收各抗日阶层的代表人物参加各级政府。根据“三三制”政策建设起来的根据地政权，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巩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强了各阶层人民的团结，加强了对汉奸和反动派的革命专政。

减租减息，是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推动生产的发展，建设与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又一项重要政策。毛主席指出：“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自洛川会议决定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后，各解放区都先后公布了有关的法令，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减租减息，获得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但各地在执行中还存在着政策不够统一和工作不平衡的现象，存在着右的或“左”的偏向。为了进一步贯彻减租减息政策，党

中央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对减租减息政策作了具体的全面的规定。它的基本原则是：（一）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必须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交租交息，并保存地主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三）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对其一部分封建性质的剥削，租息也须照减；同时，在适当改善雇工生活的条件下，保护其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

减租减息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必须充分发动群众，才能胜利地进行这一场斗争。毛主席指出：“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党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领导和帮助这个群众斗争，而不是给群众以恩赐。凡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恩赐减租，是不正确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根据这一方针，必须在减租减息的斗争中建立和加强农民团体，依靠群众自己起来开展斗争。各解放区认真执行了党的政策，普遍掀起了减租减息的热潮。通过这个运动，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提高了农民的思想觉悟，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确立了贫雇农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推动了根据地的其他各项斗争，使解放区革命政权从根本上获得了巩固。

一九四一年十月，党中央又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政策。在这以前，解放区的庞大的战争机构，是适应那时的情况的；然而，在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就不能再保持这样庞大的机构了。毛主席指出：“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

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精兵**，就是要求缩编主力部队，充实编制，加强地方部队和发展民兵，并且加强整训，达到短小精干、机动灵活、提高战斗力的目的。**简政**，就是要求精简机构，裁减冗员，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官僚主义的目的。一九四一年冬，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精简了百分之二十四。一九四三年，又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五，并建立了各种制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其它各解放区，也都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机构精简之后，减少了支出，增加了收入，建立了统一的工作系统，克服了各自为政的现象和官僚主义的作风。总之，由于精兵简政，我们把身体变得小了些，但是变得更扎实了些，因而也就能更有力地打击敌人。

巩固根据地的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归根结底取决于党的领导。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并规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各地区军政机关和民众团体中的党员或团员，必须服从上级和同级党委的领导，执行其决定。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执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实现，从组织上保证了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

此外，为了进一步加强解放区军民的团结，毛主席和党中央还指示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地大规模地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群众运动，使党政军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成为

不可战胜的力量。

上述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使解放区军民充分地动员起来，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成为一个强大的战斗整体，为战胜困难，巩固根据地，争取抗战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开展】 为了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党领导根据地的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间，毛主席先后发表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和《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等重要著作，为我党制定了领导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

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生产自给，是解放区军民克服经济困难的根本途径。“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以陕甘宁边区为首的解放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就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在陕甘宁边区，要求通过生产劳动，做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其它解放区虽处于战争环境，但也要做到“自己动手，克服困难”。

为了加强对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毛主席为全党规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决定财政的是经济，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解放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这些经费，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这一方针，着重批判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主意的错误思

想，和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

毛主席强调指出，领导生产斗争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就是说，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我们既有打仗的大军，又有劳动的大军，打仗的大军也是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这样，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打败日寇。

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在抗日根据地主要是把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组织起来》）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内，都应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广泛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综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

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各敌后根据地先后开展了军民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不仅经常深入群众，关心人民生活，关心生产运动，还挤出时间，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毛主席参加生产劳动的消息，大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生产热情。军队、机关、学校都投入了热火朝天的生产运动，建立和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业、工业和商业等经济事业。三五九旅指战员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开垦为“陕北的好江南”，是这个大生产运动的一个缩影。一九四二年，

机关、部队的粮食尚全部取之于民，但到一九四三年就能自给一部分了。有的部队，逐步做到了粮食、被服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全部自给，不领政府一点东西。边区的农民，在自愿和互利的原则下，组织了变工队、扎工队等互助组织，自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三年，开垦了二百万亩荒地。边区的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布匹开始做到部分自给，纸张做到大部自给，肥皂自给有余。其它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商业等各条战线，也都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景象。至一九四三年，陕甘宁边区经济的困难已完全克服，全面转入了发展阶段。其它各根据地，也在一九四二年开始普遍开展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大生产运动，使解放区军民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恢复和发展了人民的经济事业，巩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奠定了物质基础。

【解放区战场反“扫荡”斗争的胜利】 从一九四一年开始，日本侵略者集中其主力对我根据地继续进行连续的“扫荡”战争，企图摧毁解放区，消灭人民抗日武装，实现“确掌华北”的迷梦。

在华北，日本开始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和“非治安区”（即解放区）。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实行大编乡，以巩固其法西斯统治。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修筑封锁沟、封锁墙，平毁村庄，制造无人区，防止我军深入活动。对“非治安区”，以“扫荡”为主，实行野蛮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的两年中，敌人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出动千人以上的就有一百七十四

次，使用兵力达八十三万多，扫荡时间有延长至三个月之久的。

在华中，日本采取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清乡”政策，从苏南开始，逐渐扩张到苏中、皖中、浙东及武汉近郊。日伪往往先用优势兵力，占领我一个地区，编造几百里长的竹篱木栅，然后挨村挨户搜查新四军干部和战士。为了配合“清乡”，敌人又在我根据地周围建筑了二千五百余处据点，以分割我各根据地。同时，还大搞特务活动和欺骗宣传，企图分化抗日阵线。

解放区军民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为粉碎日寇的军事进攻，展开了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的英勇斗争。在解放区，针对敌人的“扫荡”，我主力部队或分散与民兵相结合，灵活转移，袭击敌人背侧，或集结兵力，坚决歼灭敌之一股。在游击区，针对敌人的“蚕食”政策，我采取广泛的群众运动与军事斗争结合的方针，或组织联防线，斩断敌人“蚕食”的嘴，或围困敌人，拔除据点，深入敌人点线后面，使敌腹背受击。在敌占区，针对敌人的“清乡”，我建立了武装工作队，发动与组织群众，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打击日本宪兵队、特务队和汉奸，摧毁伪政权。由于武工队的积极活动，使敌人的“治安区”变成了游击区。

解放区战场在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的基础上，实行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开展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根据地的人民，不分男女老少，都参加了自卫队和民兵，各持武器，人自为战，村自为战。自卫队是群众性的武装组织，民兵则是自卫队的骨干。在各级人民武装委员会的组织下，村设中队，区设大队，县设总队，统一指挥，

统一调遣，成为一个有机的战斗体系。当我主力兵团转移时，民兵就担当起侦察敌情，袭击骚扰敌人，封锁与围困敌人的据点，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打击武装汉奸的任务。在敌人进攻时，民兵担任保卫村庄，掩护群众转移等任务。在斗争中，群众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破击战、麻雀战、水上游击战、铁道游击战等战术，到处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总计，我八路军、新四军从一九四一年六月至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与敌伪作战四万二千余次，毙伤俘敌伪军三十三万余人。一九四三年全年，毙伤俘敌伪军二十五万三千余人。由于反“扫荡”斗争的不断胜利，从一九四二年冬起，根据地逐步恢复起来。至一九四三年底，根据地人口已上升到八千余万人，八路军已发展至三十三万九千人，新四军发展至十二万五千余人。

这种极其广泛的人民游击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在人民战争面前，敌人不管使出多少花招，不管技术装备上占什么优势，它都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位置。

第七节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 从一九四三年开始，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国内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形势变化的基本特点：“一是反法西斯阵线的增强和法西斯阵线的衰落；二是在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势力的增强和反人民势力的衰

落。”（《学习和时局》）

在欧洲，斯大林指挥下的苏联红军，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三年二月，进行了著名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消灭了德国法西斯精锐部队三十三万人，迫使德国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一九四四年，苏军又连续给德国法西斯军队以沉重的打击，把敌人赶出了国境。阿尔巴尼亚人民在恩维尔·霍查同志领导下，也赶走了德国法西斯，解放了自己的国土。东欧人民与苏联军队并肩作战，击溃了在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的德国军队。九月，苏军攻入德国境内。在亚洲，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的人民抗日武装，在斗争中日益壮大。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德黑兰举行会议，决定美英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但美英两国并未按时履行协议。当苏联红军将要最后打败德国法西斯时，美英两国才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开辟了第二战场。同时，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也开始对日本逐岛进行反攻。各国人民的斗争，使法西斯阵线迅速趋于崩溃瓦解。在三个法西斯国家中，意大利于一九四三年九月宣布投降，德国和日本的灭亡的命运，也已不可改变了。

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夕，国民党蒋介石又喜又怕。喜的是可以不费力气，乘机捞取胜利果实。怕的是法西斯国家垮台，人民势力增强，国民党反动独裁统治更加孤立了。为了消灭人民力量，维护反动统治，国民党顽固派一九四三年春起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三月，蒋介石抛出了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鼓吹法西斯主义，污蔑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封建割据”，叫嚣两年内要解决共产党，为新的反共高潮作了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六

月，蒋介石又借共产国际解散之机，指使托派汉奸张涤非，召集了九个人，开了十分钟的会，“通过”了一纸电文，叫嚷第三国际已经解散，中国共产党也应解散。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加紧进行反共军事部署。胡宗南指挥的西北三个集团军，原来已有两个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至六、七月间，又把担任河防的另一集团军的两个军调回，参加包围陕甘宁边区。这样，国民党布置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军队，就达到六十万人之多。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这一新的反共高潮，当即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斗争。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军民纷纷集会，发出呼吁团结、制止内战的通电。我党的报刊，连续发表了制止内战的文章。毛主席为《解放日报》写了题为《质问国民党》、《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等社论，历数了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罪行，警告国民党必须立即纠正这一错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有力揭发，蒋介石的反共活动遭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边区的军民一齐动员起来，加强防卫，作好了打退国民党进攻的充分准备。就这样，蒋介石被迫停止了对边区的军事进攻。

【国民党战场的继续溃退。解放区战场的局部反攻】

国民党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结果使它的军队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在日寇新的进攻下，继续大溃退。一九四四年初，日本为援救其在南洋的孤军，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三月，日本使用五、六万兵力进攻河南。国民党四十万驻军望风而逃，郑州、洛阳等三十八个城市相继陷落，损失兵员达二十万。五月，日军进攻湖南。湘北大批国民党军一触即溃。六月，长沙国民党军弃城而逃。八月，衡阳国民党军不战而降。接着，日军进攻广西。国民党军队也是不堪一

击，闻风溃逃，桂林、柳州、南宁相继失陷。十二月二日，日军打到贵州独山，震动贵阳和重庆。在豫湘桂战役中，日军使用的兵力总共不过二十万，而国民党近百万军队竟接连溃败，在不到九个月中，丢掉了四个省城和一百四十六个大小城市，放弃了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使六千万人民陷于日寇的铁蹄蹂躏之下。这一场大溃败，彻底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腐朽本质。

与国民党战场的溃败相反，从一九四四年开始，各解放区战场对日寇发动了局部反攻。在华北：晋察冀军民恢复了一九四〇年的局面，并将游击战推进到了东北地区。晋冀鲁豫军民收复了大片土地，又组织了豫西支队，建立了豫西解放区。晋绥军民将离石到岚县的公路截成数段，并使三、八分区连成一片。山东的滨海、鲁中、鲁南三区，也连成了一片。在华中：苏北、苏中区连成了一片。我新四军完全控制了淮北区洪泽湖北岸，并向豫东挺进，开辟了豫东解放区。新四军鄂豫皖部也派部队北上，开辟了豫南解放区。苏南的小块游击区已发展成大块根据地，控制了太湖西南地区。新四军浙东纵队，在一九四二年开辟了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解放区，到一九四四年又有了新的发展。自苏中南下的新四军主力一部，一九四五年初在苏浙皖交界处又开辟了苏浙根据地。在华南：东江纵队不断袭击广九铁路，逼近广州市郊。一九四五年春，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联合编制统称为华南抗日纵队。此外，党中央还从陕甘宁边区派出我军主力一部，于一九四四年底南下开辟了湘鄂赣根据地。总计，在一九四四年中，我军对敌作战两万多次，毙伤敌伪军二十二万多人，俘敌伪军六万多人，争取伪军反正近三万人，收复县城十六座，攻克据点五千多个，新解放了八万余平方公

里国土和一千二百多万人口。在一九四五年的春季攻势中，我军又进行了大小战役百次以上，攻克县城二十二座，收复国土八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五百多万。

经过一年多的局部反攻，我军人数有了很大的发展，作战能力大大提高。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的主力已经发展到九十一万人，民兵发展到二百二十万人。根据地除中央陕甘宁边区外，计有华北的晋察冀区、晋冀豫区、冀鲁豫区、冀热辽区、晋绥区、山东区，华中的苏北区、苏中区、苏南区、淮北区、淮南区、河南区、皖中区、浙江区、湘鄂赣区、鄂豫皖区，华南的广东区和琼崖区等，共十九个解放区，北起内蒙，南迄海南岛，东临大海，西至陕甘宁，面积共达九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九千九百五十万。至此，日寇所占领的全国大多数中心城市和交通线，都已处于人民军队的包围之中。

【两种中国之命运的斗争】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中国往何处去？战后将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还是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旧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就这样毫不含糊的摆在人们的面前，迫使你迅速地进行抉择。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反动集团坚持一党专政，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经济上，加紧掠夺人民，聚积了大量财富，加强了四大家族对金融、工业、商业和农业的独占地位，迅速发展了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结果，使农村破产，工厂倒闭，物价飞腾，亿万劳动人民挣扎在饥饿线上。在政治上，依靠庞大的特务组织，加强对人民的法西斯统治，人民没有任何自由民主的权利，连起码的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大批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惨遭迫害。在

军事上，大部分国民党军队被撤退到西南和西北地区，坐山观虎斗，保存实力，准备发动内战。全国人民对于蒋介石反动派在政治上的独裁、经济上的掠夺和军事上的惨败，无不愤怒异常。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战场惨败后，重庆、成都、昆明等地掀起了一个爱国民主运动，提出了反对专制主义、争取民主自由的口号，强烈要求改组国民党反动政府。

我们党及时领导了这一民主运动，向全国人民揭露了蒋介石破坏抗战、准备内战的种种罪行，指出了国民党一党专政乃是一切罪恶的总根源。一九四四年五月，党中央派林伯渠同志经西安到重庆，和国民党进行谈判。九月十五日，林伯渠同志代表我党在国民参政会上发出了召开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紧急国事会议，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我党的这一号召，把各阶层人民的民主要求集中到政权问题上来，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海外华侨，纷纷发表宣言，举行集会，响应我党的号召，一致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春，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要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民主运动，声势越来越大。五月，昆明两万学生大示威，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取消一切特务机关。但是，蒋介石顽固坚持一党专政，而以“召开国民大会”和“实行宪政”的空口诺言来搪塞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同时，反而要求人民军队“限期取消五分之四”，并取消抗日民主政权。这就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丝毫没有进行民主改革的诚意。

中国内部的民主和反民主的斗争，是同国际上反法西斯阵线内部的民主和反民主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在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中，人民革命力量发展壮大。但是，美帝国主义

则到处扶植反民主势力，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在中国，美帝竭力扶植蒋介石反动派，打击中国民主势力，妄图取日本而代之，使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一九四二年后，美帝在“援华”抗日的名义下，给了国民党大量的贷款和物资^①，大批美国“专家”渗入国民党政府的各部门，大批美国军官帮助国民党训练军队和特务。美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就是要逐步控制国民党政府，使蒋介石养精蓄锐，预备在战后全力对付共产党。

到了一九四四年下半年，美帝国主义更走上了公开扶蒋反共的道路。九月，美国政府派遣反动政客赫尔利为特使来到中国。十月，指令赫尔利担任驻中国大使。赫尔利来华的目的，就是帮助国民党“统一军事”，支持蒋介石的“领袖地位”，防止国民党政府的崩溃。十一月七日，他以罗斯福私人代表的资格到延安，与我党进行谈判，表示赞同我党提出的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计划。但一回到重庆，马上背叛了自己在延安的诺言。接着，又指使蒋介石玩弄花招，妄图组织一个有美国代表和国共代表参加的所谓三人委员会，来整编人民军队，然后由国民党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让共产党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这个阴谋，受到我党的坚决反对与揭露，很快地宣告了破产。于是，赫尔利就撕下了伪装。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他公开宣布美国“只与蒋介石合作，不与共产党合作”，要帮助蒋介石用武力“统一”中国。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也训令在美国的军官，“不要帮助那些不属重庆政府的个人或团体”。美帝国主义还继续以大量的军用物资，帮助蒋介石装备了二十个美式机械化师。

毛主席当时深刻指出：“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

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有了美帝国主义的撑腰，蒋介石的反动气焰更为嚣张。一九四五年五月，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坚持一党独裁，抵制联合政府，准备发动内战，窃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反动路线。会议闭幕后两天，就发生了国民党军进犯苏浙新四军的严重事件。七月，又发生了国民党调动九个师进犯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反共事件。

就这样，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新的斗争已经开始。“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两个中国之命运》）两个中国之前途，两种中国之命运的斗争，成了当时中国时局发展的关键。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和主持下，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胜利召开。到会正式代表五百四十七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代表一百二十一万党员。毛主席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以及《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和《愚公移山》的闭幕词。

毛主席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我们党二十多年斗争的经验，特别是抗日战争的斗争经验，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两个中国之命运》）这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路线，也是抗战胜利后继续革命，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的总路线。

这条路线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了明确的奋斗目标。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必须“废止国民党一党专

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论联合政府》）这个政府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这是对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彻底的否定，是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根本方向。

这条路线明确规定，实现革命目标的关键，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论联合政府》）放手发动群众，主要是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并在此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壮大人民力量，重点是发展和壮大人民军队与巩固革命根据地。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头等重要的任务。

为了实现这条路线，毛主席完整地总结了党的建设的经验，深刻地论述了党的三大作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论联合政府》）我党的斗争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只有这样，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要使普遍真理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就必须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向人民群众学习，就必须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毛主席深刻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的领导责任：“**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

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论联合政府》）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新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我们党二十四年斗争经验的结晶，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大会根据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经过充分协商，选举产生了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毛主席的领导，是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的根本保证。

党的“七大”，是“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愚公移山》）在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指引下，“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种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是建立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的团结，是不可战胜的。全党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加上团结一致的奋斗，必能夺取抗日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党的“七大”路线的指引下，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向日寇发起了新的进攻。从一九四五年五月至七月，我军在各个战场上纷纷出击，收复了大片国土，扩大了解放区，消灭了敌人大批有生力量，发展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这时，我军已经成为能够组织集中行动的大兵团了。这种大兵团摆脱了原来的游击性，可以离开分散作战的地区，到一定的攻击目标上去作战，具备了对日军进行战略大反攻的作战能力。

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苏军攻克了柏林，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八月八日，苏

联对日宣战，接着出兵我国东北，进攻日本的“关东军”。十日，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宣布对日宣战。

八月九日，毛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重要文告，宣布“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从此，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八月十日，延安总部发布了大反攻命令，要求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立即向敌人发出通牒，限期缴械投降，如遇顽抗，“即应予坚决消灭”。八月十一日，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出六道命令，要求八路军晋察冀、冀热辽、晋绥、山东解放区的部队，向绥远、察哈尔、热河、内蒙古及东北三省进军，其他各军区部队向本区所辖范围之敌展开猛烈大反攻，占领交通要道及城镇。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各敌后解放区立即开展大反攻，向敌占城镇和交通要道发起猛烈攻击。

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正式签署了投降书。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八年抗战中，我军英勇作战十二万五千余次，消灭敌伪军一百七十多万人。人民军队从抗战开始时的四万多人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人。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十九个抗日根据地，人口达一亿多。人民革命力量的猛烈发展，为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战

胜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战争，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亿万人民群众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人民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在人类历史上再一次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取得独立和解放。

本 章 小 结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中国人民进行了八年英勇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伟大领袖毛主席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制定了战胜日寇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全党遵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动员、组织和武装了广大人民，扩大和巩固了人民军队，实行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自力更生地坚持民族革命战争，战胜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力量，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的三个阶段。一九三七至一九四〇年，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使人民力量迅速壮大。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根据地一度缩小。但由于毛主席、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解放区军民渡过了严重的困难。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五年，抗日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一九四四年转入了局部反攻，一九四五年夏取得了对日作战的最后胜利。

我党在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战胜王明的错误路线的结果。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将抗日

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决地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坚决地扩大了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这样，就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对王明路线的大批判中，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进一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更加完整地制订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毛主席所揭示的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被全党所认识，出现了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在这个基础上，以“七大”为标志，实现了全党的大团结。这个伟大进步，为夺取全国政权作了最重要的准备。

【注 释】

- ① 《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第五十二页
- ② 《“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第一六六页
- ③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页
- ④ 王明：《挽救时局的关键》
- ⑤ 王明：《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之理论与实践》
- ⑥ 王明：《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
- ⑦ 周佛海：《回忆与前瞻》，《时代文选》第五十六期

- ⑧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 ⑨ 王明，《苏联社会革命二十周年与中国人民的对日抗战》
- ⑩ 王明，《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之理论与实际》
- ⑪ 《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是汪精卫和日本签订的卖国密约。其主要内容有：一、东北割让给日本，把蒙疆（指当时的绥远、察哈尔两省和山西北部）、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岛屿，定为“日支强度结合地带”，由日军长期占领。二、汪伪政权自中央政府至地方政府，都由日本顾问或职员监督。三、伪军和伪警察，由日籍教官训练，武器亦由日本供给。四、伪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工业、农业和交通事业，都由日本控制；一切资源，由日本任意开发。五、禁止一切抗日活动。
- ⑫ 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美国给蒋介石政府的借贷款为一亿七千万美元，而一九四二年美国给蒋介石政府的“援华借款”一次就达五亿美元，此外还有所谓“租借物资”八亿七千万美元。

第四章 人民解放战争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

第一节 党为反对美蒋反动派篡夺抗战胜利果实而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发表

【美蒋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矛盾上升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全世界出现了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革命的高潮。不仅原来在德、意、日法西斯统治下的国家和地区的革命人民已经起来为独立和民主而斗争，就连在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统治和剥削下的人民群众也纷纷起来为争取解放而斗争。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开始全面地动摇了，全世界人民的革命力量空前地壮大了。时局正象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如果说，十月革命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那末，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但是，帝国主义并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在战前的六

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中，德、意、日三国已经垮台，英、法两国也已在战争中被大大削弱，而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却因为战争中做军火生意而发了横财，变成了一个霸王。尽管它外强中干，却自以为独占全球的大好时机已经到来。为了篡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果实，它到处扶植反动势力，摧毁各国的民主运动，妄图全面恢复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建立金元帝国的全球统治，把二十世纪变成“美国世纪”。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包括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都聚集在美帝国主义的周围，依靠它的支持，以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因此，凡是美帝国主义的魔掌伸到的地方，那里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果实落在什么人手里，就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民主和反民主，革命和反革命，在世界各地进行着尖锐的斗争。

作为美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它在亚洲的侵略计划的中心，就是通过扶植蒋介石反动派来镇压中国革命人民，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当日本帝国主义刚一发出投降的请求，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就立刻提出“建议”，要求日本把在中国的全部武器都交给蒋介石政府，如果交给了“反抗国民政府的作战部队”，就要受到“惩罚”^①。这就是说，美帝国主义决定取代日本帝国主义的位置，直接干涉中国的内政，支持它的走狗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独占抗战胜利的果实，加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

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长期躲在西南后方坐待胜利的蒋介石，决心按照“既定军事计划”，从峨嵋山上猛扑下来，妄图从人民手中抢走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蒋介石按照赫尔利的意旨，发出了两道命令：一道给解放区的人民军队，要求“就原地驻防待命”，不

许进攻日寇，不许接受日伪军投降和向敌人收缴枪械，一道给国民党的军队，要求“加紧作战努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两道完全相反的“命令”，彻底暴露了蒋介石垄断接受日本投降的权利，积极准备反革命内战的阴谋。

但是，当时蒋介石的主力部队远在西南、西北的边远地区，尽管美国主子用全力代运，还是来不及调到敌占区去。美帝国主义眼见如果这时日军全部放下武器，“那末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于是，它决定“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由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联合决定，经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杜鲁门恬不知耻地说，这“就是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②同时，蒋介石也于八月十一日在给汉奸武装的“命令”中，把同敌伪合流的“军统”、“中统”特务和推行“曲线救国”的伪军，统统叫做“地下军”，要他们和日军一起，“负责维持地方治安”，防止解放区人民军队“擅自行动”。南京傀儡政权的头目周佛海等，立即执行了这个“维持秩序”的任务，指挥伪军继续与人民为敌。从此，蒋军和伪军迅速合流，由国民党收编的伪军达五十余万人之多。

总之，在日本帝国主义倒台之后，美帝国主义已把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收罗在它的卵翼之下，蒋介石也消除了他与国民党亲日派的某些分歧，使自己回到了原来的反革命“总头子”的位置上去，力图恢复他“统一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这就表明，随着日本的投降，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阶段已经过去，而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已经变成主要矛盾了。毛主席在党的“七大”的开幕词中就曾英明地指出：“即使把日本帝国

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当时，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已经尖锐地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发表】

为了指导全党迎接这一场斗争，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重要报告。报告分析了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方针和策略，使党能有清醒的头脑来对待复杂的局势，针锋相对地开展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

毛主席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当时的形势，深刻地指出：“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蒋介石这个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政治代表，反革命的本性决不会改变。此人历来是不知感恩的。他靠第一次国共合作上了台，立即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在抗日战争的八年中，他躲在峨嵋山上，消极抗战，积极反共，阴谋借敌伪军之手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此计不成，又决定在抗战胜利之日，下山发动内战，抢夺胜利果实。毛主席告诫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蒋介石想重演一次“四·一二”政变，发动反共内战，来消灭共产党。他口中的一切“建国”、“和平”之类好听的鬼话，都不过是用来掩盖这个阴谋的。

毛主席又强调指出：“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

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美帝国主义早已把独占中国看成是称霸亚洲的中心一环，当作它的世界侵略计划的重要部分。它虽惯于玩弄伪善和恐吓的反革命两手，但它霸占中国的目标是不会改变的。它必然要反对中国人民，必然要支持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的果实。

毛主席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分析，指明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变化。“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这种复杂的斗争，贯串在人民解放战争的整个历史时期。

根据这种形势和任务，毛主席为全党规定了彻底革命的方针：“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对于美蒋反动派，必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决不能被温情脉脉的“和平经”所欺骗，也决不能被其势汹汹的战争威胁所吓倒。人民经过浴血奋战所夺得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就是这个历史时期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精髓。

毛主席预见到这一场尖锐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及时地向全党指出：“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毛主席还一再提醒全党，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不

要象陈独秀那样，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

为了夺取革命的胜利，毛主席还强调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这是毛主席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一贯思想。当时，各国反动派叫嚷“美苏必战”，同美帝国主义一起，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来威胁人民，要各国人民放弃革命斗争。有些人也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被这种反苏战争的叫嚣所吓倒，不敢和美帝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要坚持革命斗争，就更加需要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强调自力更生，就既能坚持国内的革命斗争，保卫和发展人民的利益，又能支持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斗争，担负起国际主义的义务。因此，自力更生的方针，同时也是国际主义的方针。

根据当时的形势，毛主席教导全党要做好两手准备，以便能够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内战是必然的，这是不以人民的愿望为转移的。但是，全面内战爆发的早迟，却要依形势的发展而定。蒋介石要立刻发动全面内战，在当时也还有许多困难。“新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过渡阶段的斗争，就是反对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在这个阶段中，既要准备对付全国性内战的迅速爆发，又要看到有可能把内战暂时限制在局部的范围内。

【反对美蒋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向美蒋反动派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八月十三日，毛主席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

写了一个电报，坚决地拒绝了他八月十一日的伪令，严正地指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同时，毛主席又为新华社写了《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评论，向全国人民揭露了蒋介石的阴谋，指出中国解放区的抗日军队，在国民党政府毫无接济又不承认的条件下，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和人民的拥护，独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和一亿以上的人民。没有这支抗日军队，就根本不会有抗战的胜利。所以，“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抗日军队才有接受敌伪军投降的权利。至于蒋介石，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坐待胜利，实在没有丝毫权利接受敌伪投降。”评论呼吁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致起来，坚决制止美蒋反动派挑起的中国内战。

当时，党和人民面临的形势是十分复杂的。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同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妄图利用这个形势，迫使人民向他投降。一面，在十四日假惺惺地来电邀请毛主席到重庆去举行“和平谈判”，一面，又在十五日指使他的发言人在重庆大肆进行反共宣传，胡说什么拒绝蒋介石十一日的伪令就是“人民的公敌”，为发动大规模内战制造反革命舆论。针对敌人的阴谋，毛主席在十六日为新华社写了《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的评论，指出所谓“人民公敌”，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自己。蒋介石的反动叫嚣表明，他已经向人民宣布了内战。评论号召全国人民，“坚决迅速努力壮大人民的民主力量，由人民解放敌占大城市和解除敌伪武装，如有独夫民贼敢于进犯人民，则取自卫立场，给以坚决的反击，使内战挑拨者无所逞其伎。”

八月十六日，毛主席又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再次致电蒋介石，揭露蒋介石发布伪令的目的，就是要国民党军队以收缴日寇枪械为借口，大举向解放区压迫，挑动内战。电报提出了按作战地区分别受降、制止内战、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政治主张，宣布蒋介石的独裁政府不能代表解放区和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和人民武装，解放区和沦陷区的抗日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公告接受被包围的日伪军的投降，并且声明我已下令日军统帅冈村宁茨，命令他率部投降。电报庄严宣告：人民军队将“坚决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收复之时为止。”这样，就坚决顶住了蒋介石利用国际压力迫我屈服的企图。这个电报的基本内容，在十五日也已照会美、英、苏三国驻华使节转致各国政府，严正地表明了中国人民的立场，以唤起正在反对新战争威胁的世界人民的注意，并警告美帝，不得援助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

在这期间，我军在毛主席的直接指挥下，置蒋介石的伪令于不顾，在华北、华中、华南各地向日伪军发起了大反攻。自八月十一日到二十六日的两周间，收复了大小城市五十九座，包括威海卫、烟台、龙口、益都、淄川、杨柳青、毕克齐、博爱、张家口、集宁、丰镇等重要城市、港口、矿区和广大乡村，连同以前收复的地区，我方已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个，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同时，我军并开始由长城一线（以后又加上山东），分路进入东北，与我党领导下的坚持游击战争十四年的东北抗日联军会合，收复了东北地区的广大国土，为在东北建立牢固的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党以革命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的斗争的巨大胜利。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投降主义路线的破产

【重庆谈判的胜利。《关于重庆谈判》的发表】 美蒋反动派为了争取准备内战的时间，进一步玩弄反革命的两面策略。八月二十日和二十三日，蒋介石两次来电邀请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如果不去谈，他就可以借口共产党拒绝谈判，蒙蔽全国人民，把内战责任推到我们党的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去谈，才能拆穿敌人的阴谋，有利于教育全国人民认清蒋介石的反动本质。我们党清醒地看到，全面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必须准备打，但我们“不为天下先”，而只能“后发制人”。只有使人民群众充分认识美蒋反动派的本性，认识内战的不可避免性，才能更好地动员广大人民起来和它们作斗争，战而胜之。因此，我们党去进行和平谈判，就是要通过这场斗争，揭穿敌人“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使人民群众觉悟起来，准备迎接更大的斗争。

蒋介石玩弄和平谈判的阴谋，既是假的，又是迫不得已的。他要马上发动全面内战，还有着许多困难。他的军队大多数远离解放区战场，要调动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足够兵力，还需要一段时间。特别是解放区军民力量的强大和蒋管区人民反对内战运动的开展，都使他不能不有所顾忌。在这种形

势下，通过谈判，使内战暂时限制在局部范围内，推迟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是可能的，它对于我们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加强备战，是有好处的。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揭露了美蒋反动派挑动内战，破坏团结，反对民主的阴谋，提出了避免内战，实行民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六项主张，表示愿与各方共同努力，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八月二十六日，新华社正式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率领有周恩来同志等组成的代表团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为了使全党对于新的斗争有充分的准备，同日，毛主席写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全面地分析了军事上的大好形势，说明了和平谈判的可能条件和我党准备作出的必要让步，并为粉碎蒋军可能发动的攻势作了战斗部署。毛主席告诫全党，“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要准备反击敌人的新进攻。“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敢战方能言和，谈和更需备战。这样，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

八月二十七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乘飞机来延安迎接毛主席。二十八日，毛主席不惧艰危，深入虎穴，大无畏地走上和美蒋反动派进行谈判斗争的战场，在万众欢腾声中到了重庆。这个行动，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破了美蒋反动派污蔑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使全国人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美帝国主义者事后承认，这是“出乎意料”的。

蒋介石做了半个月和谈姿态，但由于他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被毛主席的行动打乱了步骤，弄得忙乱不堪，对进行谈判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毛主席到重庆的第二天，立即向国民党代表指出，从抗战以来，内战没有断过，说没有内战，那是欺骗。但是，中国共产党曾经一再表示愿意进行谈判，反对打内战。在重庆谈判中，我们党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使蒋介石不敢反对，只好赞成以此为基础进行谈判。

重庆谈判是和军事斗争紧密地联系着的。蒋介石的反革命两手，从来是以打的一手为主的。他在第三次电邀我党进行谈判的同一天，就指使何应钦命令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原地“负责作有效的防卫”，继续向我人民军队作战，甚至还要日军去“收复”被我解放了的地区。毛主席到重庆的次日，蒋介石又指使何应钦密令各战区印发他在一九三三年编印的《剿匪手本》，并继续向内战前线调运军队。妄想用军事压力迫我接受投降的条件。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阶段中，形成了又打又谈的局面。

正在和谈进行过程中，八月间，国民党军傅作义部奉命进攻绥远、热河、察哈尔三省解放区。九月初，大举向察哈尔解放区进犯，迫近张家口。九月十日，被我军击退，大批官兵被俘。九月初，山西军阀阎锡山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在日伪军配合下，侵入晋冀鲁豫解放区上党地区。阎部抢占长治后，即被我军包围。战斗进行到十月初，蒋、阎增调部队从太原榆次向长治一带压过来，企图消灭上党地区的人民武装。这时，重庆谈判已进行了一个月，并就初步方案达成了协议，但蒋介石自以为军事上得计，趾高气扬，拒绝签字。我军神速调动，首先消灭了北路南侵之敌，接着又回师围歼

了由长治西窜突围之敌。这一仗，敌军总计出动十三个师，三万八千人，被歼三万五千人，军师长多名被俘，上党地区的中心城市长治被我解放。正象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关于重庆谈判》）战场上的胜利，迫使蒋介石收敛了他的凶焰。十月十日，只得在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上签字。这就是“双十协定”。

在“双十协定”中，国民党方面被迫接受避免内战、实行政治民主化、结束国民党“一党训政”等项原则，并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是，关于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合法地位等问题，由于蒋介石坚持顽固的态度，结果没有达成协议。

十月十一日，毛主席胜利地回到了延安。十七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重要报告，及时地总结了这次谈判斗争的意义和经验。这次谈判所取得的收获，是和蒋介石的内战方针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结果。毛主席指出：“‘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在一定的形势下，谈判是需要的，盲目地拒绝谈是“左”倾幼稚病，但是，谈判和军事上的斗争一样，必须是针锋相对的。进行谈判并不是幻想依靠谈判来解决问题，写在纸上的东西并不就是现实的东西。我们欢迎这个协定，是因为这样一来，蒋介石如果再要发动内战，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来粉碎他的进攻。

在这次谈判中，我党作了必要的让步，主动撤出了位于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不包括豫北）等八个根据地。这种让步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

它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有利于争取群众，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同时可以在内战到来后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但是，对于蒋介石在谈判中继续玩弄的“你交出军队，我给你做官”的阴谋，是决不能让步的。“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关于重庆谈判》）

“双十协定”宣布了和平的方针，但是，就在十月份中，国民党用于进攻解放区的正规军已达八十万，还不包括包围陕甘宁解放区的部队。针对这种形势，毛主席规定我们党的斗争任务是，坚持双十协定，继续争取和平，但如果敌军敢于进犯，就坚决消灭它。“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毛主席明确地指出：“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局势还会是动荡不定的。我们要加倍地努力，争取局势的发展有利于全国人民。”

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是革命发展的总趋势，总规律。人民革命一定要胜利，这是任何反动派也不能阻挡的。但是，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只有坚持斗争，克服困难，才能达到胜利。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战胜各种机会主义的锐利武器。它指引着革命的航船，沿着曲折的道路胜利前进。

【围绕着政治协商会议的斗争】 “双十协定”签订后，中国共产党按照协议，将江南部队撤往江北，向全国人民表明了自己的诚意。但是，美蒋反动派对解放区的进攻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早在九月三十日，美国海军陆战队便在塘

沽登陆，进驻天津、北平。十月十日，又在青岛等地登陆。美海军航空队也相继侵入北平和青岛。同时，美国加紧用飞机、军舰把蒋介石的六个军运往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青岛、济南等地，抢占大城市，扩大对解放区的进攻。十一月八日，美国驻华军总司令魏德迈公然威胁说，华北美军“可能向共产党军队前进”。在美帝的支持下，十月十三日，“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即对其部下发出了“剿匪”密令，要他们“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从那时起，北至察绥战场，南到黄河北岸，对华北解放区的进攻一直在继续着。十一月十一日，美国军舰三十一艘帮助国民党远从越南运送杜聿明部两个军在秦皇岛登陆完毕，随即开始了向东北解放区的进攻。在这期间，蒋军还在广东用七个师进攻我华南纵队。在河南和湖北，动员了国民党三个战区所属的二十几个师的兵力，四面包围和侵入我豫西、豫中、鄂东、鄂中、鄂南各解放区。在浙东、苏南、皖中、皖南、湖南等地，也分别截击我北撤的军队。十月十七日，我军总部宣布，自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已侵占我解放区城市三十一座。十一月七日，毛主席在给党内的指示中指出：“国民党在美国援助下，动员一切力量进攻我解放区。全国规模的内战已经存在。”（《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号召全党动员一切力量，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

对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我军给予了坚决的回击。九月中旬已在豫北发起进攻的国民党军队，十月中旬在郑州、新乡一带集结了二十多万人，疯狂进犯我晋冀鲁豫解放区。十月下旬，先头的三个军侵入河北南部的邯郸地区。我军奋起自卫，激战一周，结果，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

八军军长高树勋及其所部一万多人，接受我军劝告举行起义，第三十、四十两个军也在溃逃中被围歼，放下了武器。总计，这次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七万余人。

十一月五日，毛主席以中共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揭穿了国民党进攻的真相，发出了“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的战斗号召。（《国民党进攻的真象》）在我党的推动下，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反内战斗争逐渐发展起来。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制止内战，实行民主。十一月十九日，重庆各界人民成立了反内战联合会。二十五日，昆明学生六千余人举行反内战集会，遭到国民党军警的破坏。接着，全市三万余学生一致罢课。十二月一日，国民党军队和武装特务在昆明实行镇压，打死爱国学生三人和教员一人，打伤多人，酿成了“一二·一惨案”。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进一步激起了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

当时，国际形势也不利于美蒋反动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遭到了各国人民的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支持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也遭到世界人民的谴责。为了摆脱困境，美国政府进一步玩弄新的政治花招。十一月二十七日，赫尔利宣布辞职。美国总统杜鲁门随即任命马歇尔为美国总统驻华特使，打着“调停中国内战”的幌子，欺骗国际国内的舆论，掩护战争的准备工作，并试图用软化的方法消灭中国革命力量。十二月七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伪善地表示要促进中国的团结和民主，鼓吹蒋介石的政府“在发展民主政治方面提供了最令人满意的基础”。十二月十五日，杜鲁门发表了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一方面重复说些赞成中国团结和民主的空话，一方

面宣布只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这个声明表面上主张改变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制度，实际上妄想共产党交出军队，放弃政权。十二月二十日，马歇尔来到中国，开始演出他的“调处国共两党争端的文明戏，企图软化中国共产党和欺骗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别了，司徒雷登》）

在马歇尔的导演下，蒋介石宣布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争取部署全面内战的时间。对于美蒋反动派的这一阴谋，我党早已洞悉。十二月十五日，毛主席在党内指示《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就及时向全党指出：“站在自卫立场上，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仍是各解放区的中心任务。”但是，为了充分地揭露敌人，教育人民群众，争取和团结中间派，最大限度地孤立美蒋反动派，我们党仍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就停止内战，实现民主团结等问题同国民党继续进行谈判。

十六日，我党派出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代表团，由延安飞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我党代表团明确表示，停止国民党向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先决条件，并向会议提出了立即无条件停战的建议。经过二十多天的谈判，同国民党政府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简称停战协定）。一月十日，由双方分别发布停战令，规定十三日开始生效。停战协定和停战令规定，国内的军事冲突和军事调动，一律停止。还决定由国共双方各派出一名代表同马歇尔一起组成三人小组，会商解决军事冲突问题的办法，并在北平设立由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执行停战协定。

一月十三日十二时起，我军忠实地执行了停战令。但是，蒋介石却毫无停止内战的诚意。在停战令发布的前三天即一

月七日，他就下达密令：“政治协商会议日内开会，我军应于停战令未下前占领有利地点。已下令前进至某地而尚未到达者，应催促其星夜前进。”一月十三日停战令生效后，蒋介石又不断破坏停战协定，继续向解放区进攻。美国则继续帮助蒋介石运输军队到东北地区，向东北解放区扩大进攻。军事调处执行部及其派赴各地的执行小组中的美方代表，更千方百计地庇护蒋介石破坏停战令的罪行。“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变为美国的殖民地。”（《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

在发布停战令的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重庆开幕。参加会议的有左、中、右三种政治力量，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七人，国民党代表八人，民主同盟^①（其中包括后来参加了蒋政权的民主社会党^②）代表九人，中国青年党^③代表五人，无党派人士九人（主要由国民党推荐，大多数是反动分子），进步力量只占少数。

会议的中心是军队和政权问题。蒋介石提出了所谓必先实行军队国家化，而后才能实行国家民主化的反动主张。中间派的代表有的对蒋介石关于民主化的许诺抱着幻想，有的则妄想国共双方共同交出军队而由他们代表“国家”加以接受。我们党坚决揭露了蒋介石的反动主张的实质，指出这一阴谋的目的是要消灭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要实行军队国家化必先实行国家民主化的主张，要求首先必须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为人民民主国家。同时，对于中间派的错误主张和幻想，也进行了批评和教育。我们党经过坚决的斗争，团结了中间势力，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孤立了蒋介石反动派。在人民的压

力和内战部署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国民党被迫在表面上接受了一些人民的要求。会议达成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和平建国纲领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宪法草案问题、军事问题等五项协议。一月三十一日，会议宣告闭幕。

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这些协议，在不同的程度上是有利于人民，而不利反动派的。然而，不同的政治力量对于这些协议抱着完全不同的态度。美蒋反动派企图利用这些决议作为发动内战的掩护，欺骗我们党交出手中武器，“统一”到国民党的政府中去“做官”。资产阶级中间派则一方面反对内战，主张民主；一方面幻想在美国的帮助下同蒋介石一起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我们党和革命人民则以这些协议作为武器，进一步发动人民群众开展反对内战、反对法西斯独裁的斗争。事实表明，政协的协议从达成的时候开始，就是不可能真正得到实现的。它只不过是新的斗争的开始。

【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投降主义路线的破产】

美蒋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生死斗争，必然要在党内反映出来。隐藏在党内的大叛徒刘少奇，充当了美蒋反动派的代言人。早在八月二十八日，当毛主席动身去重庆时，刘少奇就向出发去东北工作的干部做了一个报告，对重庆谈判提出了一系列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点。他在估计世界形势时，胡说：“全世界的和平建设阶段来了，不打仗了”，“全世界是个和平民主团结的世界”；在分析国内形势时，又说什么：“在全世界和平民主进步的潮流下，中国要单独打内战是很困难的”，“这次蒋介石是真正要商量几个问题”的。根据这种错误的估计，刘少奇提出了“我们为和平而斗争”的机会主义口号。

在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的后一天，刘少奇又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作了一个所谓《时局问题的报告》，公然散布对蒋介石的幻想，主张放弃斗争，抛出了“中国已经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刘少奇鼓吹这种“新阶段”的特点，是“三个国家、三个政党、三种人民合作起来要使中国走上民主化”。所谓三个国家即指美、英、苏三国，三个政党即指国民党、共产党和中间党派，三种人民即指劳动人民、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刘少奇认为马歇尔是“执行三外长会议决议的代表”，是代表着三国对中国“实行干涉”的，“内战是他停止的”。这种“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实质，就是要中国完全屈服于美帝的干涉，要共产党投降国民党，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屈服于大资产阶级。刘少奇还宣称：“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要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形式。”他认为，实行政协决议，共产党就要把军队交出去，编成“正式国军，成为国防军，成为地方保安队，成为自卫军。”一句话，就是要我们党把军队和革命根据地交给蒋介石，到国民党反动政府去“做官”，同美蒋反动派“合作建国”。为了实现这种改变，刘少奇要求在党内开展反对所谓“左的关门主义”的斗争，采用适应“新的斗争形式”的“新的组织形式”，“党的全部工作要实行改组”。刘少奇的这条路线，是陈独秀、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实质上是要按照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党的面目改造党，根本改变党的性质。

刘少奇投降主义路线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在国际上，它是美共叛徒白劳德修正主义路线在中国的呼应。它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一样，也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

白劳德修正主义产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九四三

年十一月间，中、英、美三国举行了开罗会议，接着苏、美、英三国举行了德黑兰会议，在反对法西斯的联合作战问题上达成了一些协议。修正主义思潮乘这个时机就泛滥起来了。当时担任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的白劳德，抛出了一系列修正主义文章，并在一九四四年四月編集出版了《德黑兰》一书。在国际问题上，他鼓吹“在战后世界中，英、苏、美将继续合作，一个自由的、爱好和平民主的世界各国大家庭将要建立起来。”在国内问题上，他宣扬美国垄断资本还“保持着青年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特点”，幻想经过阶级调和来避免美国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危机。按照这种反动纲领，白劳德在一九四四年五月解散了美国共产党，另行组织了非党的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白劳德的投降主义路线，“本质上是反映了美国反动资本集团在美国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它出现不久，就遭到了美国广大共产党员的批判。一九四五年七月，福斯特同志领导重建了美国共产党。但是，战后这种机会主义思潮的流毒仍然没有肃清，在有些国家的共产党里出现了一股“缴枪”、“做官”的逆流。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由于修正主义头目多列士和陶里亚蒂的出卖，为了换得一个副总理和几个部长的官衔，断送了几十万人武装力量，使法、意两国人民反法西斯武装斗争的胜利果实统统化为乌有。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正是要在中国走多列士、陶里亚蒂之流所走的道路。

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投降主义路线的出现，还和当时国际上一种对形势的悲观估计有关。这种悲观估计错误地认为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因而要求世界人民放弃革命武装斗争。一九四六年四月，毛主席在《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中，针对这种观点深

刻地指出，英、美、法同苏联之间或早或迟必将在若干问题上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但是，“美、英、法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

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主席关于反动势力的本性的英明论断。政协的协议一经签订，蒋介石就立刻加以破坏。二月十日，重庆人民在校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乘机捣乱会场，殴打民主人士和到会群众，制造了血腥的校场口事件。随后，在重庆、北平等地，又陆续发生了国民党特务策动的反共暴行。三月一日，国民党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公然鼓吹要“妥筹补救”亦即修改政协所通过的各项决议，他的爪牙也跟着叫嚷“不能将统治权交给多党政府”。美帝国主义则继续全力支持蒋介石的内战准备工作。三月十九日，早经杜鲁门原则批准，并已在马歇尔和魏德迈的主持下“暗中组织”起来的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正式成立，积极装备、训练国民党军队，策划和指挥他们向解放区进攻。六月十四日，美国国务院提出并由国会通过了《军事援华法案》，接着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美处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继续用军事物资武装蒋军。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到一九四六年六月，仅在“租借法案”等项目下提供的军事物资，就达总值十三亿三千万美

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英勇地顶住了国内外的逆流，坚决不缴枪，不“做官”，坚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引导中国革命朝着胜利的道路奋勇前进。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投降主义路线虽然在局部地区有些影响，但终究不过是革命洪流中一个小小的旋涡，刚一出现，就被革命的主流冲得粉碎。

【减租、生产和练兵运动的开展。解放区的巩固和发展】 我们党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的同时，一直没有放松保卫解放区的准备工作。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和十二月，毛主席为党中央起草了《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等指示，为发展解放区和加强人民军队规定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当时，经过半年肃清敌伪的工作，解放区已经大大扩大了。到一九四六年一月，解放区的面积已达二百三十九万一千方公里（约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计有城市五百零六座（约占全国城市的三分之一），人口一亿四千九百万（约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但是，新解放区的封建势力还没有受到严重打击，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整个解放区的经济也是比较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办好了，才能克服困难，援助战争，取得胜利。”（《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从一九四五年底开始的冬春两季中，各解放区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在老解放区，发动群众查租查息，切实保护农民应得的利益，提高了群众保卫解放区的觉悟。在广大的新解放区，首先进行反奸、清算等政治斗争，打击敌伪势力，建立革命政权和群众组织，然后发动大规模的减租减息斗争，减轻对农民的封建主义的剥削

和压迫，使广大新区群众迅速提高了觉悟。

到一九四六年四、五月间，随着减租减息斗争的深入，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实行土地改革，山西、河北、山东、华中等地解放区的农民已直接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为了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党中央对党内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把减租减息的政策逐步转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从此，解放区的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逐步开展起来了。农村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把广大的农民群众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使党获得了无穷无尽的革命力量，造成了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除了巩固原有的十多个解放区以外，毛主席、党中央这时特别强调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工作，从陕甘宁解放区以及华北等地派出大批干部和军队进入东北，同东北抗日联军汇合，组成了一支拥有三十余万人的东北民主联军。当时，国民党在东北尚没有一支正规部队。但蒋介石派出一批“接收大员”，星夜赶赴东北，收编土匪武装，在解放区后方进行骚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蒋军在秦皇岛登陆后立即向东北进攻，十六日占领已渡我军解放的山海关，二十五日侵入锦州和冀热辽解放区。从此，东北成为一个重要的内战战场。停战协定签字时，蒋介石坚持东北不在停止军事冲突的范围之内，并且增派军队扩大对我解放区的进犯，形成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就根据全国的总形势，定下了争取和控制东北的战略方针。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主席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指示，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

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国民党在东北没有深厚的有组织的基础，它的进攻是可以粉碎的。”

“在西满和热河，坚决地有计划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在东满和北满，则是迅速准备粉碎国民党进攻的条件。”毛主席并且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进行了尖锐批评，指出：“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

但是，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却伙同彭真追随刘少奇在东北推行“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散布和平幻想和失败主义情绪，鼓吹要“使东北与全国一起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对抗和破坏毛主席关于争取和控制东北的战略方针。当蒋军初进东北时，还只有两个军，力量并不强。党中央要求乘敌立足未稳，集中兵力，予以大量歼灭。但是，他却把东北的革命形势看成一团漆黑，把我在东北的部队说成是根本不能打仗的军队，一再拒不执行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命令，消极避战，致使敌军轻易地占领了锦州。从此，国民党在东北逐渐增加兵力，向我发起大规模的进攻。一九四六年一月占领辽西一带，三月占领沈阳周围地区，四月开始进攻四平街。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依然能给敌军以有力的打击。毛主席多次发出指示，要集中力量打好一两个胜仗。但是，林彪害怕同敌军作战，被气势汹汹、外强中干的敌人所吓倒，仍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在四平街打了一个多月拼消耗的守城战后，于五月二十一日撤出四平，接着又轻易放弃了公主岭和长春，向松花江以北逃跑，致使蒋军得以深入我东北解放区，占领了北起松花江南岸，南至营口、安东的铁路沿线地带。他甚至还提出“放弃哈尔滨”，准备“打游击”的荒谬主张。最后在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多次严肃批

评下，一再强调必须坚守哈尔滨，保持松花江以北地区，才刹住了他的退却逃跑，稳定了东北的军事形势。在以后的时期中，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得到了贯彻，东北的局势便进一步发生了有利于我的变化。

在巩固与发展根据地的同时，党还积极进行了军事上的准备工作。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利用作战间隙，“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并大力改进部队的政治工作，使之能够更好地“为团结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友军，瓦解敌军，保证练兵、供给和作战任务的完成而奋斗”。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和军力的发展，毛主席又及时提出了“应尽一切可能建立和扩充各地的炮兵和工兵”（《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的任务。

这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也在深入发展。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谈判代表团，于五月初进驻南京、上海。代表团在“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情况下，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并以上海、北平等地为中心，发动人民群众，广泛开展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

以上这些准备工作，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为战胜美蒋反动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节 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的被粉碎。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普遍开展。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进攻

【全面内战的爆发。《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的发表】 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蒋介石终于完成了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蒋军二十五个旅（师）共二十一万八千人，向被围困在鄂豫边界宣化店地区的我中原解放军发起进攻，揭开了全面内战的序幕。七月，蒋军又在东起江苏南通、西到安徽来安之间八百里的广阔战线上，向我苏皖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犯。国民党军对南北其他各解放区的进攻，也先后开始。一场空前规模的全面内战爆发了。

美帝国主义眼见战争已经开始，即于八月十日由马歇尔和新上任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告“调解失败”，以便放手让蒋介石大打内战。

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在军事上占着暂时的优势。他们拥有四百三十万人的总兵力（其中正规陆军约二百万人），占据了有着三万万人口的全国大部分地区，控制了大城市。他们接收了一百万日本侵华军的全部装备，尤其是有着美帝国主义的竭力支持。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的三年半中，美国口口声声叫嚷支持中国抗战，也只不过为蒋介石装备了二十个美械师（这些军队从未被用来对日作战）。但是，在一九

四六年的一至六月间，美国就为蒋军装备了二十五个师。此外，美国还为国民党训练了各种军事人员十五万人，用飞机、军舰把国民党的十四个军共四十一个师，和八个交通警察总队共五十四万人，运到进攻解放区的前线。为了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美国还把大批飞机、舰船、火箭炮、大炮、坦克、汽油以及其他战争物资送给蒋介石。全面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更加紧援助国民党。六月二十七日，美国国务院批准为国民党政府建立八又三分之一队的空军。七月十六日，美国国会通过“赠送”给国民党二百七十一艘舰艇的议案。八月三十一日，美国再以八亿多美元的剩余物资送给国民党。从此以后，军用物资，供应不绝。所以，这是一场“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别了，司徒雷登》）

全面内战开始时，蒋介石出动了全部正规陆军二百四十八个旅（师）、二百万人中的百分之八十的兵力，即一百九十九个旅（师）、约一百六十六万人。其部署是：三十一个旅共二十七万二千人进攻苏北解放区；二十七个旅共十九万一千人进攻山东解放区；二十五个旅共二十一万七千人进攻中原解放区；二十八个旅共二十四万九千人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十八个旅共十六万二千人进攻晋察冀解放区；十六个旅共十六万一千人进攻东北解放区；二十个旅共九万七千人进攻晋绥解放区；十九个旅共十五万五千人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九个旅共七万五千人进攻广东各游击区及海南岛解放区。蒋介石以为这样一来，一下子就可以把解放军打得一蹶不振，狂叫要在三个月到六个月内解决问题。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究竟能不能打败蒋介石的进攻，并且战胜他们呢？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主席为党中央

写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中明确指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并且为战胜蒋介石制定了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的正确的方针。八月，毛主席在延安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进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谈话，进一步为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主席在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英明地指出：“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从表面上看，美帝国主义是个庞然大物，蒋介石集团的军事力量也占有压倒的优势，但是，因为他们代表反动的一面，是纸老虎，革命人民决不要被他们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人民力量虽然暂时还比较弱小，还只有“小米加步枪”，但是，因为我们代表进步的一面，一定能够战胜美蒋反动派的“飞机加坦克”。

毛主席在谈话中还深刻地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美帝国主义关于反苏战争的宣传，固然是为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作舆论准备的，但当美国还没有压服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时，就谈不到向社会主义阵营发动新的世界大战。所谓反苏战争宣传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疯狂地进攻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毛主席在这个重要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了关于“中间地带”的理论，并指出：“美国

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地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这是一个在新形势下制止美帝侵略、推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战斗纲领。

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深刻地揭露了反动阶级的本质，批判了右倾悲观主义思潮，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极大地增强了战胜美蒋反动派的信心。

【粉碎蒋军全面进攻的斗争。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出现】为了打败蒋介石的进攻，毛主席为我军制定了战胜优势敌人的根本方针。七月二十日，毛主席为党中央写的指示中指出：“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九月十六日，毛主席为中央军委写的指示中又规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十月一日，毛主席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三个月总结》中，根据战争实践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这个作战方针。

集中兵力，各个歼敌，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军事斗争中的具体运用。在战略上，我们藐视敌人；在战术上，我们又重视敌人。在一个一个具体斗争上，必须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善于同敌人进行斗争。毛主席制定的“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作战方针，就是在战役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一思想的体现。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军，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根据这个方针，我军每战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

“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这样，就能使战略上暂时处于劣势的革命军队，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战役、战斗中，处于绝对优势，夺取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随着这些战役胜利的积累，就会在战略上总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取得最后的胜利。采取这种作战方针，是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的。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它可以使敌人背上包袱，而更有利于我军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从一九四六年七月中旬到八月下旬，华东解放军苏北部队发扬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和连续战斗的作风，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在苏中的泰兴、如皋、海安一带，同国民党进犯军连续打了七仗。我军七战七捷，歼灭了敌人七个半旅、五个交通警察大队，共计五万一千三百人，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八月中旬，晋冀鲁豫解放军为配合中原、华东解放军作战，向开封至徐州一线的敌人出击，歼敌一万六千余人。然后又于九月上旬，在鲁西南菏泽、定陶、曹县一带歼敌一万七千余人。其它地区的解放军也开始大量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总计，在全面内战开始后的三个月中，我军虽然放弃了淮阴、菏泽、承德、集宁等几十个中小城市，却取得了全歼敌军二十五个旅的巨大胜利。

然而，美蒋反动派并没有因损失二十五个旅而惊醒，反而因暂时占领了若干城市被冲昏了头脑。十月十一日，蒋军侵占了晋察冀解放区的中心城市张家口后，当天下午，蒋介石便下令召开“国民大会”，企图给自己的法西斯政权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我党当即指出，这是违反政协协议

的，并宣布拒绝参加伪国大。各民主党派也予以抵制。只有一小撮中国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分子以及某些所谓“社会贤达”^⑥，撕下了伪装，公开站到了蒋介石一边。十一月十五日，伪国民大会的丑剧在南京上演，并制定了伪宪法。这件事，使全国人民进一步看清了蒋介石的反民主、反和平的真面目。毛主席在当时就曾预言：“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后来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预言。

为了坚持内战，蒋介石进一步用出卖国家主权的办法来换取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十一月四日，美蒋在南京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十二月二十日，又签订了《中美空中运输协定》。根据这些条约和协定，美国侵略者取得了在中国的领土权、领空权、领海权、铁路交通和内河航行权、海关权、商业权、军权、财权、外交权，直至任意屠杀、奸淫、侮辱中国人民而不受任何惩罚的特权。这是蒋介石对国家主权的空前大拍卖，是中外关系史上罕见的奴隶契约。

蒋介石集团还在准备内战的过程中，大大发展了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他们通过“接收”的形式，把用人民血汗建立起来的敌伪的各种金融机构、工业、商业以及其他财产窃为己有。据一九四六年五月的估计，四大家族占有了全国产业资本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和全国银行资本的三分之二以上。他们又利用发行纸币、公债，增加税收，加紧经济掠夺等办法，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使官僚资本发展到了高峰，更使通货膨胀恶性发展到不可收拾的程度。蒋介石为了进行内战，还恢复征兵征实，把国统区的广大农村变成了人间地狱。

蒋介石在军事上的冒险、政治上的反动和经济上的掠夺，造成了国民党统治的严重危机，激起了国统区人民汹涌澎湃的爱国民主运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因国民党反动派无故逮捕和杀害摊贩，上海爆发了全市性的反美蒋群众运动。十二月二十四日，北平发生了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的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自十二月底到一九四七年一月间，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几十个大中城市五十多万学生，相继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高呼“美国佬滚回去”等口号，抗议美军暴行。这一斗争，迅速获得全国工人、教员和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支持，一个反对美蒋反动派的爱国民主运动正在迅速地高涨起来。

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继续给敌军以沉重的打击。毛主席在《三个月总结》中指出：“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并预计我军如再歼敌二十五个旅，就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在毛主席“从根本上转变军事形势”的号召下，各地解放军继续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华东解放军，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中旬，在宿迁以北歼敌三个整旅，共二万四千人。一九四七年一月，又在鲁南歼敌五个旅，约五万人。这时，国民党集中三十一万兵力，由南北两路向我发起进攻，企图同我军主力在沂蒙山区决战。我先在临沂歼敌两个师，然后挥戈北向，于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在鲁中莱芜地区一举歼敌七个旅，共六万余人，活捉敌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收复城市十三座。

晋冀鲁豫解放军，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豫北歼敌一万一千余人。一九四七年一月，在鲁西南歼敌一万六千余人。接着，又在豫东及皖西北歼敌九千人。

晋绥解放军及晋冀鲁豫太岳部队，自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七年一月，发动了晋西南战役，歼敌二万二千余人。

晋察冀解放军，一九四七年一月，在保定以南歼敌九千余人。

东北解放军，一九四七年一至三月，北满部队三次南渡松花江，在长春以北地区，歼敌一万五千余人。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至次年四月，辽南部队在临江、通化四次保卫战中，歼敌一万九千余人。从此，敌人被迫结束了在东北的进攻。

总计，人民解放军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之间，作战八十余次，共歼敌四十一万五千人，超过进攻敌军总数的四分之一。经过半年多战斗的结果，敌人进攻解放区的总兵力由开始时的一百九十三个旅增加到二百十九个旅，而第一线的兵力却由一九四六年十月最高点时的一百十七个旅下降到一九四七年二月的八十五个旅，从根本上转变了军事形势，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国统区人民民主运动的兴起，推动了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全国人民正在进一步动员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而奋斗。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伟大号召，指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粉碎蒋军重点进攻的斗争。国民党统治区第二条战线的出现】 蒋介石在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被粉碎后，狗急

跳墙，疯狂地进行垂死的挣扎。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国民党先后通知我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代表，要求立即撤回延安。三月十五日，国民党召开三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公开宣布国共谈判已完全破裂，表示要坚持内战到底。但是，由于大量兵力被歼，丧失了全面进攻的能力，只能改变为重点进攻，把兵力集中于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蒋介石特别寄希望于陕北战场，幻想首先解决西北问题，迫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退出陕甘宁边区，然后再调动兵力进攻华北。

三月十三日，蒋军开始进犯陕甘宁边区。这时，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只有二万五千人，而蒋军却拥有胡宗南指挥下的十五个旅约十四万人，加上宁夏、青海、榆林等地的敌军，共三十四个旅、二十三万人，兵力十倍于我。在胡宗南的十五个旅进犯延安时，我军按照毛主席的部署，在延安以南歼敌五千余人后，于十九日主动撤出延安。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刘少奇被敌人的暂时优势吓破了胆，主张党中央东渡黄河，放弃陕甘宁边区，实行逃跑主义。三月二十六日，党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举行紧急会议。毛主席在会上驳斥了刘少奇的错误主张，指出蒋军进攻陕甘宁边区，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表示它的危机已经异常深刻化。毛主席决定亲自率领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坚持在边区，利用这里地形险要、群众基础好、回旋地区大的有利条件，保卫陕甘宁解放区，推动全国革命形势向前发展。

在优势敌人面前，毛主席“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亲自指挥部队，运用“蘑菇战术”，牵着胡宗南十几万人的鼻子跑。我军撤出延安后，主力埋伏在青化砭，而以部分兵力将

敌人主力五个旅诱至安塞，待机歼敌。二十五日，敌整编三十一旅进入我伏击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将敌军上至旅长，下至马夫，共二千九百多人全部歼灭。胡宗南发觉我主力在青化砭后，急忙将其主力从安塞掉头东进，向我扑来。我军以小部兵力与敌周旋，主力则隐蔽待机。结果，胡宗南化了十二天时间，走了四百余里，一无所获。四月十四日，我军又在瓦窑堡南的羊马河歼敌一个旅。以后，胡宗南以为我主力已转至绥德地区，即以其精锐部队第一六七旅据守战略补给站蟠龙，而以九个旅主力向绥德急进。我将计就计，以部分兵力将敌主力引至绥德，却集中四倍于敌的兵力包围蟠龙，经过两天两夜的攻坚战，于五月四日打进蟠龙，歼灭守敌一个旅，共六千七百多人，并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正当胡宗南进退维谷之际，我军在五月三十日至七月上旬，突然主动出击，收复了大片地区。八月，我军围攻榆林，调动胡宗南的主力来援。十八至二十日，在陕北米脂县沙家店地区歼灭了敌整编三十六师及其所属两个旅，粉碎了敌军企图夹击消灭我军的阴谋。从此，陕北的军事形势完全改观，蒋军的重点进攻被彻底粉碎，出现了我军由防御转为进攻，敌军由进攻转为防御的根本变化。

在山东战场上，我军也取得了重大胜利。四月上旬，敌人集中三个兵团，共三十四旅二十五万五千人，进犯鲁中地区。我军主力转向敌人侧后，伺机而动。下旬，我西线部队围攻泰安，首战大捷，歼敌七十二师的三个旅，共二万四千余人。各路部队乘胜出击，敌人的第一次进攻即被打退。五月，敌再次由临沂、泰安一线，分三路北犯我解放区，企图压我主力至胶东狭窄地区决战。我军主力则实行中央突破，在蒙阴东南之孟良崮地区，包围敌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

七十四师，于十六日全歼该师三万二千余人，敌师长张灵甫当场被击毙，敌军全线溃退。六月下旬，敌又以“密集平推”战术，向沂蒙山区进攻。我主力向敌人后方出击，占领了大片地区。七月中，敌军被迫分路撤退。至此，国民党在山东的重点进攻也被粉碎了。

与此同时，我东北、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各解放区，也向进犯的敌军发动了局部反攻。

我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区人民的密切配合下，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共歼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非正规军三十四万人，总计一百二十万人。国民党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四百三十万人降为三百七十三万人，正规军由二百万人降为一百五十万人，整个战场上的机动兵力只剩下四十个旅了。而且，敌人后方异常空虚，从新疆到台湾十三个省的漫长战线上，只有二十一个旅任守备。由于师出无名，屡战屡败，敌军士气低落，军心动摇。整个国民党反动营垒充满了失败情绪。

在解放区战场胜利消息的鼓舞下，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国统区人民运动进一步高涨起来了。五月四日，上海举行了反内战的示威。同时，上海八千工人和学生包围了国民党警察局。这场群众斗争迅速扩展到南京、北平、杭州、沈阳、青岛、开封等城市，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呼声响彻整个国统区。国民党反动派对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十分害怕，使出了全部法西斯手段，进行野蛮的镇压。五月十八日，蒋介石公布了所谓《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大动杀机。五月二十日，南京、上海等城市的学生，在南京高呼“向炮口要饭吃”的口号，向伪行政院示威。国民党反动派出动大批军警进行血腥屠杀，殴伤和逮捕示威学生。同一天，在天津

等地也发生了殴伤和逮捕学生的事件。这就是“五·二〇血案”。但是，已经炽燃起来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教员罢教的斗争，遍及了全国六十多个大中城市。

五月三十日，毛主席为新华社写的重要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综观作为转折点的军事战线和新形成的第二条战线，展示了战争第一年的大好形势。同人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了。毛主席及时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普遍开展】 正当人民解放战争在 frontline 胜利发展的时刻，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也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根据“五四指示”，要求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发动群众自己解决土地问题。在土改中，还必须注意不侵犯中农的利益，使中农参加到运动中来，保证农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站在我党一边。到一九四七年初，各解放区约有三分之二地方进行了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一九四六年，各解放区农业生产普遍获得了丰收。为了保卫丰收果实，各地农民踊跃参军。到一九四六年十月，解

放区有三十万农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三、四百万人参加了民兵和游击队。

在土地改革进行过程中，党内曾出现了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去努力满足贫苦农民土地要求的右的倾向。同时，在斗争中暴露了有些农村基层组织严重不纯和作风不正的情况。某些地主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混进了党内，把持了一些基层组织，歪曲党的政策，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进行。毛主席及时地领导全党克服了这种不良倾向。在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春，当战争正在紧张进行时，毛主席一再提醒各级领导：“不论战争如何忙，坚决地领导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三个月总结》）针对土地改革中的不彻底现象，强调必须进行认真的检查，“务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都能获得土地，而豪绅恶霸分子则必须受到惩罚”。（《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九四七年六月，晋绥解放区召开了地委书记会议，彻底揭发了各种离开党的正确路线的严重状况，批判了右的倾向，制定了认真进行土改和整党运动的正确方针。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晋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运动获得了伟大的成就，保证了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军事勤务的顺利完成。这是各解放区克服右倾错误的一个例证。

一九四七年九月，党中央在晋察冀解放区的平山县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全面讨论了土改和整党运动的问题。九月十三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按人口平分土地，地主富农应得的土地不能超过农民群众，并废除劳动人民所欠地主富农的高利贷债务。这个大纲，既肯定了“五四指示”的方针，又对“五四指示”中地主可以得到比农民较多的土地财产，富农的土地财产原则上不动的规定作了

明确的改正，这是完全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的。全国土地会议还讨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成分不纯和作风不正的问题，规定了结合土地改革运动整编党的队伍的步骤和方法。

《中国土地法大纲》还规定，保障农民及其代表在会议上批评、弹劾、撤换及选举政府和农民团体的各级干部的权利。

《中国土地法大纲》通过后，经党中央的批准，在十月十日公布。这个文件的公开发表，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农民群众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热情。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克服右的倾向以后，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进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的提出】 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一百二十万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万人，正规军达到一百万人以上，装备也由于大量的缴获而有了显著改善。这时，我军总兵力虽仍少于敌军，但由于进行了土地改革，发展壮大民兵，后方日益巩固，不须分兵守备，因而我军在战场上的机动兵力却多于敌人。毛主席和党中央根据这一情况，决定从战争进入第二年后，即实行由防御到进攻的战略转变，以彻底粉碎蒋介石继续把战争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迅速扩大革命的规模 and 影响，从根本上撼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毛主席规定了人民解放战争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

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我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渡过黄河，进入鲁西南地区作战。在

七月份一个月中，歼灭敌军五万六千余人。八月中旬，又越过陇海路，千里跃进，长驱南下。下旬，到达大别山地区，直迫长江沿岸，揭开了战略大反攻的序幕。八月二十三日，晋冀鲁豫解放军太岳兵团，从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地区，深入豫陕边境。华东人民解放军也在八月跳到外线，经过鲁西南，越过陇海路，南进到豫皖苏大平原。三路大军在南线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相互支援，纵横驰骋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迄大海的广大地区，向敌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作战。这个行动打乱了蒋介石的整个战略部署。蒋军在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的九十个旅被我牵制住，因而不得不放弃把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的野心，完全陷入了被动地位。我三路大军贯彻毛主席“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和“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的指示，充分发动群众，大规模歼灭敌人，建立了北起陇海路，南抵大江边，东自大别山以东巢湖至徐州一线，西至汉水以西沙市至安康一线，拥有三千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它象一把利剑一样插入敌人的心脏，直接威胁到敌人的战略要地武汉、洛阳、郑州、开封、徐州、蚌埠等地区，从而改变了全国战场的形势。

在南征大军向外线进攻的同时，留在内线的各路部队也展开了新的攻势。西北解放军，在沙家店战役之后转入了反攻。华东解放军山东兵团，九月在胶东地区发起攻势，逐渐改变了山东的局势。晋察冀解放军，九月在平汉路北段发起了攻势作战。东北解放军，也于九月起在长春、吉林、四平地区和北宁线锦西至义县地区发动进攻。所有以上外线的和内线攻势作战，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面战略进攻的总形势。

在人民解放军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时，蒋介石集团在国民党统治区进一步加强了法西斯专政。七月四日，国民党政府发布了“戡乱动员令”，宣布实行所谓“戡乱”，即对革命人民进行残酷的法西斯镇压。它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一切反对美蒋的群众运动镇压下去，并捞取更多的人力物力来加强反革命战争。但是，结果却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这个“动员戡乱”的伪令又一次从反面教育了广大群众，使蒋介石集团在人民中间完全孤立了。

随着战略大反攻的开始和蒋介石集团在人民中的孤立，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毛主席亲自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庄严号召，明确地指出人民解放战争的目的是：“实现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借以达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总目标。”并宣布了八项基本政策，保证了党的任务的完成。从这时起，武装夺取政权、实现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已直接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

第四节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发表。人民解放军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

【党中央十二月会议。《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发表】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党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除有当时能够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外，还有陕甘宁和晋

缓两解放区的负责干部参加。毛主席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重要报告。这一报告总结了我党从抗日战争胜利以来的斗争经验，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行动纲领，为夺取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毛主席在报告中首先全面分析了形势，指出美蒋反动派发动的反革命战争已经注定要彻底失败，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就要见分晓了。“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百折千回，现在已经胜利在望了。这不仅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大事，而且也是世界革命历史上的大事。**毛主席在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形势时指出：“**国内国外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就象一座火山，每天都在威胁美国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就是坐在这座火山上。**”美帝国主义以世界霸主自居，骄横不可一世，其实却是外强中干，虚有其表。美帝奴役世界的计划，不但必须打败，而且也是完全可以打败的。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已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优势是在我们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毛主席针对当时流行的对于国际形势的悲观估计，深刻地指出：“**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会议在讨论和通过毛主席的报告的同时，还讨论和通过了毛主席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这个重要文件，用彻底革命的思想武装了全党，批

判了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修正主义路线，提出了正确处理国际斗争与国内斗争的关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

毛主席在报告中系统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以来人民军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一）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二）先取小中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三）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四）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五）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六）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七）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八）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敌人有中等程度守备的，相机夺取之，敌人守备强固的，等条件成熟时再夺取之。（九）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十）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这十大军事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军作战方针的科学概括，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战争的典范。它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是任何反动阶级的军队都不可能运用的。

毛主席在报告中还强调了土地改革运动和整党运动的重要性，指出：“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而整党运动则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毛主席充分肯定了全国土地会议的正确方针和原则，同时指出了纠正土改和整党运动中的错误倾向的方法。

毛主席在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指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并指出：“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政治纲领，必须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

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和政治纲领，不仅对于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胜利具有决定的意义，对以后新中国的建设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粉碎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路线的斗争】正当我们党在纠正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右的错误倾向的时候，刘少奇却逐步抛出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路线。一九四七年三月，在蒋军侵占延安后，为着工作上的便利，党中央决定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负责，渡河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在经过晋绥解放区时，刘少奇便散布形“左”实右的言

论，种下这个地区以后出现形“左”实右的错误的根子。九月，刘少奇在主持党的全国土地会议期间，借口反对土改、整党中的“右倾”，提出了一整套侵犯中农、破坏民族工商业、乱打乱杀、打击基层干部等做法，形成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路线，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种情况如果不迅速加以制止，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就可能遭到破坏。在十二月会议上，毛主席就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批评。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毛主席根据会议的讨论，写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党内指示，并在一九四八年的上半年又陆续起草了《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等一系列文件，从各方面清算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

刘少奇这条错误路线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歪曲平分土地的原则。他鼓吹不分阶级一律“打乱平分”，并把这说成是“土地改革的最彻底办法”^①。在这种错误影响之下，各解放区都出现了把中农错划到地主富农圈子里去的扩大打击面的现象。晋绥地区兴县蔡家崖行政村五百多户人家中，有五十多户错算到阶级敌人的阵营中去了。这样，尽管口头上也说要团结中农，实际却是侵犯了相当一部分中农的利益。毛主席针对这种错误现象，强调指出：“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为此，党中央重新公布了毛主席在一九三三年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和同时期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的党内文件，在各地农村中重新评定阶级，并规定在农会委员会、乡区政府中吸收中农积极分子参加工作。这些措施，及时纠正了刘少奇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

这条机会主义路线的另一个表现是破坏民族工商业。刘

少奇提出对兼营工商业的地主的“商店要让农民搞他个乾乾淨净，工厂，农民不需要就归公。”他把地主富农在减租减息时期中投资于工商业说成是“化形”，规定要“搞垮它”。这种错误政策，混淆了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的界限，使解放区的社会经济发生了混乱。毛主席在《关于工商业政策》、《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中，严厉地批评了这种错误，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消灭的对象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必须采取审慎的、原则上一律保护的政策。毛主席还在《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等文件中，纠正了统一战线问题上“左”的倾向，指出必须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孤立其少数，对于地主和富农阶级中带有民主色彩的开明绅士，应该在反对美蒋、赞成民主（不反共）、拥护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对他们采取团结和教育改造的政策。

刘少奇的错误路线还表现在整党运动中。刘少奇叫嚷“党内的封建最多”，“斗干部就是斗地主”，“群众吊、打干部是正义的”。^⑥他推行了一套“搬石头”，搞“扎根串连”的做法，打击了一大片干部。毛主席及时地纠正了这种错误，根据群众创造的经验，指出整党中要邀集党外积极分子参加党的支部会议，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借以改变党组织的成份不纯或者作风不纯的现象，使党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起来。“对于那些犯了错误但是还可以教育的、同那些不可救药的分子有区别的党员和干部，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应当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路线也给群众运动带来了损失。刘少奇不区分不同情况，鼓吹“村村点火，处处冒烟”，造成了工作中的混乱。毛主席针对这种错误，写了《在不同地

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等重要指示，教育全党要分别不同情况，有步骤地、有区别地展开各种斗争。毛主席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 error，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此外，刘少奇还在镇压反革命中提倡乱打乱杀、滥施肉刑的错误做法，在政权建设上提倡“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关门主义口号，在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提倡“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尾巴主义。对这些错误倾向，毛主席都进行了批判和纠正。

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刘少奇形“左”实右路线所造成的错误很快就纠正过来了。三月二十日，毛主席写了《关于情况的通报》，对全国工作作了部署。随后，毛主席和党中央离开了陕北。四月一日，途经晋绥解放区时，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对土改整党等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五月，毛主席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从此，直到一九四九年三月止，这里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五月二十五日，毛主席为党中央起草了《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对继续进行土改和整党运动作了周密的部署。

到一九四八年九月，全国已有一亿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整个解放区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巨大变化。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被彻底埋葬了，混进党的基层组织和农村基层政权的坏人被清理了出来，千千万万的农民群众翻了

身，形成了以贫雇农为主的领导骨干，农业生产有了显著的发展，成千上万的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土改后的农村面目焕然一新。

经过这一场反对刘少奇形“左”实右路线的斗争，全党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认识得更深刻、更全面了。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对这条总路线、总政策作了科学的概括：“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主席还指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这场斗争进一步教育了全党，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主席指出：“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同时，毛主席又强调指出，必须严格执行党的政策，“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关于情况的通报》）如果当时我们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而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毛主席还总结了反错误倾向斗争的经

验，指出：“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经常同时存在，但在一定时期中只有一种主要倾向。从“五四指示”发表以来，主要的危险倾向是右。以后，刘少奇乘机抛出了形“左”实右的路线，使“左”倾错误成为主要的危险倾向。只有找出各个时期的主要错误倾向，加以克服，革命才能前进。

【人民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对国民党军全线大规模进攻的开始】 在进行伟大的土改整党运动的同时，人民解放军在一九四七年底到一九四八年初，进行了冬季整训。这种新式的整军运动，紧密结合农村的阶级斗争，放手发动全体指战员，在全军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用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方法，从政治上整训部队，清除了少数混进军内的坏人，实行了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通过新式的整军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加强了全军政治上的团结。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出力量，不怕牺牲，不怕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一九四八年五月，在解放今属河北省的隆化县时，战士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英勇事迹，就说明了我军素质的提高。新式整军运动，又推动了群众性的大练兵运动的开展。毛主席在《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中总结了 this 经验，肯定了成绩，指出：“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

在进行土改整党整军运动的过程中，毛主席向全党发出了一系列加强纪律性的重要指示。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了由毛主席起草的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要求全军“深入教育，严格执行。”一九四八年一月，毛主席为党中央写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规定各地中央代表机关、野战军和军区必须定期向中央和中央主席写政策性的报告，纠正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现象。五月，毛主席指示各级党组织和全党干部，认真学习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二章。并在《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和《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反复强调了克服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大权集中于中央的重要性。从此，“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成了全党全军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行动准则，对于夺取全国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

经过新式整军运动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的提高，在全国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攻势。国民党军在“全面防御”体系被摧毁后，从一九四八年一月起实行所谓“分区防御”的“新战略”，尤其注意加强中原地区的防守力量，妄图阻止我军向南发展。二月二十四日，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开始围攻宜川。国民党胡宗南部第二十九军来援，于二十九日进入我军伏击地带。三月一日，我军发起总攻，迅速全歼敌军两个师，敌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当场被击毙。三月三日，我军攻克宜川，又歼敌一个旅。这一战役共歼敌三万人，创造了西北战场上的空前大捷，迫使敌军于四月二十一日放弃延安南逃。在中原战场上，我人民解放军三支大军先后解放了战略要地洛阳、开封，在睢杞战役中一举歼敌一个兵团，共五万余人。七月，又全歼襄樊守敌二万余人。于是，敌人在中原的防御体系就被摧毁了。在东北战场上，我军经过一九

四七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八年三月的冬季作战，歼灭敌军十五万人，解放了敌人坚固设防的战略要点四平街，使敌军困守在长春、沈阳等少数孤城和铁路线上，为解放东北全境准备了条件。在山东战场上，我军经过三月至七月的作战，解放了津浦和胶济铁路线的战略要点，把敌军围困在济南、青岛等地。在华北战场上，我军迫使敌军退守张家口、太原、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在我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的强大攻势下，敌军的“分区防御”被彻底粉碎了。八月初，国民党南京军事会议又决定实行“重点防御”，以图苟延残喘，但事实上已经组织不起任何防御体系了。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极大地鼓舞着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从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以来，上海工人阶级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对工人运动的镇压，反复进行了反迫害斗争，到一九四八年初发展为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各地学生的反饥饿、反迫害斗争也此起彼伏，北京、上海、杭州、南京、武汉、昆明等地，到处发生罢课和示威游行。一九四八年五月以后，又掀起了各界人民的反美扶日运动，同美帝国主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在战场上既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在后方又不断受到人民民主运动的冲击，政治经济危机步步加深，反动统治更加摇摇欲坠了。

【伟大的战略决战的胜利】 到一九四八年六月，我人民解放军的总数已发展到二百八十万人。部队的政治素质，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并以缴获的武器改善了自己的装备，建立了强大的工兵和炮兵，提高了攻坚能力，积累了阵地战、攻坚战的经验。后方也由于土改整党运动的胜利开展而更加巩固，人民群众支援前线的热情更加高涨。与此相反，

国民党军队的总数却下降至三百六十万人，后方十分空虚。军事形势的迅速发展，造成了歼灭国民党军队主力的时机的到来。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又一次打破军事作战的常规，当我总兵力尚处于少数时，就毅然决定发起和组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与敌军展开空前规模的战略决战。

毛主席亲自领导和指挥了三大战役。根据东北战场的形势，毛主席决定首先进行辽沈战役。在东北战场上，我军已由长期数量的劣势转变为优势，部队装备较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东北我军已有主力军七十万人，地方军三十万人。而国民党卫立煌部只有正规军四十八万余人，分别困守在长春、沈阳和北宁线上。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挽救败亡的命运，早就有从东北撤退、集中力量保住华北华中，以便争取时间卷土重来的打算。随着形势的变化，这时敌军有可能决策南撤。我军如首先歼灭东北敌军，既可粉碎敌军向关内实行战略收缩的企图，又可以使东北我军转入关内作战。因此，这是决定全局的关键一役，它关系到整个战略决战是否能迅速夺得全胜。

辽沈战役的全过程，充满着两条军事路线的激烈斗争。辽沈战役的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胜利。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辽沈战役的中心一环是集中我军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特别是尽速攻克锦州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这样，就可以封闭敌军逃回关内的退路，有利于各个歼灭孤立于长春、沈阳之敌，并且有可能吸引长、沈之敌倾巢援锦，造成全歼卫立煌部主力的有利形势。辽沈战役的实际进程和毛主席的预计完全符合，在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下，达到了全歼东北敌军的目的。

但是，东北解放军司令员林彪却在辽沈战役中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竭力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和作战方针。在战役进行前，他坚持以主力攻打长春的错误主张，拒不执行毛主席关于南下北宁线，攻占锦（州）、榆（关）、唐（山），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对此进行了多次批评。九月七日，毛主席再一次电令东北解放军“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首先使用主力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特别是攻占锦州，并吸引长、沈之敌来援，便利我军在运动中消灭它。经过毛主席的多次批评后，林彪才不得不于九月上旬部署东北我军主力自长春地区南下。这一战役，东北解放军集中了主力十二个纵队和一个炮兵纵队，连同地方武装共五十三个师七十余人。九月十二日，我军主力先头部队到达北宁线附近，会同原在南面的部队开始包围绥中、兴城、义县等地，揭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

战役开始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军以六个纵队和一个炮兵纵队围攻锦州，以五个纵队阻击救援锦州之敌。但在攻锦战役部署已经就绪的时刻，林彪又对抗毛主席关于坚决打下锦州全歼敌范汉杰集团的作战方针，时而想打山海关，时而又想抽调主力去打长春。这一错误主张，被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及时严令制止。这时，蒋介石亲自调了华北、山东、锦西的国民党军队十一个师来援，被我阻击于塔山。敌廖耀湘兵团十余人由沈阳来援，也被我阻击在黑山、大虎山东北地区。十月十四日，我军对锦州发起总攻，经过三十一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以下十万余人，解放了锦州，切断了北宁线。十月十九日，困守长春的“东北剿总”

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以下九万余人，除一部起义外，其余被迫投降，长春宣告解放。

这时，盘踞在沈阳地区的敌“东北剿总司令部”及所属周福成兵团和已进至辽西之彰武、新立屯地区的廖耀湘兵团共二十余万人，惧我围歼，准备逃跑。在敌人重占锦州打通北宁线的企图被我粉碎之后，营口便成了敌军逃向关内的唯一通道，蒋介石也正在征集船只，打算把这些军队接运至关内。为了堵塞敌人向关内逃跑的退路，就地全歼东北之敌，毛主席先后七次对林彪作了明确的指示，令其以足够兵力阻敌南逃，并迅速控制营口。由于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我军于十月二十八日，在大虎山及黑山北镇地区全歼了敌廖耀湘兵团，俘敌兵团司令廖耀湘以下十余万人。接着，我军又乘胜猛追，十一月二日迅速解放了沈阳，歼灭了敌“东北剿总司令部”及所属周福成兵团。至此，东北全境宣告解放。整个战役总计歼敌三十三个正规师，十三个非正规师，共四十七万二千人。但山于林彪迟迟不执行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关于控制营口的命令，致使敌五十二军军部及一个师、三个团得以从营口入海脱逃。

在辽沈战役进行时，从九月十六日开始，华东人民解放军在山东战场向济南之敌发起进攻。二十四日，济南市全部解放，歼敌十万余人，生俘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

经过辽沈战役之后，敌我军力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敌军总兵力降为二百余万人，我军则增至三百万人，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的劣势终于转化为优势。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的决定，把原各大战术区的部队划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三

类，进一步加强了我军的建设。野战部队按其所在地区，分别组成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华北等野战军。不久，西北野战军改为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改为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为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改为第四野战军，华北野战军的三个兵团直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

至此，围歼在长江以北的蒋军主力的时机也已经成熟了。还在辽沈战役尚在进之时，十月十一日，毛主席就发出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部署了歼灭长江以北南线蒋军主力刘峙集团的大会战。辽沈战役结束后，十二月十一日，毛主席又发出了《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部署了歼灭长江以北北线蒋军主力傅作义集团的大会战。

十一月六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联合发动了淮海战役。在济南战役后，华东地区的敌军收缩了据点，集中兵力于徐州及徐州东西陇海路一线，企图阻止我大军南下。七日，我华东野战军分三路南进，首先向徐州以东地区之敌黄伯韬兵团发起进攻。敌军企图西逃，被我包围于碾庄地区，二十二日全歼该敌，击毙兵团司令黄伯韬。这一战胜利地完成了中间突破，切断了敌人的海上逃路，形成了包围徐州、兵临淮海之势。敌人为了救援黄伯韬兵团，急忙把黄维兵团从汉口调往徐州。我中原野战军从十一月十八日开始，在蒙城逐段进行阻击。二十五日，将黄维兵团围困在宿县西南之双堆集地区。十二月十五日，全歼该敌，活捉兵团司令黄维。十二月一日，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弃守徐州，带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向河南永城方向逃跑。我华东野战军跟踪追击，四日将敌包围于永城东北的青龙集、陈官庄地区。孙元良兵团妄想突围，结果于六日夜问被我全

歼。这时，毛主席从全盘战局出发，决定留下杜聿明指挥的各兵团，在两周内不加歼灭，以便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十二月十七日，毛主席亲自为中原、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写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广播稿，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当我军对平、津、张战场之敌分割包围全部完成后，便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发起了对杜聿明部的总攻击，十日全歼敌军二十万人，生俘杜聿明，击毙邱清泉。伟大的淮海战役，共歼敌五十五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地区和中原一部分地区。雄师南下，兵临大江，南京已经处在我军的直接威胁之下了。

平津战役开始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五日，由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的两个兵团共同进行。当时，淮海战役正在顺利发展，平津之敌已成为惊弓之鸟。在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指挥下的六十多万敌军，龟缩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沿铁路一线，企图从海上南逃或向绥远西窜。因此，稳住平津之敌，使其无法逃窜，是实现我军就地歼灭该敌的关键。毛主席为此采取了一系列英明决策，指示华北两兵团集中主力于平绥线上，把敌人分别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两地，切断敌西窜绥远之路。同时，命令东北野战军以最快速度挥戈入关南下，不走山海关，而从热河冀东荫蔽行军，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之敌，切断敌人从海上南逃的退路。但是，林彪仍然一再对抗毛主席的这些正确的战略部署，始而以种种借口拖延时机，迟迟不动，继而指挥三个军经山海关前进，暴露军机，最后又顽固地要先打南口。毛主席及时制止了这种忽“左”忽右的错误主张，稳住了平津的敌军，将其分割包围于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塘沽五个据点，截断了南逃、西窜的通道。在我军广大指

战士的英勇作战下，十二月二十二日，攻克新保安，歼敌一个军部和两个师。二十四日，解放张家口，全歼守敌七个师五万四千余人。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我军对天津发起总攻，激战二十九小时，解放了这个重兵设防的大城市，全歼守敌十三万余人，活捉敌指挥官陈长捷。至此，北平守敌二十余万人，在我军严密包围下完全陷于绝境。由于我们党的努力争取，北平守敌在傅作义率领下接受和平改编。三十一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伟大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在这一战役中，除塘沽守敌五万余人由海上逃跑外，我军共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军队五十二万人，使华北地区基本上获得了解放。

三大战役，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歼灭了蒋军一百五十万人以上，战争规模之大，胜利之彻底，是世界战争史上所罕见的。从此，蒋军主力丧失殆尽，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战线上，只剩下一百一十万左右作战部队，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已经成为定局。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解放区人民对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在各个战场上，除了大批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外，广大的民兵和群众也都动员起来，积极支援前线。在辽沈战役中，参加作战的地方武装有三十多万人，随军活动的民工有九万六千多人。在淮海战役中，有四十余万地方武装配合作战，二百多万民工执行各种战勤任务。在平津战役中，有十五万东北民工随军南下，三十万华北民兵和民工直接在 frontline 服务。已解放了的城乡劳动人民，积极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加紧进行军工生产，保证了我军的供应。千百万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

和支援战争，终于使敌人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无法逃脱灭顶之灾。

第五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粉碎美蒋新的“和平攻势”的斗争】 美蒋反动派在军事上连遭失败后，企图再次发动“和平攻势”，借以欺骗人民群众，争取喘息时间，维持反动统治。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一日，在美帝的导演下，国民党反动派演出了一出“行宪国大”的丑剧，蒋介石当上了伪总统，桂系军阀李宗仁被选为伪副总统。美帝的这一以李代蒋趋势的动向，使中间党派的某些右翼分子产生了幻想。早已破产了的“中间路线”，又开始吹吹打打地粉墨登场了。民主同盟中的右派、农工民主党负责人章伯钧，妄想在南方向拉拢一批军阀，搞“三分天下”。民盟右派罗隆基则在南京出入于司徒雷登门下，希望得到美帝国主义的垂青。到了一九四八年底，蒋军在淮海、平津两大战场上正面临着全军覆灭的前途。这时，蒋介石政权必然败亡的趋势，连美帝和国民党反动派中的一些人也不再怀疑了。他们更迫不及待地直接策动重开谈判，妄图挽救其垂亡的命运。十二月二十五日，桂系军阀白崇禧操纵下的湖北省参议会致电蒋介石，要求“恢复和谈”，以制止革命战争的发展。

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为新华社写了一九四九年的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尖锐地指出：“现在摆在中国

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并由此“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政治态度。毛主席针对那些打着民主自由招牌的右派人物的活动，向他们提出了严重警告：“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毛主席以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对付正在出现的复杂斗争作了充分的准备。

就在这时，国民党总头目蒋介石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发表了一篇“求和”声明，企图在保存伪法统、伪宪法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等条件下，同我党进行“和平谈判”。一月五日，毛主席为新华社写了题为《评战犯求和》的评论，指出蒋介石提出的五项条件，根本不是和平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是企图利用“和平谈判”来保持反革命实力。十四日，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八项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八项条件的

实质，就是坚决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国家。这是真和平和假和平的试金石。

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布“引退”，让李宗仁代理伪总统，继续玩弄“和谈”阴谋。他自己躲到幕后，加紧进行战争准备，企图争取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在江南整顿和新编几十个师，以便卷土重来。李宗仁上台的第二天，就发表声明，伪善地表示，“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从此，国民党各派围绕着和平问题使尽了各种花招，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我们党决不上敌人缓兵之计的当。在这段期间里，毛主席连续写了《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等评论，揭穿了战犯“求和”的真相。另一方面，我们党也不一概地拒绝谈判。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这一方针，既可以揭穿反动派的阴谋，提高群众的觉悟，更好地争取中间势力，又可以进一步促进国民党反动派的分化瓦解。“国民党统治总崩溃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伟大胜利的必然结果，但是国民党及其美国主人的‘和平’叫嚣，对于促进国民党崩溃一事，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北平的和平解放，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这一先例，为解决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创造了一种新的方式，加速了全国胜利的到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的发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为迎接革命在全

国的胜利，准备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毛主席所作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提出了夺取全国胜利和准备革命转变的伟大纲领，是一个划时代的重要文献。

毛主席在报告中及时总结了平津战役中的经验，指出解决国民党的残余力量，有天津、北平和绥远三种方式。但是，用军事手段粉碎敌人的一切反抗，依然是首要的前提。

“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毛主席规定了人民解放军一方面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工作队的正确方针。随着全国的解放，要把人民解放军变作一所巨大的干部学校，使人民解放军全部地转化为工作队。

毛主席在报告中着重指出，必须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移到城市。我国革命从一九二七年以来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的时期已经结束，现在开始了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新时期。在新的形势下，**“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荫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毛主席深刻地分析了城市中的阶级关系和阶级路线，强调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把恢复和发展生产当作当前的中心任务。报告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教育全党要把这种客观现实当作观察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如果离开这个基本出发点，就会造成右的或“左”的错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毛主席明确地指出：在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将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在一个时期中将是国内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这就规定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根本方向，解决了无产阶级在下一阶段中的革命对象、性质、任务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

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毛主席规定了“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

“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这一坚定的无产阶级政策，是指导我们进行外交斗争的重要武器。

毛主席的报告最后指出，夺取全国的胜利，夺取政权，已经是不要花费很大气力的事了，但是，“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巩固这个胜利，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路程将更长，工作将更伟大，更艰苦。因此，必须警惕党内的骄傲自满情绪，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毛主席恳切地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三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和党中央

从西柏坡村移驻北平。从此，古老的北京城升起了光芒万丈的红太阳，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这里领导着全党和全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

四月一日开始，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我党代表团与国民党代表团在北平举行谈判。经过半个月的工作，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然而，国民党反动派丝毫没有和平的愿望，拖到四月二十日这个最后期限，终于露出了真相，拒绝在协定上签字。

四月二十一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令全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毛主席一声令下，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长江前线上，于二十一日清晨起，万船齐发，一举强渡成功，彻底摧毁了敌军苦心经营了三个多月的长江防线。二十三日，红旗插上蒋介石二十二年反革命统治的中心——南京的伪总统府，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旧中国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人民解放军乘胜追歼残敌，其势如摧枯拉朽。五月三日，解放杭州。五月二十二日，解放南昌。五月二十七日，解放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六月，人民解放军进军福建。八月十七日，解放福州。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于五月十四日在湖北省的团风至武穴之间强渡长江，十六、十七两日，解放华中中心城市武汉三镇，接着前锋部队进入湖南平浏。八月初，湖南宣告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向华南和西南的进军也陆续开始。华北各兵团在四月二十四日攻克太原。第一野战

军在五月二十日解放西安。接着，一野和华北两个兵团向西北进军。八月二十六日，攻克兰州。九月五日，解放西宁。九月下旬，新疆和平解放。解放全中国大陆的形势已经完全确定了。

【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代表、海外华侨代表等二十三个单位，在北平举行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毛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使我们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的伟大历史任务。会议到十九日结束，选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常务委员会，开始进行筹备工作。

我们党对国家政权的建设工作，早已积累了长期的经验。革命根据地中开创的红色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国家的雏形。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在土改整党运动中创造了以贫农团和农会为基础，召开区、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委员会的经验，大大地加强了基层人民政权的建设。毛主席指出：这“是一项极可宝贵的经验。只有基于真正广大群众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大会，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大会。”（《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在这种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基础上，各解放区又召开了县、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新的地方政府。一九四八年八月，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在石家庄召开了华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在中央九月会议上，又决定由这个政府将华北、华东和西北三个地区的财贸、金融、工交等工作统一领导起来。华北人民政府的形成和发展，为建立全国性

的政权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一九四八年八月，在哈尔滨召开了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恢复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全国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九四九年三月，成立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四月，成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各种群众团体的形成，进一步加强了人民政权的群众基础。

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又是我们党一贯重视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结果。早在全面内战开始时，毛主席就指出：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建立一个比抗日战争时期有更深刻的基础的“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我们党在同国民党的谈判斗争中，一直注意对资产阶级民主派进行团结争取的工作，帮助他们克服“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一九四七年十月，蒋介石下令解散民主同盟，宣告了“第三条道路”的破产，促使一些人放弃了“中间道路”的幻想。在我们党的帮助下，一九四八年一月，一些民主党派在香港发表声明，宣布反蒋反美。五月，我党中央在纪念“五一”节的口号中，明确提出了“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团结到了我们党的周围。以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进一步发展，他们中的许多代表人物响应党的号召，从国民党统治区和海外陆续来到解放区，经过一系列的协商，对于成立新政协筹备会和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等问题取得了协议。新政协筹备会及常委会都有他们的代表参加工作。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并没有放弃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迷梦。他们参加政府工作，也给我们党带来了进一步与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道路作斗争的新任务。

为了从理论上彻底解决“建什么国”的问题，毛主席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之际，写下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伟大历史文献。

在这部光辉著作中，毛主席总结了**中国一百多年的革命历史经验**，指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的斗争取得基本胜利的事实，使得“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毛主席强调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国际上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社会上阶级还存在的条件下，“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人民民主专政把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对反动派则实行专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对他们决不施仁政。只有对敌人实行了专政，才能真正保证人民的民主和自由；只有对人民实行了民主，充分发动了群众，才能对敌人实行有力的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一个时期中并不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经济。但是，我们的方向是社会主义。我们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正是为了“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

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这种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伟大思想，粉碎了刘少奇鼓吹“不要一个阶级的专政”^④，妄图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蜕化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全民国家”的阴谋，保证了我们党的建国工作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前进。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复灭，标志着美帝侵华政策的失败。这就迫使美国侵略者内部的一个集团，一个派别，不得不发表自己反对中国人民的若干真实材料，去对付另一个集团，另一个派别的攻击。八月五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为此给总统杜鲁门的信。这些文件叙述了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中美关系，特别是详细地叙述了从抗日战争后期起美帝国主义实施扶蒋反共政策，干涉中国内政，直到一九四九年遭到彻底失败的经过。在“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里，充满了对中国人民的恶毒诬蔑和深刻仇恨。“白皮书”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美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制度的衰落。同时，这个材料也就实际上成了美国侵略中国的一个自供状，成了对人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极好的反面教材。毛主席抓住这个反面教材，在八、九两个月中，为新华社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评论，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侵略本质，总结了中国人民胜利的经验 and 重大意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了重

要的舆论准备。

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它永远也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是，无论帝国主义如何凶残，人民是可以战胜它的。中国人民前赴后继，此伏彼起，经过一百多年的流血牺牲，终于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的经验证明，帝国主义这个庞然大物是可以战胜的。毛主席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两条定律，概括了过去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又预示着革命胜利之后，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还要继续下去，革命人民必须组织力量，对国内外反动派的新的“捣乱”进行坚决的斗争。

毛主席彻底批判了艾奇逊之流的历史唯心主义，深刻地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中国人民团结了起来，经过一百零九年大小几百次的斗争，终于夺得了革命的胜利。只要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就必然会创造出更加宏伟的奇迹来。

毛主席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妄图依靠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推翻人民政权的野心，同时，提醒那些“民主个人主义者”，要从艾奇逊这个反面教员那里学到真理，抛弃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站到人民方面来。毛主席号召先进的人们帮助他们，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工作，“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

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毛主席在评论中提出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论点：“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路明灯。

毛主席的这些重要评论发表后，在全国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学习运动。许多人通过批判“白皮书”，对帝国主义的本性、社会主义的本性以及新中国应走向何处去等重要问题，开始有了正确的认识。这个学习运动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学习运动结合起来，成为建国工作的重要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毛主席在开幕词中指出，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经过十天的紧张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法，并在九月三十日选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完成了建国的全部准备工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正式成立。下午三时，首都三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这时，参加典礼的三十万革命群众中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接着，在礼炮声中，毛主席亲手升起了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

“一唱雄鸡天下白”。占全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结束了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

从此，中国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

本 章 小 结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历史时期。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的彻底胜利。’这个革命，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算起，已经经历了二十八年的历史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继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又一个伟大的胜利。

中国革命的伟大的胜利，是贯彻党的“七大”路线的结果，是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全党团结的结果。在这一时期，我们党顶住了国际上白劳德修正主义逆流，战胜了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战胜了刘少奇在土改整党运动中形“左”实右的路线等机会主义倾向。这是因为我们党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坚强正确的领导，因为全党经过整风运动和“七大”，路线斗争觉悟和思想政治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这一事实，证明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证明了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毛主席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路线的胜利。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和战略战术，都已更加完整，更加成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战略防御，战略进攻，到战略决战，最后彻底战胜和消灭了由美帝国主义装备和训练而武装到牙齿的八百万国民党军队。

中国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在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及时地提出了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问题，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革命的理论的重大发展。

我们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有一些未了部分尚待完成，新形势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已经开始了。新的斗争就在前面，我们必须努

力作战。

【注 释】

- ① 《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第 335 页
- ②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 71 页
- ③ 民主同盟，成立于一九四一年，当时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四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
- ④ 民主社会党，一九四六年八月由民主宪政党和国家社会党合组而成，主要成员都是一些北洋军阀时代的反动政客和封建余孽，如张君勱、左舜生、李璜之流。
- ⑤ 中国青年党，原名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为一小撮法西斯主义的无耻政客所组成，为首的有曾琦、余家菊、陈启天等人。他们以反共、反苏、向国民党反动派及帝国主义领取津贴为其反革命职业。
- ⑥ “某些社会贤达”，是指那些以无党无派面目出现而为蒋介石的伪“国民大会”粉饰门面的无耻之徒，如王云五、傅斯年、胡政之流。
- ⑦ 刘少奇：《在晋察冀干部会上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讲话》（一九四七年四月三十日）
- ⑧ 刘少奇：《老区土改方针》（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三日）
- ⑨ 刘少奇：《对天津工作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